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10期(总第232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新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金 鹏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胡海荣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 辑 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 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10-10

■ 学术论坛 -----		
论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类型化适用*	郑晓圳 钟晓雯	5
图书馆记忆的内涵、价值及建构*	杜京容 刘大伟	13
■ 图书馆学史 -----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探析	刘显利 王颖	20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多维视角的学科潜力分析与实践研究*	于曦	27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研究*	苏杰初	34
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精准服务研究*	白忠睿	42
■ 工作研究 -----		
“粤读通”赋能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研究*	钱海钢	47
高校图书馆“馆徽+”文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		
——以百年云南大学图书馆为例	杨毅 杜宇芳 张健	55
■ 阅读文化 -----		
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鸿飞	62

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邹也静	69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之困惑与对策研究*	丛全滋 刘 琨 王洪波	75
■ 文献学研究		
俞樾与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出版考实*	杨永政	80
行走的阅读——陈训慈《胶海道暑日记》述略	周余姣 殷雅琪	87
■ 会议综述		
一次具有前瞻性的高校图书馆发展研讨 ——“治理·变革·转型·赋能 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学术会议” 综述	刘柏嵩 刘 翔 高兆云	93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中邮阅读网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10 2023 (Serial No.232) Monthly

- Typological Application of "Con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Zheng Xiaozhen Zhong Xiaowen 5
-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Memory
Du Jingrong Liu Dawei 13
-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iu Xianli Wang Ying 20
-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Potential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Yu Xi 27
- Research on the Model and Evaluation of Disciplinary Service Capability Maturity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Su Jiechu 34
- Research on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Small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Bai Zhongrui 42
- Empowering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with 'Yue Du Tong'
Qian Haigang 47
-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Library Emblem+'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ennial Yunnan University Library
Yang Yi Du Yufang Zhang Jian 55
-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ang Hongfei 62
-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ivilian Reading Clubs in Guangzhou
Zou Yejing 69
- Research on Confusion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Read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Cong Quanzi Liu Kun Wang Hongbo 75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ve Bureau-Compiled Edition of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 *Yu Yue*
Yang Yongzheng 80
- A Study on Chen Xunci's *Jiao Hai Holiday Diary*
Zhou Yujiao Yin Yaqi 87
- A Forward-Looking Seminar on University Library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of the "Governance,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Empowerment on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Liu Baisong Liu Xiang Gao Zhaoyun 93

· 学术论坛 ·

论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类型化适用*

郑晓圳¹ 钟晓雯²

(1.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1363)

(2.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奠定了“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来源的基调,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同意规则作了更为全面的一般性规定,自此,关于同意规则的学理研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重点探讨具体场景化应用下“同意”的适用路径。文章立足图书馆场域,在梳理既有法律秩序对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基础上,从法解释学和隐私场景理论的角度重新解读读者个人信息的合理分类,并以此作为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类型化适用之基础,进而廓清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范畴和有效模式,同时为后续研究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体系性限制奠定基础。

关键词: 个人信息; 读者同意; 适用范畴; 有效模式; 体系性限制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Typological Application of "Con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bstract Article 1035, Paragraph 1 of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for "consent" as the legitimacy source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dditionally,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general regulations on consent rules. Consequentl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nsent rules has shifted from legislation to interpretation,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paths of "consent" in specific scenarios. This article, rooted in the library context, reinterprets the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privacy scene theor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existing legal orders. This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the typological application of "con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 models of "con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whil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on systematic limitations of "cons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reader's consent; scope of application; effective model; systematic limitation

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数十部法律法规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信息主体的“同意”是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第6条也明确“同意”是处理个人数据的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进阶”(项目编号:20VH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法性事由之一。据此,理论界也高度关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规则,并主要聚焦于其正当性及适用效果的议题上。学者们或试图在同意的单一合法性基础上扩张为多元合法性基础^[1];或尝试排除同意的合法性基础并重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范式^[2]。直至2020年《民法典》颁布,其中第1035条第1款正式奠定了将信息主体的“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来源的基调,随后《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同意规则作了更为全面的一般性规定。自此,关于同意规则的学理研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重点探讨同意的适用路径。因此,结合具体场景化应用,探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同意的适用路径颇具价值。

本文主要聚焦于在图书馆的场域下探讨读者同意的适用路径,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明确读者个人信息的定义。目前我国未有立法明文规定读者个人信息的定义,但可以明确的是,读者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在图书馆领域的具体体现,涵摄于“个人信息”的范畴内^[3]。故欲在图书馆的场域下定义读者个人信息,需结合“个人信息”这一措辞的法律定义。国际上既有立法关于个人信息^①的定义并非完全一致,但均强调个人信息的两个特性:身份可识别性^②与固定载体性^③。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定义表述中采用了“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等措辞^④,可以认为,我国也已经直接以立法的形式肯认了个人信息的这两个特性。因此,读者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可被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对比后识别读者身份的所有信息,包括读者注册信息、读者生物识别信息、图书馆网页浏览记录等。

在图书馆场域中,处理读者个人信息时适用同意机制的完整链条是:图书馆向读者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且读者在充分知悉的前提下作出自愿有效的同意允诺后,图书馆得以在读者同意的范畴内处理其个人信息^[4]。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并基于此种分类模式确立了概括同意结合特定例外的同意机制。但我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的分类存在差异。例如,从文义解释来看,《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将个人信息划分为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和“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

息”。由此直接引发的问题是:立足于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分类基础上的概括同意结合特定例外的同意机制,如何在《民法典》《公共图书馆法》的框架体系下适用于读者个人信息的处理^[5]。欲解决此问题,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厘清不同法律法规确立的各种类型的个人信息间的法律关系,廓清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谱系,进而类型化探索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路径。

2 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谱系

2.1 既有法律秩序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

纵观我国当前既有立法,涉及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公共图书馆法》中,其中《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致力于构建普适性的个人信息类型化谱系,而《公共图书馆法》则充当着规制读者个人信息处理的专门性立法角色。下文将就三部法律法规关于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条文作体系化解释,并基于隐私场景理论归纳总结出读者个人信息的合理类型化谱系。

2.1.1 《民法典》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

将个人信息纳入调整范围是《民法典》立法的亮点之一。《民法典》第110条体现了立法对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盖因该条明确了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而各个具体人格权中蕴含着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例如,自然人的姓名不仅应落入姓名权的保护范畴,同时又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之一。此外,《民法典》第111条还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直接的一般性规定,宣示性地承认了个人信息的民事权益地位,明令禁止非法处理(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等)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见,《民法典》第110条、第111条将个人信息划分为“具体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

除“具体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分类外,《民法典》实际上也将个人信息划分为“隐私信息”与“非隐私信息”。《民法典》第1034条延续了第111条的规定,宣示性地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纳入保护范畴,同时以“概括+列举”的方式对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作出界定。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3款明确“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

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第1034条将个人信息划分为“隐私信息”与“非隐私信息”。因此,在《民法典》的框架体系下,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其划分为读者一般个人信息、读者具体个人信息;二是将其划分为读者隐私信息、读者非隐私信息。

2.1.2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

1981年欧洲联盟通过的《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第6条明确规定:“除非国内法提供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否则不能对揭示种族出身、政治观点、宗教或其他信仰的个人数据,以及有关健康或性生活的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6]随后该条款在2012年被修改为“敏感数据的处理”,明确提出了敏感个人数据(Sensitive Personal Data)的概念,同时增加了基因数据、刑事犯罪相关数据、工会成员资格三类敏感数据的来源。此后GDPR基本延续了前述公约对个人信息的类型化方式及定义,仅增加列举了“生物特征数据”(Biometric Data)这一种敏感个人数据的来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借鉴了这一规定,在第28条第1款以“抽象+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含义,强调“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此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二章“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还并列规定了“一般规则”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据此可以推断出,《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读者个人信息区分为读者一般个人信息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

2.1.3 《公共图书馆法》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

《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历来是学者们对读者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的条文范本,该条明确将“读者的个人信息”、“读者借阅信息”和“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并列安排,但却未对前述三者的具体定义及相互间的关系作出解释^[7]。因此,学者们以该条作为读者个人信息类型化的基础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或将读者个人信息划分为读者隐私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和读者借阅信息^[8];或认为读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借阅信息是其中的具体类型之一)和读者隐私信

息^[9]。实际上,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将“读者的个人信息”、“读者借阅信息”和“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并列分布,这意味着三者范畴大小上应为相当,且三者结合应当形成读者个人信息的全部外延。故“读者的个人信息”可理解为读者个人身份信息,是读者个人信息的属概念(或称下位概念)。因此,从文义解释上看,《公共图书馆法》将读者个人信息划分为读者个人身份信息、读者借阅信息、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

2.2 法解释学对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诉求

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关于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方法,从法解释学和隐私场景理论的角度来看,读者个人信息应划分为读者隐私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和读者借阅信息,并以此作为讨论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类型化适用之基础。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民法典》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具体个人信息”的目的在于赋予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即明确当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侵犯的是信息主体的具体人格权(姓名权、隐私权等)时,信息主体可以《民法典》第110条为请求权基础;当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侵犯的并非信息主体的具体人格权时,信息主体可援引《民法典》第111条——“一般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这与探讨读者“同意”的适用路径并无密切关联,故此种分类方式不应被采纳。其次,《公共图书馆法》中提及的“读者个人身份信息”可分别纳入读者一般个人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内,故毋需单独列举为一个类型。类似的,“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可归入读者隐私信息的范畴内,同样无须单独列出。复次,对于敏感个人信息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明确规定:“敏感信息是……容易导致自然人的尊严受到侵害……的个人信息。”其中“人格尊严”一词直接指向了隐私范畴,这直观反映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范畴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换言之,可以理解为敏感个人信息包括了个人隐私信息。而在敏感个人信息包括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形下,《民法典》又同时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这就引发一个问题:读者隐私信息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在适用读者同意机制时是应当有所差异抑或是应当相

同。因此,读者隐私信息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有必要区分讨论。最后,读者借阅信息作为《公共图书馆法》中的特别规定,其如何适用读者同意机制理应受到图书馆学界和法学界的重点关注。

2.3 隐私场景理论对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启示

场景理论最初为社会学研究者创设,旨在解释一些无法用传统理论阐明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媒学研究者开始将场景理论运用至传媒现象的研究中,这意味着场景理论的适用域从物理场景延伸到了电子信息场景。20世纪90年代,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就曾完整地提出了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他认为场景由社区、有型建筑物、不同主体单独或联合构成的一种特色活动^[10]。在大数据时代到来后,罗伯特·斯科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断言:互联网在未来25年间将进入新时代——场景时代(Age of ContextR)^[11]。这不仅标志着场景理论的发展进入征程,也预示着场景理论将成为解释与互联网相关行为的重要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立足于物理空间的有形场景抑或是立足于网络空间的无形场景,社会交流互动都是其核心要义,而个体在各种场景中欲实现更好的交流互动,无可避免地需要披露必要的个人信息以便于识别、交流、了解和评价。因此,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充当着将无数个社交场景串联并编织成网络的重要角色^[12]。但个人信息在为人们的交流互动提供便利的同时,其作为一种流动要素也衍生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在公共私人对立状况下,由于隐私的定义极其困难,静态隐私分配规则也难以适用,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提出了隐私场景理论(Contextual Integr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场景公正是一个中心原则,医疗、消费、教育等生活领域虽然均发生于由信息构成的场景中,但信息处理需要由信息持有者、传播者、接收者等多方主体共同完成,不同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不同,信息控制能力不同,风险承担能力不同,合理利益诉求不同,这决定了不同场景下的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主体所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也应当有所差异^[13]。换言之,不同场景下的信息处理的规范约束应当存在合理差异。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保护相似,同样存在着定义

困难,静态个人信息流动风险和利益分配规则难以适用的问题。因此,可以尝试运用隐私场景理论来解释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此一来,“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也应当在隐私场景理论的框架下结合不同的场景差异化设置适用规则。

实际上,将读者个人信息划分为读者隐私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读者一般个人信息以及读者借阅信息,继而采用不同的读者“同意”机制的适用路径符合隐私场景理论的要求,盖因四者分别属于读者信息的不同场景,各方主体在这四种场景下的信息控制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合理利益诉求等均有所区别。具体而言,读者隐私信息具有私密性,与读者的人身关联性极强,需要严格保护,理应适用严格的读者同意机制;读者敏感个人信息与读者的人身关联性较之读者隐私信息更弱,但其仍然与读者密切相关,需要强化保护,理应适用趋于严格的读者同意机制;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则与读者的人身关联性较为松散,只需适度保护,理应适用较为宽松的读者同意机制;读者借阅信息则需结合其是否具有人身识别性而区分讨论。倘若读者借阅信息具有人身识别性,则应落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范畴,可依次归入前述3种分类;倘若读者借阅信息不具有人身识别性,那么其就无法适用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规则(下文会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论述,此处暂不赘述)。因此,基于场景理论,将读者个人信息划分为读者隐私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读者一般个人信息以及读者借阅信息,并以此为基础类型化探讨读者同意机制的适用路径具有合理性。

3 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范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除基于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例外情形外,处理读者一般个人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时,均应在信息主体充分知情的基础上由读者自愿、明确地作出同意允诺。因此,读者同意适用于处理读者一般个人信息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应无争议,存在争议的适用范畴是读者隐私信息与读者借阅信息。

3.1 绝对私密性的读者隐私信息不适用读者同意机制

“同意”是否是处理所有读者隐私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值得商榷。在信息主体同意或其他特定情形下,立法允许企业、机构等组织体处理个人信息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信息在社会秩序运行中充当着工具和媒介的角色。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需要通过收集、掌握、利用产生于个体的个人信息,并借此信息来了解、判断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个性特征、行为模式等。这也是学者们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可社会化的源头^[4]。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强化网格化、精准化的管控措施,即需要收集、掌握、整合和利用大量个人信息。故读者同意机制的适用范畴应限定在可社会化的个人信息范围内。然而,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可被社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可见立法将个人隐私上升至宪法权利和基本人权的地位,并以绝对权的方式加以特别保护。而我国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在概念范畴上存在交叉,个人信息实则包含了个人隐私,在《民法典》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采用区分立法模式(以不同条款作分别规定)的情形下,可以推断出:个人信息中存在着可落入“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与隐私权规制范围内的绝对私密性个人隐私信息。这些绝对私密性的个人隐私信息因关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而被纳入绝对权、宪法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调整范围,应当排除在可社会化的个人信息范畴外。综前所述,读者隐私信息中存在着绝对私密性个人隐私信息,这些信息不适用读者同意机制。

3.2 读者衍生借阅信息不适用读者同意机制

《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将读者借阅信息纳入了调整范围,但读者借阅信息是《公共图书馆法》的特别规定,《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并未提及此概念,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概括同意结合特定例外的同意机制能否适用读者借阅信息需要探究。

读者借阅信息包括原始借阅信息和衍生借阅信息(也可称为增值借阅信息),其中原始借阅信息是读者在借阅活动/接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以电子或其他形式记录下来的、能够识别特定读者的信息。衍生借阅信息则是图书馆对原始借阅信息进行实时脱敏、清洗、审核、安全测试、深度整合分析后形成的信息。由于未经图书馆进行脱敏加工等处理行为,原

始借阅信息能够单独/与其他信息结合后达致识别特定读者的效果,故读者对其原始借阅信息仍应享有查阅、修改等控制性信息权利,能够排除他人对该信息的不法侵害。因此,原始借阅信息应当被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制范畴。相反,读者衍生借阅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不应适用读者同意机制,理由如下:一是衍生借阅信息往往已经过图书馆匿名化处理(又称为“脱敏”)、深度整合与加工,难以达致精准识别读者的效果,失去了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身份可识别性”,且《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已明确将“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范畴外。二是衍生借阅信息产生于图书馆对原始借阅信息的深度数据化处理。从广义角度来说,图书馆对原始借阅信息的处理活动(脱敏、清洗、审核和安全测试等)可归为“劳动”的范畴,生产的衍生借阅信息应视为图书馆的劳动成果,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应观点^⑤。

4 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有效模式

同意规则根植于自由自主的法理基础,缘起于信息自决权。“信息自决权”是从《德国基本法》的“人性尊严”与“一般人格权”条款中衍生的权利,它在基本人权的意义上受到保护^[5],主要体现为当事人对自身信息的全面知情与把握。在图书馆处理读者个人信息过程中,不同种类的读者个人信息因其与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关联强度存在差别,造成隐私威胁程度有所不同。为避免对图书馆处理读者个人信息科以过重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义务,需要结合读者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设置灵活的知情同意机理。

4.1 一般规则:概括同意与动态同意的区分适用

读者一般个人信息、读者敏感个人信息、除绝对私密性外的读者隐私信息以及读者原始借阅信息在范畴上存在交叉:除绝对私密性外的读者隐私信息可涵摄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内;读者原始借阅信息则可根据具体内容分别划归至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和读者敏感个人信息内。例如,读者在借阅活动中产生的生物识别信息归属于读者敏感个人信息^⑥,在借阅活动中产生的图书借阅记录、浏览记录归属于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因此,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体系内,区分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和读者敏感个人

信息,廓清读者同意的有效形式。

对于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因其与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关联度较弱,造成隐私威胁的程度较小,立法应允许图书馆采用概括同意^⑦的方式。相反,读者敏感个人信息与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存在强关联,故宜采用动态同意的方式。动态同意模式以分层同意为基础,旨在将不断发展变化的信息主体的偏好嵌入到信息主体与信息开发利用人员的开放式交流过程中,是一种旨在让个人参与到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新方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所谓“单独同意”是指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的方式征得个人同意,而是需要逐一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单独同意”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确立可以认为是立法为动态同意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此,对读者一般个人信息和读者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分别适用概括同意和动态同意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能够在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既保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利益,又降低对图书馆经营管理的负面影响。

4.2 特殊规则:监护人同意机制的嵌入

在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需要针对儿童读者个人信息作特殊考虑,即探索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监护人同意机制^⑧。早在1989年,儿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就受到联合国的关注,联合国在其颁布的《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儿童的隐私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美国、欧洲联盟等国家或地区也出台了一系列立法对儿童隐私加以特别保护,如美国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儿童网络保护法》等。目前各个国家或地区因国情差异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18周岁以下的人全部纳入儿童的范畴;GDPR虽未明确申明儿童的年龄界限,但其针对处理16周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设置了特别措施(监护人同意),同时允许成员国自行在13周岁以上的范围内作相应调整;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则规范了在线收集13周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程序。我国本无“儿童”这一定义,采用的是“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措辞,但2020年实施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首次明确了儿童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⑨。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28条明确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第31条规定处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须征得监护人同意,可以推断:儿童读者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儿童读者个人信息需嵌入监护人同意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监护人同意机制背后的法理基础是:考虑儿童(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存在缺陷,无法正确理解和行使其个人信息权益,应当否定其在个人信息领域的行为能力,转而采用严格的监护人同意规则^[16],由监护人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替代儿童作出是否同意的表示。这一法理基础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创造性地确立了监护人同意机制,但并未就如何适用该机制作出具体规定。监护人同意机制在图书馆领域的适用具体涉及到三大问题:一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核验儿童读者身份;二是监护人同意的有效形式为何;三是如何对监护人的同意进行验证。因此,下文针对这三大问题作出相应阐述。

其一,儿童读者身份的核验。在物理空间中,图书馆可以通过核查本人有效证件(二代身份证、户口本等)的方式对儿童读者身份进行核验,但在互联网环境下(如数字图书馆),儿童读者身份核验面临困境,盖因实践中存在多个现实法律主体共用一个虚拟主体的现象,也存在由一个法律主体创建多个虚拟主体的情况,难以确认网络空间中虚拟主体对应的现实法律主体的真实身份^[17]。因此,如何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正在与图书馆交互的信息主体的年龄,是核验儿童读者身份的关键。目前最常见的方法是实施网络实名制的管理方式,要求读者在接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之前提供身份信息认证,以此判断读者的年龄。当然,此种方法亦存在漏洞,只要儿童有意规避,通过借用或盗用他人有效证件进行登记核验即可轻易隐瞒身份,规避管理。因此,当图书馆在非其过错的情况下未能识别出儿童身份而非法对儿童读者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应当在发现后及时删除相关信息(不包括已匿名化处理后的个人信息)。

其二,监护人同意的有效形式。《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1条仅为原则性规定,对于监护人同意的有效形式未有明确指引。鉴于立法已将儿童个人信息

列为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故监护人在替代儿童读者作出同意允诺时也应适用前述读者敏感个人信息的有效同意形式,即监护人作出的同意允诺必须是自愿、明确的,且需要适用动态同意机制。

其三,监护人同意的验证。监护人同意作为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如何验证监护人的同意一直是法律与技术上的难题。GDPR第8条第2款要求在考虑可用技术的情况下,数据控制者应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并作出合理努力以尽可能核验监护人作出的同意或授权。当前实践中验证监护人同意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由监护人签署纸面同意书后以邮寄、传真或电子扫描的方式返回给信息处理者;二是要求监护人在线勾选同意选项时提供本人使用的金融账户信息(借记卡、信用卡或其他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或其他身份验证的在线支付系统等)^[18];三是要求监护人作出同意允诺时提供官方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户口本、机动车驾驶证等);四是以电话连线、视频联系等方式验证监护人同意。

综合前述四种验证方式,建议图书馆可采用以下两种监护人同意验证方式(两者择其一即可):一是由监护人签署纸面同意书后以电子扫描的方式回传给信息处理者;二是要求监护人作出同意表示时提供官方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户口本、机动车驾驶证等)。理由如下:首先,签署纸面同意书后以邮寄和传真回传的方式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较高,不宜采用,而电子扫描回传的方式具有即时性和便捷性,是可考虑的验证方式之一。其次,儿童通常无法申请个人银行账户,利用金融账户信息可以验证出同意是由具备一定资产的成年人作出的,但同时也存在泄露监护人本人敏感个人信息的隐患。而借助官方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验证监护人同意的方法,具有极高真实性、可信赖性以及便捷性,尽管

其同样存在捆绑监护人敏感个人信息的问题,但相较于需要借助金融账户信息验证监护人同意的方式,一旦发生个人信息泄露实践,身份证明文件所引发的个人信息权益损害通常较之金融账户信息要小。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金融账户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而未将诸如二代身份证、户口本上记载的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主要原因。最后,以电话连线、视频联系等方式验证监护人同意虽在实践运用中较为广泛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捆绑监护人的敏感个人信息,但极易出现冒名顶替进行电话连线或视频联系的情形,真实性较低,故不建议采用。

5 代结语: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限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已进入快车道,图书馆作为履行社会功能的重要公共场所,这一浪潮也直接关涉广大读者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益。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同意”作为处理读者个人信息的重要合法性基础并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这些制度安排仅为一般性规定,并未结合图书馆场域的特殊性形成体系化的规范,故本文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的整体法秩序框架下初步探索了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范畴和有效模式。但“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是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三者呈现出来的是相互制衡的关系,合法原则应当受到后两个原则的约束^[4]。由此衍生而来的问题是:图书馆场域下,正当、必要原则对读者同意的限制应以何种形式展开,立法应安排到何种程度,“目的限制”和比例原则在读者同意的限制中又充当着何种角色。故学界有必要就读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体系性限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注释:

- ① 关于个人信息的称谓,不同国家或地区表达各异,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称其为“个人资料”,欧洲地区通常使用“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日本和韩国采用“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美国则采用“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我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文件中采用的是“个人信息”的表述。严格意义上,相关概念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在探讨个人信息法的问题时基本可混同使用。
- ② 身份可识别性指的是个人信息与信息主体存在客观关联性,通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识别或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

份。其中直接识别是指能够凭借此单一信息独立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间接识别是指需要与其他信息进行结合或对比后，才得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

- ③ 固定载体性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必须是已经固定化于特定媒介中的信息，盖因只有经由特定媒介固定化后的个人信息才具有手动/自动化操作的可能性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 ④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
- ⑤ “淘宝诉美景”案的二审判决认为：“‘生意参谋’数据产品中的数据内容系淘宝公司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经过长期经营积累而形成……‘生意参谋’数据产品系淘宝公司的劳动成果，其所带来的权益，应当归淘宝公司所享有。”（案件详情可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7312号）
- ⑥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将“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 ⑦ 概括同意指的是以一揽子告知同意的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 ⑧ 监护人同意机制源于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经过GDPR的完善逐步形成了国际社会主流的保护模式。
- ⑨ 参见《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第2条。

参考文献：

- [1] 高富平.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数据上利益分析视角[J].比较法研究,2019(2):72-85.
- [2]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2016,38(5):92-115.
- [3] 童云峰,金洁.图书馆数字化时代读者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限度[J].图书馆学研究,2021(18):31-38.
- [4] 吴文芳.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适用与限制[J].中国法学,2022(1):221-243.
- [5] 吕炳斌.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困境及其出路[J].法商研究,2021,38(2):87-101.
- [6] COUNCIL OF EUROPE.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EB/OL].(1981-01-28)[2023-03-25].<https://rm.coe.int/1680078b37>.
- [7] 时诚.数字时代读者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与隐私信息的关系：以《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为研究对象[J].图书馆建设,2021(6):93-101.
- [8] 童云峰.证立与提倡：读者个人信息的民法分类分级保护[J].现代情报,2021,41(12):97-106.
- [9] 姜盼盼.利益衡量视角下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探究：基于《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J].图书馆建设,2018(12):44-51.
- [10] 克拉克,李鹭.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7,38(1):16-24.
- [11] 斯考伯,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如何改变商业和生活[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1.
- [12] 赵祖斌.从静态到动态：场景理论下的个人信息保护[J].科学与社会,2021,11(4):98-116.
- [13] NISSENBAUM H.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J].Washington Law Review,2004,79(1):119.
- [14] 高富平.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区分为核心[J].法商研究,2019,36(1):93-104.
- [15] 张忆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权利变迁与刑法保护的教义学限缩：以“数据财产权”与“信息自决权”的二分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20(6):53-67.
- [16] 蔡一博,吴涛.利益衡量与场景实践下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4):152-160.
- [17] 孙占利.虚拟主体基本法律问题探略[J].法学评论,2008(2):49-53.
- [18] 黄晓林,张亚男,吴以源.共同打造儿童数字未来：欧美儿童数据保护对我国的借鉴[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8):48-57.

作者简介：郑晓圳，广州商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钟晓雯，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法治。

收稿日期：2023-03-28

本文责编：王晓琳

· 学术论坛 ·

图书馆记忆的内涵、价值及建构*

杜京容¹ 刘大伟^{2,3}

(1.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1171)

(2.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3.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02)

摘要:图书馆记忆是指图书馆参与者围绕这一场所形成的所有记忆,包含参与者自发形成的有关图书馆的日常记忆,以及图书馆通过自身构建形成的文化记忆两部分。图书馆构建形成的文化记忆以物化形式为承载、以仪式活动为表征、以特定的功能空间为展示,确保了其在参与者记忆中存在的系统性和长时段性。系统地构建图书馆记忆,有助于实现文化传承,实现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助于完善社会记忆体系和教育记忆体系。图书馆参与主体可以从强化馆舍、仪式活动、主题空间功能等具象化手段入手,从物质性记忆、象征性记忆、功能性记忆等维度来构建图书馆记忆。

关键词:图书馆记忆;内涵;价值;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Memory

Abstract Library memory refers to all the memories formed by participants around the library, encompassing both the spontaneous daily memories of the participants regarding the library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ed by the library itself. The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ed by the library takes material form as its carrier, is characterized by ritual activities, and is exhibited through specific functional spaces, ensuring systematicity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within the participants' memorie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library memory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heritage, fosters cultural belonging and identity, and helps improve the social and educational memory systems. Participants involved with the library can initi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memory through concrete means such as enhancing the library's physical space, organizing ceremonial activities, and utilizing thematic functional spaces, considering dimensions such as material memory, symbolic memory, and functional memory.

Key words library memory; connotation; value; construction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一书中认为:“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涵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20}从诺拉的观点来看,图书馆是典型的凝聚了

他所谓三层涵义的“记忆之场”:实在的记忆之场,如馆舍、书籍、展览物、雕像等;象征性的记忆之场,如读书文化节、阅读推广、图书捐赠等活动仪式;功能性的记忆之场,如图书馆通过打造主题空间等形式承担了记忆塑造、记忆传承以及育人功能的职责。

*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记忆形塑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YJC880015)研究成果之一。

随着历史变迁,图书馆已然成为一所学校、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因而,重视对图书馆记忆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还有利于将优秀文化凝练成文化印记,利用图书馆的“不朽性”将其传承和发展。正如美国图书馆学家皮尔斯·巴特勒所说,“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21],也正是通过“移植”和“建构”文化印记,图书馆实现了在社会群体中巩固传承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目标。

1 图书馆记忆的内涵

对于图书馆记忆的理解,我们认为,图书馆记忆是图书馆参与者围绕图书馆这一场所形成的所有记忆,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图书馆作为记忆的存储场所,通过自身构建形成的文化记忆;第二,参与者自发形成的有关图书馆的日常记忆。其中参与者自发形成的日常记忆通常是非系统性的、短时效的,而由图书馆构建形成的文化记忆以其物化的承载形式,确保了其在参与者记忆中存在的系统性和长时段性。

图书馆是重要的记忆存储场所。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1928年提出:“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23]1933年,皮尔斯·巴特勒从记忆的角度揭示图书馆的本质,将图书馆定义为“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21]。他认为,通过图书保存记忆不仅在储存方面更具有安全性,而且更能使记忆实现跨时空的交流;而图书馆作为储存图书以及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以潜在的形式储存着人类历代通过经验和智慧积累的无数思想”^[4],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促进了记忆的交流。对这一观点,皮埃尔·诺拉也深以为然,他认为记忆是需要有载体的,“记忆黏附于具体的事物,依附于空间、姿态、图片和物体”^[5],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实际上由庞大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材料积累和深不可测的资料库构成,而这种资料库就包括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文献中心和数据库”^[114]。从诺拉对图书馆的理解来看,图书等物品作为记忆的载体,将无形的知识变成有形的文字,图书馆等场所作为记忆之场给予图书等记忆载体一个特定的储存场所。记忆不仅需要依附于图书馆等具体

的场所而存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图书馆等资料库本身就是记忆的构成部分。阿斯曼夫妇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讨论了图书馆对记忆的保存,尤其是在经典文献的保存和规范上,他们认为“经典之作具有规范和定型价值,而文献的抄写、传播和保存等保障性机构的出现,使经典文献的规范和定型意义长存,进而促使‘大传统’的形成,图书馆则为这种以文本作为基础的文化记忆提供了场所”^[693]。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梳理了图书馆的产生与人类记忆的关系,他认为图书馆的产生即是记忆累积的结果,“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人类大脑记忆的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生”^[7]。在其看来,图书馆的产生解决了记忆存在限度的难题,且发挥了储存人类记忆的功能。

图书馆作为记忆的载体,不仅承载个体记忆,还承载着集体记忆。巴特勒认为:“图书馆不仅承载了个人的记忆,还承载了现代社会的部分记忆。”^[242]图书馆所承载的记忆已经成为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一段关于图书馆的记忆,当越来越多的智慧结晶汇聚于图书馆这一特定场所时,图书馆记忆必然会从个体记忆逐渐转变为集体记忆,这类集体记忆便是图书馆记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缔造者,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8]记忆不可能存在于社会框架之外,事实上近些年来,很多图书馆通过出版馆史、回忆录和举办展览等形式,将图书馆记忆呈现在集体大众面前,引发了一批不同年代的读者对于图书馆学习的集体记忆热潮。

事实上,图书馆的这股集体记忆热潮最终会演变成文化记忆。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将记忆区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可能会“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644],而“文化记忆”却能依托仪式或节日等形式并通过文字等客观外化物固定下来,并“具有专职的传统承载者”^[651]。由此可见,由参与图书馆活动而形成的集体记忆最终将会通过具象、仪式等客观外化物固定下来。那么,关于图书馆的记忆,有什么可以凝练成文化记忆?对于这一问题,扬·阿斯曼在《宗教与文化记忆》一书中予以了解答。他认为图书馆作为记忆储存的媒介,可以把记忆转化成能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记

忆,尤其是类似于以色列的《妥拉》、埃及的《死亡书》等规范性文本组成了一个围绕着整个图书馆发展的核心^{[9]35}。他以尼尼微城的宫廷图书馆和亚历山大图书馆为例证,认为它们是广泛文化收藏的显著代表,图书馆的目的在于收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全部知识,并最终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文化记忆。

与此同时,这类文化记忆是可以被选择和建构的。阿斯曼夫妇认为,记忆是可以通过操控、审查、销毁、改写和替换的方式使之被压抑的,他们将记忆划分为“储存记忆”和“功能记忆”。“储存记忆”主要实现的是储存和记忆功能,这里的记忆载体被看作记忆储存器,是间断的、静态的。而功能记忆则是通过对记忆进行有选择和有意志的支配,使自己成为记忆的载体,是连续的、动态的。美国历史学家古切尔与沃尔顿也持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无论文化记忆呈现出何种形式,或者通过何种方式被创造、储存和保持,文化记忆的传播经常与诸如教会、学校、图书馆之类的机构相联系……在传播和保存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机构是文化记忆的代理人”^[10]。在他们的研究中,图书馆自身就是记忆的代理人,它不仅实现了对文化和历史的物理性保存,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当时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导向。

由上述可见,图书馆记忆既是“储存记忆”又是“功能记忆”。就记忆主体即图书馆参与者而言,无论是日常记忆还是文化记忆,其形成的图书馆记忆往往都是碎片化的、非系统的。随着时间推移,日常记忆会逐步淡忘,文化记忆也会失去相应的载体。有目的、有意识地构建图书馆记忆,是解决社会遗忘和教育遗忘的重要路径与措施。在图书馆记忆的主体中,参与者包含图书馆管理者和服务对象。管理者既是设计者也是记忆者,他通过记忆的具象化路径构建形成了服务对象的图书馆记忆,这一过程也成为其自身的图书馆记忆。

受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关注到了图书馆记忆的相关论题,有研究认为图书馆在发挥社会记忆功能方面有着重要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11],有研究分析了巴特勒“思想—图书馆—文化”理论体系^[12],提出“社会记忆理论尤其是文化记忆理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大有裨益,尤其可对中国图书馆记忆研究提供一种诠释方法”^[13];也有研究强调图书馆记忆功能在衰退,需要

进一步修复与强化其记忆功能^[14];还有研究探讨图书馆参与个人数字记忆保存^[15],并认为图书馆与档案馆有着共同的社会记忆基础^[16];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有研究以口述史、影响史为手段分析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17],认为这一项目证明了图书馆建设影音记忆文献的可行性^[18],有助于“建立记忆资源库,为国家保存记忆资源”^[19]。

2 图书馆记忆的价值

首先,构建图书馆记忆,有助于实现文化传承,实现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21]。图书馆作为文化的集散地,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承担着传承文化和文化育人的重要职责。同时,图书馆通过有选择地收藏、积累经典文献,读者通过阅读产生情感体验并把这种情感体验与文化现实相互印证,从而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从这一方面来看,图书馆记忆本身就是不断积累和不断构建文化认同的过程。

当下,我国的文化现实和读者的情感体验还有很大出入,这不仅会使读者产生文化疑惑和文化自卑,更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取向。大量问题图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图书中不适宜的插图、西化的内容,用有争议的、虚构的故事替代中国传统文章等,这些都会对读者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矛盾”一词本身应是中国成语典故中一个卖矛与盾的人自相矛盾的故事,但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矛与盾的集合》一文中对于“矛盾”一词的解释,不管从内容还是配图全盘西化,这一改动反而更不利于读者对这个词的理解。类似这种文化入侵的事例在不同类型的图书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各个图书馆收藏的儿童绘本中,明显呈现出中国传统经典少,外国绘本作品多的情况。鉴于此,笔者统计了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儿童绘本的收藏情况,发现西方绘本竟占75%以上的比重。如此明显的文

化入侵不仅会对幼儿和青少年读者,甚至会对教师群体的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集体记忆的建构,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所以,图书馆不仅要做文献的集散中心,更应该做优质文献的聚集地,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把好书籍质量关,并加强对传统文化载体、古籍文献以及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传播。从这一角度出发,系统地构建图书馆记忆,不仅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还是十分紧迫的。

其次,构建图书馆记忆,有助于完善社会记忆体系。在原始社会,人们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记忆和个人记忆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通过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的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22][238]}。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了记忆的障碍,人们通过建造图书馆等机构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了大脑之外,扩大了社会记忆的范围。第三次浪潮文明通过网络信息领域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工具,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数据库等工具的使用也使社会记忆的传播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22][239]}。可见,图书馆作为社会记忆的储存装置,通过不断更新服务模式将社会记忆变得更加灵活。从这一方面来讲,构建图书馆记忆,本质上就是在构建社会记忆。随着文明的进步,图书馆的面貌和职能不断变迁,但却始终担负着保存与传播文化的重要职能,发挥着社会记忆平台的重要作用。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中对“图书馆”这一概念是这样描述的:“图书馆是社会记忆(通常表现为书面记录信息)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换句话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信息、文化的记忆装置、扩散装置。”^[23]从这方面来说,图书馆记忆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其作为“记忆之场”所包含的物型记忆、仪式记忆和功能记忆都是国家和城市的象征名片。

如今,现代图书馆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重视馆舍建筑和空间规划,重视馆藏质量和特色,并通过举办各种仪式和活动进行宣传推广,逐步扩大图书馆的职能。如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因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风格(“滨海之眼”和“书山”)成为天津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被誉为“中国最美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开设了“北京记忆”平台数据库,以自身百余馆藏、北京地方文献近60年专藏为依托,全方位记录北京历史的各个层面,试着重拾历史记忆,

让后人知道“昨天”是什么样子,在宣传推广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同时,为民众提供了了解北京历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24];南京图书馆通过各种展览和活动宣传推广地方文化,重构民众的集体记忆,如举行“南京书香记忆70年”图片展,重温南京阅读生活与书香进程,使参观者在历史中感受南京阅读文化的书香氛围。可见,这些图书馆都在努力通过场所、仪式与活动为大众构建一种共有的集体记忆。

最后,构建图书馆记忆,有助于完善教育记忆体系。狭义教育事业一般专指学校。广义教育事业则包括社会上一切具有教育职能的工作机构。按照广义教育的含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是教育事业和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是广泛意义上进行终身教育的场所^[25]。图书馆既是广义教育事业中的重要领域,又是学校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公共图书馆的所有合作机构中,与学校的关系最为密切,公共图书馆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天然关系,具有共同的服务对象和相同的服务目标,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推广和亲子读书等活动,需要借助学校的宣传和教师的参与,教师和学生进入社区组织的特色活动,需要公共图书馆的支持和配合。学校图书馆更是和学校的关系密不可分,学校图书馆全面参与并积极影响着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活动,同时作为学校的“窗口”,反映出学校的学术氛围、教学质量以及政治思想工作等多方面的情况。

图书馆作为广义的教育机构,其记忆实际上也就是教育记忆和学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图书馆的记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学校记忆史和教育记忆史,“因为在人类的记忆当中,教育或与其相关的事件、活动占据了记忆中的很大一部分比重”^[26],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情感寄托和奋斗历程。上海交通大学1929届校友钱学森先生曾表示:“我是在交大图书馆自学了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后,才开始进入航空工程领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27]足以看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记忆已经深深烙印在钱学森的学习生涯中,并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将图书馆印刻在学生心中,实际上这是在解答“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28]。学校图书馆可以通过记忆的建构来补充、丰富和完善教育记忆

和学校记忆,实际上很多学校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图书馆记忆来加深受教育者对学校的回忆。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出了“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呈现每一位毕业生的图书馆生活,拉近了毕业生与图书馆的距离,提升了毕业生对图书馆的认同感^[29];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通过建设“法大图书馆记忆”平台,为毕业生提供在校期间出入图书馆的情况和借阅的详细数据,到学生离校时,图书馆为其免费提供相关数据下载、保存以及打印服务工作^[30],毕业生也可在此平台上留言,写下这四年来对图书馆和学校的情感体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编撰120周年纪念文集,收集毕业校友对图书馆记忆的感悟,从他们的文字中处处流露出对学校的情感和怀念。可见,构建图书馆记忆,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学校记忆,对“受教育者家国情怀与爱校情谊的确立”^[31]有着重要的意义,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发挥其“记忆之场”的功能达到了构建毕业生对母校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的作用。

3 图书馆记忆的建构

皮埃尔·诺拉将记忆之场分成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三个维度。借助诺拉的观点,我们可以从物质、象征和功能三方面入手来系统建构读者关于图书馆的记忆,将图书馆记忆从抽象化转变为具象化,使图书馆的每一件事物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用。

其一,物质性记忆。这一类记忆应承载于实在的、具象的物质之上。这些客观的具体事物,是凝聚图书馆记忆最显著的存在体。作为图书馆而言,可以从馆舍命名、馆舍建筑设计、塑像以及馆藏资源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构建关于图书馆的独特记忆。在命名上,图书馆可考虑采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或事,为图书馆或馆藏阅览室命名,如上海理工大学为缅怀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烈士所设立的“湛恩纪念图书馆”;南京晓庄学院为纪念晓庄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陶行知先生,而采用他亲自命名的“书呆子莫来馆”;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为纪念和宣传钱学森科学成就、治学精神和高尚品德而设立的“钱学森图书馆”;烟台大学为纪念其名誉校长张承先而设立的“承先图书馆”等。如今,为方便记忆,更多

的图书馆会选择以地方或学校的名称加图书馆来命名,例如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虽然从名称上能更好地区分图书馆的功能和属性,但却缺少了一份历史和记忆的沉淀。

就馆藏建设而言,图书馆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建设反映自身学术文化成果的文库。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人大文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北大名师”、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的“摇篮书斋”、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的“北邮记忆数据库”等,虽称谓不同,但都是文库形式的一种,本质上都是为了保存和收藏本校学术成果,实现学校文化的传承。除了进行文库建设,还可以在馆史建设方面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很多图书馆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出版专著、举办馆史实物或图片展等。除此之外,在物质性记忆构建方面,还可以通过雕像凝聚记忆,图书馆可以将创建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制造成雕像,置于图书馆的核心位置。如哈佛大学维德纳纪念图书馆在图书馆前厅设立了两块浮雕,一块写有图书馆来历:“本图书馆为追忆爱子亨利·威德纳由其母亲爱莉诺·威德纳捐建”,另一块则介绍了威德纳的简况。雕像的设立使读者能直观具体地感受图书馆的历史底蕴,加深他们的图书馆记忆。

除了以上所述,图书馆文创产品也是承载记忆的重要实物。图书馆可以基于馆藏资源特征进行文创开发,创作带有地方和馆藏特色的文创产品,从而引起读者的文化认同感。如四川图书馆结合地方特色设计出了杜甫加熊猫的文创产品;国家图书馆结合自身“书”的优势(3 000多万册件典籍),以古籍《庆赏升平》为蓝本衍生出公交卡、书签等数十种文创产品;金陵图书馆充分挖掘馆藏资源中的南京文化、南京元素,开发了南京方言布包、金陵十二钗系列文件夹等系列文创产品等。此外,图书馆还可以借助墙面设计、空间规划等多种形式,将关于图书馆的物质性记忆,落实到图书馆的每一个实物上。

其二,象征性记忆。这一类记忆通过借助各类活动和仪式来承载。扬·阿斯曼认为:“记忆的任务是通过改变总体框架来防止记忆消失。出于这种考虑,一个记忆仪式被引入,仪式被定期地重复以便记忆得到不断更新。”^{[9]11}通过各种仪式和活动的演练,读者可以形成关于图书馆的身体记忆以及文化记忆。这是记忆的一种内化形式。

仪式的操演需要依托节日,节日最突出、最显性的“基因”就是其仪式性。涂尔干认为:“任何社会都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的联系起来,进入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32]可见,仪式为共同情感和群体认同提供了感情依托。所以,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创建并借助各类节日,进行仪式的演练,是构建读者图书馆记忆的重要渠道。图书馆可借助各类仪式,尤其是“4·23世界读书日”的契机,举办各类图书推广活动,如开展名师讲座、馆藏资源宣传、服务体验、组织竞赛等活动,借助图书馆官网、微博、微信以及馆内LED大屏等新媒体在读者中进行推广,与读者进行近距离仪式互动,构建与读者之间的集体情感和共同记忆。除了与图书相关的节日,图书馆还可以在传统节日时开展仪式活动,如在端午节时向读者推荐有关端午节的历史书籍,让广大读者了解端午节历史,弘扬民俗传统文化。这种通过仪式构建的集体情感和共同记忆,不仅仅是对图书馆的记忆,最终会演化成一种文化记忆。

除节日仪式外,图书馆还可借助一些大型事件和时间点来举办仪式活动。例如在图书馆开馆日,可以通过举办开馆仪式来加深群体对图书馆的记忆;学校图书馆在新生入学日可以举办类似“走进图书馆”等仪式活动,在第一时间占领新生对图书馆的记忆阵地;在学校的重要日子如校庆日,开展仪式活动,梳理图书馆从建校至今对学校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公共图书馆可以在国家或城市的一些重要时间点举办仪式活动,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举办仪式和展览,使普通民众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可以通过身体实践,实现图书馆文化记忆的传承。

与此同时,也可将仪式记忆与物质记忆相结合,将仪式的举行场所,置于图书馆物质性记忆场所,如雕像、文化墙等地举办,从而形成叠加效应。如将新生入馆教育置于馆内雕像前,使学生在入馆前便了

解图书馆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形成个体记忆,并将这种个体记忆赋予在具体的人和物上,转化成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

其三,功能性记忆。这一类记忆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主题空间的功能再造上。图书馆的空间划分应力图使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由于文化底蕴的固化,图书馆记忆的建构者很难在物质记忆和仪式记忆上有创造性的发挥,而功能性记忆更多体现的是对主题空间的设计性和选择性,更能凸显记忆建构者的主动性,因而更能形成具有图书馆特色的记忆。

图书馆传统的主题空间服务主要提供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和交流功能。除了这几种功能以外,图书馆还可以通过规划主题空间、功能和服务的方式,使读者形成一种对图书馆历史、图书馆所在区域身份认同的功能,如江西省图书馆基于“第三空间”理念打造的红色主题图书馆,以“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以实现“体验感受、交流互动、知识传播”的功能和目的^[33];太原市图书馆在馆内建设了马克思主题的书房,将教学演讲、展览展示、数字阅读等多种空间融合一体,实现了红色主题阅读推广模式的创新。换句话说,公共图书馆不仅可以通过功能空间的创造和挖掘,再现和传承思想和文化,更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服务方式让思想和文化入脑入心,加深读者的图书馆记忆。各学校图书馆也可以针对本校学科特色、历史沉淀、校园文化等,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空间。如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针对学校的幼儿师范特色,在一楼大厅打造了儿童绘本主题空间,除了收藏丰富的儿童绘本,在环境的设计和布置上也充分考虑了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使其在阅读的同时体验到舒适和愉悦,形塑了他们的图书馆记忆。此外依据行知办学特色,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还打造了陶行知文献主题空间,通过收藏和陈列陶行知著作和陶研文献,在传承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实现学生对图书馆记忆的持续性和永恒性。可见,图书馆可以主观能动地创作立体的功能空间,实现与读者的精神世界相融相通,从而最终烙印为永久的图书馆记忆。

参考文献:

- [1] 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M].谢欢,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 [3] 杜定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文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396.
- [4] BULTER P.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Library[J].The Library Quarterly,1952,22(2):79-91.
- [5] 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6-97.
- [6]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7] 谢拉.图书馆学新论[M].张沙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
- [8]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 [9] 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M].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0] 古切爾,沃尔頓.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M].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65.
- [11] 黄晨,虎娇玫.图书馆发挥社会记忆功能的思考[J].图书馆建设,2013(8):8-10.
- [12] 王瑛琦,郑秀花.论巴特勒的图书馆记忆思想[J].图书馆,2021(10):75-82.
- [13] 刘博.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图书馆——社会记忆与图书馆关系新论[J].图书馆建设,2016(3):13-16.
- [14] 王子舟,张晓芳.图书馆记忆功能的衰退与修复:2017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培训班讲座整理稿[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1):16-25.
- [15] 周文弘,代林序,郭玉祥.图书馆参与个人数字记忆保存的实践策略研究:以哥伦比亚特区公共图书馆的记忆实验室为例[J].图书馆建设,2022(5):1-16.
- [16] 蒋永福,张贤淑.社会记忆: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共同历史基础[J].情报资料工作,2018(1):33-38.
- [17] 刘东亮.图书馆口述史、影响史资源整理利用与公共服务研究: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1):117-121.
- [18] 赵鑫,赵盼超.集体记忆视阈下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建设研究: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为例[J].图书馆建设,2018(6):39-43.
- [19] 田苗,汤更生.中国记忆项目的构想与实践[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1):3-9.
- [20] 孔繁轲.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2.
- [21]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4,107.
- [22]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 [23] 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55.
- [24] 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学术交流暨“北京记忆”新版发布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EB/OL].[2017-10-13].<http://www.chnlib.com/News/2017-10/354535.html>.
- [25]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37-238.
- [26] 刘大伟,周洪宇.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J].现代大学教育,2018(1):9.
- [27] 陈进.圆·梦想之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20周年纪念文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8.
- [28]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
- [29] 程静,鲁丹,陈金传.技术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创新实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117.
- [30] 《中国政法大学年鉴》编写组.中国政法大学年鉴2015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283.
- [31] 刘大伟,周洪宇.学校记忆的意涵、价值及其建构[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3):59.
- [32]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06.
- [33] 刘景会.公共图书馆主题空间再造实践与思考:以江西省图书馆红色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4):102-107.

作者简介: 杜京容, 硕士, 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史; 刘大伟, 博士, 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 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记忆史。

收稿日期: 2023-04-04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图书馆学史 ·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探析

刘显利 王颖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图书馆是开展教育和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革命战争时期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解放群众思想、教育动员群众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通过多种形式丰富馆藏图书、开办阅览室、提升管理能力等举措,为边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政治上,提升干部队伍理论水平;在经济上,促进边区生产力发展;在文化上,推动边区文化繁荣发展。文章总结了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主要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推进图书馆建设;从实际出发,创新开展图书馆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方针政策。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革命战争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9.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bstract Libraries play a crucial role as carriers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the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cadres, liberating people's minds, and educating and mobilizing the mas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library construction. Through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enriching library collections, establishing reading rooms,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t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Politically, it elevated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cadres; economically,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the border region; culturally, it fostered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Summarizing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libraries during this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masses, reliance on their strength, innovative library work based 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dherenc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principles were crucial.

Key words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到1949年之间,由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它前承工农苏维埃政权,后接人民民主政权^[1],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培育了众多党的优秀干部。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窗口,在这一时期,服务于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战时教育,以其出色的工作发展了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最终胜利。这一时期创造出的许多图书馆建设管理的形式,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建设工作开展的“雏形”。探索陕甘宁边区时期党领导图书馆建设的具体实践和成效,旨在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新时代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

1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历史背景

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不是孤立的,作为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托,图书馆建设必然与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在其所处的特殊年代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总的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展开。

1.1 政治背景

抗日战争(以下简称“抗战”)前民国二十余年,陕西都是军阀当政,当政者贪污腐败,压迫人民,无所作为。当地许多德意志帝国主义教堂更是横行不法,蔑视我国主权,人民政治上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暗无天日的统治^{[2]35}。土地革命之后,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陕甘宁边区成立前夕,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逐渐被民族矛盾所取代。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时期边区的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建设上都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

1.2 经济背景

历史上,陕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瘠民贫,农业经济凋敝,陕甘宁地区的经济极端落后,生产技术异常落后,土地、牲畜集中在地主手中,广大贫苦农民无力改良农作法,农业生产力低下^{[2]36},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散居于荒山野岭中,承受着繁重地租和苛捐杂税的盘剥,终年劳作,物质条件艰苦。20世纪初期以来,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陕甘宁农村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前,在遭受多次严重自然灾害和长期战乱破坏之后的陕甘宁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受外国资本深入和军阀战乱的影响,陕甘宁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也遭受到了巨大打击。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1.3 文化背景

文化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环境的影响。全面抗战之前的陕甘宁地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的文化荒漠之地^[3]。陕甘宁地区社会发展的整体落后,导致教育发展的极端缓慢,很少有人能够接受文化教育。一般的县份,一百人中很难找到两个识字的,像盐池县和华池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识字,很多穷苦农民几辈人都不识字^[4]。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5]。而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各项革命工

作要得以顺利开展,必须要依靠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对陕甘宁地区封建思想大为盛行、陈规陋习广为流传的文化现状,把边区人民从文化荒漠中解救出来,成为了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6]。

2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实践活动

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工作几乎陷于停滞,只有榆林中学和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各有一个小型的内部图书馆,以及绥德县城内的一个县图书馆^[7]。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委员会下设有教育厅,负责有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的事项^[8]。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各方面物资供应困难,图书馆建设工作的开展充满阻碍。尽管条件艰苦,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事业作为党的文化事业和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其工作的开展。1938年边区教育厅印发《社会教育纲要》,把图书馆工作列入社会教育文化工作范围,对馆藏图书的来源、图书馆阅览室的设立以及图书馆读书读报活动的开展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9],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图书馆建设。

2.1 多渠道丰富馆藏资源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陕甘宁地区的图书馆数量稀少,馆藏图书更是寥寥无几。随着专业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不断增多,图书的获取是边区图书馆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通过干部群众的自觉捐助、花钱购买和向全国募集这三种途径来丰富边区图书馆的藏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成立时,学员们把自己的书籍纷纷捐献出来,成立“流动图书馆”^{[10]70},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也曾向恢复扩建的中山图书馆捐赠大批书籍^{[10]70}。除了本国人民的捐助,外国友人也积极援助边区的图书馆建设。英国克利蒲夫人在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参观时就捐赠了一套英国护士学校的教科书^{[10]95},这在当时是难以获取的专业书籍,十分珍贵。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受限,财政长期比较困难,在书籍购买上很难面面俱到,种类齐全。通过图书募集来获取许多当时难以获得的图书,就成了一个重要途径。延安中山图书馆在筹备建立时,成立了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组成的馆理事会。同年,延安中山图书馆在《解放》

周刊上刊登了征募图书的启事^{[10]70}，之后又通过《解放日报》刊登启事，征求关于军事、政治、国际问题、自然科学、文学、史地等各种名著^{[10]87}。通过捐助、购买、募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不仅在数量上，在种类上也极大地丰富了起来。

2.2 推进图书馆阅览室建设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教育厅把鲁迅图书馆作为机关内部图书馆，在办公室旁的一侧小平房里设置了报刊阅览室，供干部阅读使用。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提出在边区各县广泛建立民教馆^{[10]76}，馆内开设了供群众阅览书籍的读书室。1939年，陕北公学图书馆根据新的教学要求，开设了阅览室，阅览室外面接出来一个草棚子，供读者在此阅读。1940年正式开馆的中山图书馆的阅览室也向广大群众开放，当地人民都可以来借书、读报。此外还有子洲图书馆、延安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延安中央党校图书馆等，都设立了阅览室。1941—1945年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各项建设都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一些学校团体、书店、部队、小学、农村也都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图书馆或阅览室。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建设是在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没有高大的楼房和宽阔的阅览室，除了少数废弃旧房屋可以利用，大部分馆都开办在土窑洞。土窑洞光线并不充足，工作人员就会在外面搭个草棚，成为“露天阅览室”。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会尽可能把图书馆装饰得“漂亮”些，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阅读环境^{[7]309}。

2.3 提升图书馆管理水平

从1935年中共中央进入陕北地区，到1949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领导建立的图书馆大大小小发展建立了一百余座，边区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也逐渐提高，体现在图书登记方式、图书借阅制度、馆际之间的协作和管理人员的培养上。为了更好地管理图书馆内藏书，采取科学的图书登记方式十分必要。中共中央图书馆对在馆的每一种图书都做了详细登记，并将其分为了16个大类，大类下作了较细区分，供读者掌握信息，方便查找利用。关于图书借阅，中共中央图书馆沿用早期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图书的借阅数量、借阅期限、借阅手续、借阅规则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例如借阅规则规定：借

书册数“每次至多三册为限”，“书籍交还时须经管理员之手，不得自行取放”^{[7]24}。中山图书馆也有一套健全的借阅制度，规定各机关必须具函介绍并缴纳保证金后才能获得借书证，凭证借书出馆，并规定珍贵的图书期刊只能室内阅览，不能外借。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加强馆际之间的协调合作，培养图书管理人才成为了更好推进图书馆工作的必要举措。1941年延安图书馆协会成立，协会不仅组织图书馆之间馆际协作、馆际互借、资料互借等工作以及赠送书籍等协调工作^[9]，还开展了许多活动，如召开“图书馆的经营和管理”研究会，对馆藏建设、图书分类、流通管理、人员培训等业务问题进行了研讨，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与工作质量。

2.4 根据战时特点开展图书馆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动荡，图书馆资源极不稳定，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流动图书馆”“随军书店”的出现，以及以图书馆为主阵地开展读书读报活动宣传党的思想政策。1936年9月，李富春致电中央，提出前方干部渴望书报，建议建立流动图书馆。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组织流动图书馆”^[11]。流动图书馆是针对资源少而图书需求量大的问题，后来基层也采用这种办法。1945年2月，边区《解放日报》载，延安市东关乡为使已识字的群众能够有书阅读，实行流动图书馆的办法，乡文书把存于乡政府的一部分书和募集来的书整理出来，外出时带上几本顺路散发，回来时又顺路收回^{[10]91}。1948年8月，西北新华书店（原边区新华书店）根据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组织了第一野战军随军书店，帮助部队和地方建立图书馆^{[7]187}。该月《群众日报》还报道了五分区政治部创办的“流动阅览室”把一些书籍、连环木刻、画报等轮流到各个连队进行展览，开展了部队的政治文化娱乐工作，解决了宣传教材缺乏的问题^{[7]202}。此外，开展读书读报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1937年6月，延安青年流通图书馆开馆，为了达到更广泛地教育青年和社会大众的目的，青年流通图书馆多次发起了扩大读者运动，通过发函、召开读者座谈会、口头宣传等形式，动员和吸引更多的读者到馆阅览书报。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上通过《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提出要研究群众兴趣所在，使群众将读报工

作与生产生活联系起来,使读报组成为团结群众推动工作的核心^[12]。

3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实践成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3]^[69]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党中央在大后方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社会教育运动等,涉及了边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对确保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3.1 服务政治建设,提升干部队伍理论水平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4]党初入陕北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数量严重缺乏、干部的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大批优秀的干部和群众领袖在之前惨烈的战争中光荣牺牲,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干部的需求,而党的队伍里,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新老干部对于新的革命形势尚未形成正确的认识,政治觉悟有待提高。而边区图书馆工作在党的政治建设上作出的突出贡献就是为党开展干部教育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发展干部教育成为党的工作重点。1937年1月以后,围绕革命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周边地区,相继领导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50多所干部学校^[15]^[66],图书馆作为学校的必要设置,服务于陕甘宁边区时期干部教育,为教育教学开展提供所需图书资源。陕甘宁时期创办的干部学校,从创办的宗旨来看,都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宣传为灵魂和统领^[15]^[69]。不论是干部学校的图书馆,还是社会上的公共图书馆,都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作为馆藏重点,为广大干部、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供书报服务。整风运动是陕甘宁时期规模最大最为集中的一次干部教育运动,通过对全党思想上的整顿,实现了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其能够顺利开展,图书馆

在提供场所和书籍上都功不可没。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在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6]建立干部学校,进行干部教育,为干部提供丰富的理论书籍,促进其在思想上的进步,实现其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提高,无疑是培养“最好的干部”的重要途径。

3.2 服务经济建设,促进边区生产力发展

经济问题是陕甘宁边区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当时非常贫穷落后,农业商业手工业遭到革命和战争破坏,1937年到1940年年底,边区的财政政策还处于“争取外援,休养民力阶段”,国民政府拨出的军饷和爱国人士的捐助占到边区财政总收入的绝大部分^[17]^[3]。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许多革命志士不断涌入边区,脱产人员增加,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展开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生活资料十分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顿。在这样的严重困难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制定了“财政经济政策要迅速地转变为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17]^[4]。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对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边区经济,实现边区人民的自给自足,第一要素便是充足的劳动力。在陕甘宁边区有100万女性,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女性,该地习俗是妇女不参加田间劳作,且到抗战初期,仍有大部分妇女缠足,不具有社会劳动的能力^[18]。在劳动力缺乏的状况下,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建设是必要的,改变妇女的传统观念就成了一项必要工作。在1939年的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就指出:“特别要注意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过去边区参加生产的还不多,甚至有的地方以为妇女参加生产是很羞耻的事情,这方面我们要进行很大的教育说服工作。”^[19]同年,《中国妇女》创刊,向边区女性传播先进理念。1943年,蔡畅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的言论,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通过经济独立获得自身的解放^[20]^[20]。这一年,是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的一年,从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就这样,妇女解放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妇女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生力军^[20]。为了改变边区的落后状况,党还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自然科学运动。

1940年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自然科学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的效果是难以估料的……”^[21]为了更好地激发边区群众参与自然科学运动的热情,党更进一步领导创办了各种类型的科普读物及自然科学书刊,并通过展览会、陈列馆等鲜活的方式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图书馆通过报刊、各种宣传活动传播“男女平等”进步观念,动员广大妇女参与到边区革命建设中去,把广大妇女从封建落后中解放出来,在促进妇女进步的同时,壮大了边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而建立自然科学研究会,进行科学研究并使研究成果在抗战中形成战斗力量,与大生产运动相配合,利用自然科学运动成果来推动经济方面的对敌斗争,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科学性,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3.3 服务文化建设,促进边区文化繁荣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13]695}。陕甘宁边区时期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13]698}。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事业服务于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图书馆体系,涵盖了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其他系统图书馆、基层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等。这些图书馆上可服务于党中央领导层,下可供基层广大劳动群众使用,覆盖范围广,服务群体多样,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的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这一时期在解放边区群众思想、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养和促进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书馆本身就是文化得到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上指出:“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22]中国共产党将民众的文化教育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图书馆为这一任务的顺利推进作出重大贡献。在学校教育上,党领导建立的一大批中小学图书馆为学生们的学习阅读提供资料;在社会教育上,依托公共图书馆、基层图书馆和民教馆等,党领导群众举办民众夜校、文化补习班,开展冬学和识字运动;还有党领导发起的自然科学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医疗卫生运动等,借助报刊读物和图书馆中的科学书籍,普及科学知识

以反对封建愚昧和迷信活动,帮助提高边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图书馆在文艺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小觑。文艺活动作为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对党的许多革命事迹的演绎,能更快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对群众起到动员教育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而更快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23]321}。这就更加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好图书馆丰富的图书资源,提升革命理论素养,更好发挥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总之,依托图书馆,一系列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得封建社会遗留给边区人们的愚昧和落后得到改善,人们学习了先进的思想理念,树立起进步的革命信仰,边区的文化建设事业得以繁荣发展。

4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启示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革命中心任务,服务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服务边区人民的革命进步教育,对在当时物质、精神都极为匮乏的陕甘宁边区传播先进思想,团结教育群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促进革命最终走向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图书馆建设经验,对当今我国图书馆建设工作的展开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4.1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推进图书馆建设

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陕甘宁边区时期,图书馆资源匮乏,为了推进边区图书馆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把发展图书馆事业当作自己的事情,边区军民共同参与,全民办馆,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踊跃参与图书馆的建设事业,不论是捐款还是捐物,抑或是对图书馆工作的改进提出意见,都大有人在。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推进图书馆建设,是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物质条件的好转使得图书馆的建设也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但新时代的图书馆建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当前许多图书馆依然面临文献资源缺乏的问题,依靠社会资源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图书捐助和业

务援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的重要途径。同时,图书馆建设仍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阅读需求,不断改进图书馆的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图书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供贴近群众需要、独具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传播好优秀民族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24]。

4.2 从实际出发,创新开展图书馆工作

在实践工作中,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始终围绕革命中心任务,积极参与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馆思想,创造了独特的服务形式。在自身建设上,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从实际出发,不追求图书馆建设的大型化,而是在边区教育普遍落后的情况下,针对性地设立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互助和加强交流的活动,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节约的作风,推进图书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面临图书馆资源紧缺的问题时,依靠群众,走全民办馆道路;在战争爆发,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充满阻碍时,提出建设“流动图书馆”“随军书店”,灵活运用图书馆资源;在以文化程度低的广大农村群众为服务对象时,图书馆积极开展读书读报活动、识字活动,以丰富的形式传播文化,开展教育,发挥其文化育人作用。

从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出发,探索图书馆建设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开展图书馆建设工作无疑是在应对新时代图书馆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方法。对于传统图书馆,把图书馆建设与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地方图书馆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双赢,不失为提高传统图书馆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办法;对于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则要立足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数据化、智能化手段,最大限度发挥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空间的价值^[24]。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工作,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精神和文化需求,与时俱进。

4.3 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方针路线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5]。坚持党的领导是图书馆建设工作开展的根本保证。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大政方针。在陕甘

宁边区,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高扬着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其目的是要争取民族解放,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26]。这一政治路线,明确了图书馆建设工作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从确立办馆方向、指导方针到馆舍具体建设再到书刊采购与经费安排,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都给予了实际的关心与支持,保证了边区图书馆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文化教育是国家治理的永恒主题。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单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领导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重要工作内容,更是进入新时代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战略要求。图书馆在新时代的功能作用远丰富于革命战争年代,但从本质出发,始终都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不论是传统图书馆还是新型信息化图书馆,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面对当今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频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强化党对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图书馆建设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5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6日致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23]681}回溯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图书馆建设历程,历经艰辛但仍旧取得巨大成绩。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事业,为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教育干部、动员群众的需要而产生,配合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开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图书馆以其多样的功能支撑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这段艰难但却光辉的岁月,创造了历史上为人称赞的“延安精神”,从社会教育运动到延安整风运动,从妇女解放运动到大生产运动,不论从建馆形式还是建馆内容,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馆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27]回顾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的历史，对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进行探析，总结借鉴其经验，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节点上，做好新时代图书馆工作和做好新时代文化教育

工作的需要。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作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党的带领下，实事求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始终以人民为根基，服务人民，守护好、传播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是我们在当今变幻莫测的国内外环境下，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在新的历史关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 [2] 汪小宁.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3] 杨安妮.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1937—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7.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
- [5] 周江平.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之成因[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S2):73-75.
- [6] 刘东社,刘全娥.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9.
- [7] 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陕西:西安出版社,1998.
- [8] 唐宝富.抗日根据地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0.
- [9] 申少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馆事业[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8):2-14.
- [10] 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11] 赖伯年,田林燕,任成录,等.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纪事:上[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8(1):50-51.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68.
-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2.
- [15] 谭虎娃.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 [17] 张晓彪,萧绍良,司俊.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M].北京:中共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 [18] 崔兰萍.我党引导陕甘宁边区妇女争取经济独立的重要实践[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84-87.
- [19] 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95.
- [20] 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7.
- [21] 杨梦丹.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6.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6.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4] 张杰.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播功能[N].吉林日报,2022-09-19(04).
- [25]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99.
- [26] 刘一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图书馆发展比较[J].陇东学院(社会科学版),2003,14(3):81-84.
- [27]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9.

作者简介：刘显利，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颖，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收稿日期：2023-01-06

本文责编：郑秀花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多维视角的学科潜力分析与实践研究*

于 曦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天津 300387)

摘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图书馆学科分析工作可以为学校职能部门提供学科整体概况,为学科发展规划提供数据支持。但目前学科分析工作在研究范畴、研究数据、学科分类、评价指标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天津师范大学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学科潜力分析,全面获知学科发展的真实情况、优势和不足,研究内容包括潜力学科识别、学科结构分析、论文绩效指标分析、单篇论文主题定位、学科施引文献分析、作者和学院贡献度分析、学科动态追踪、竞争机构对比以及ESI全球排名前1%学科入围难度分析,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学科分析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科潜力;学科分类;高校图书馆;Web of Science;ESI

中图分类号:G258.6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Potential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disciplinary analysis in libraries can provide comprehensive overviews of disciplines for institutional departments and offer data support fo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lanning. However, current disciplinary analysis work faces certain issues and limitations in research scope, data sources,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has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disciplinary potential, aiming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situatio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ncludes identifying disciplines with potential, analyzing disciplinary structures, evaluat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papers, positioning the themes of individual papers, analyzing disciplinary citation literature, assessing author and college contributions, tracking disciplinary dynamics, comparing competitive institutions, and analyzing the difficulty of disciplines' inclusion in the top 1% of global rankings according to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actic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isciplinary analysis work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 words disciplinary potential;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Web of Science;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1 引言

随着“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实施,学科建设与发展愈显重要。学科分析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不仅为学科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也为学校职能部门提供决

策参考。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学科数据分析工作,尤其是潜力学科的预测与分析,在近几年成为研究的焦点。首先,基于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潜力学科研究与分析的论文呈井喷式增长;其次,图书馆开展学科分析实践工作,撰写了大量关于潜力学科的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全域学科分类映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TJTQ21-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评价分析报告^[1]。但是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和实践,ESI在潜力学科分析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仅仅依靠ESI开展潜力学科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学科发展问题不能被发现。与此同时,教育部和科技部为改变学术评价中的不良导向,先后下发了关于“破五唯”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学科分析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高校图书馆也因此弱化了学科分析工作^[2]。但笔者认为,潜力学科的分析对学校的学科发展依然有其促进作用,对学科进行全面画像才是学科分析工作的落脚点和根本出路。本文在文献调研、网络调研和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潜力学科研究的不足,并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开展对潜力学科的全面画像工作,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促进学校办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整体提升,也为同行从业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潜力学科研究现状及不足

2.1 潜力学科研究现状调查

在潜力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中,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潜力学科的识别:学者们提出了潜力学科的指标和计算方法,如学科比重指标 Q^3 、学科欠缺度指标 P^4 、学科潜力值 Qi^5 、学科EV值^[6],以及基于灰色系统理论^[7],排名转换系数^[8]、学科区位商^[9]等方法,开展对潜力学科发现和预测分析。②潜力学科入围时间的预测:管翠中等人^[10]找到已入围某ESI学科的最后十个机构,计算近十年中每年这些机构发文总被引频次的平均值,用这十年的平均值拟合成入围时间线,再拟合目标机构该ESI学科近十年每年发文总被引频次的的时间线,两条时间线的交点就是可能入围的时间;顾东蕾等人^[11]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不仅预测入围时间,还提出预测入围后所处排位的计算方法;王雪^[12]和朱文佳等人^[13]提出了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入围时间。③潜力学科动态评价、追踪和预警:许子媛^[14]提出了ESI学科动态监测系统 and 三级预警指标。蒋德凤^[15]提出从纵向维度(国内排名和学科潜力值的变动)和横向维度(同类机构数据的动态变化)两方面的分析,实现对ESI学科动态评价以及持续追踪分析。④潜力学科在竞争机构之间的比较:刘玉婷^[16]提出从发文年代、期刊分

布、院系贡献度、作者贡献度、合作情况以及竞争对手情况等角度,进行ESI学科竞争机构间的实证分析。⑤潜力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和修正:程建萍等人^[17]提出根据ESI22个学科在ESI和InCites数据库的数据偏差,分别计算出22个学科误差修正因子,在此基础上建立ESI的潜力学科修正模型。杨爱英等人^[18]对7种潜力学科识别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每一种方法的优缺点。

除了学术论文之外,一些高校还开展了针对ESI学科分析的实践工作。通过网络调查和走访调研,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22所提供了ESI分析报告。报告形式包括ESI数据简报、ESI研究前沿、ESI学科动态和ESI学科分析。其中在网站上明确提出开展潜力学科分析的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2.2 潜力学科研究存在的不足

研究者在提出潜力学科预测方法的同时,也分析了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①ESI和InCites数据库的来源文献与被引频次统计源不同,各种指标统计时间不同步。②ESI统计的机构是单个分散的、未经过标准化处理的。InCites统计的机构是将机构所有变体,如曾用名、缩略名、附属二级组织及拼写变体等进行合并。③预测的方法是基于引用频次的差距推测排名的差距,忽略了学科之间引用频次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④忽略了ESI基准值(入围ESI最后一位机构的总被引频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目前关于潜力学科的分析,无论是论文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基本是围绕引用频次这个单一指标的分析。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也是由于不能精准地统计引用频次,造成对潜力学科预测存在误差。学科的发展受多因素制约,引用频次是与科研规模相关的指标。仅依靠科研规模指标评估学科,提供的信息量有限。对潜力学科的分析应从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探索学科发展趋势,发现问题和不足,制定有效提升措施,才是潜力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因此,笔者认为潜力学科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2.2.1 潜力学科的研究范畴狭窄

目前对潜力学科的研究仅限于对即将入围ESI全球排名前1%学科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范围过于狭隘。学科潜力的表现不应只停留在是否入围ESI,还应表现在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等级

的提升,与国内一流学科差距的减少,能否申请到博士点以及在各类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位次的上升等。ESI学科划分宽泛,忽略了大部分人文社科类学科。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强调了中文期刊论文在科研评价中的重要性。因此潜力学科的分析不应当排除人文社科类学科和中文期刊论文。此外,优势学科由于其依然具有潜在的上升空间而应继续保持跟踪,分析学科是上升还是退步,起到促进或预警作用。对学科潜力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也符合国家“破五唯”的初衷。

2.2.2 研究数据收集不全

潜力学科预测分析数据来自ESI,仅包括研究论文(Article)和综述论文(Review),数据源单一,文献类型过少。此外,研究论文和综述论文的学术价值不同。综述论文仅是对某一研究主题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归纳总结,往往是学科领域的专家或者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学者所撰写,这些论文相对容易获得引用。一般情况下同一学科,综述论文的引用次数会高于研究论文。但从推动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综述论文的价值不及研究论文,因为综述论文基本不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不做新的研究命题,不开展新的实验或推理。但是在潜力学科的分析中还没有人开展综述论文和研究论文各自贡献情况的分析。

2.2.3 学科分类未统一

现有学科分类体系多样,但没有进行统一和对应。各数据库为方便文献管理,分别设定了各自的学科分类体系,同一学科在不同数据库中的数据范围不同,使得分析结果存在偏差甚至错误。

国内外的学科范畴不同。如“生物信息学”在ESI中被分配到“计算机科学”,在中国教育部学科分类中被归入到“生物学”一级学科。“高分子”在ESI中一部分归入“化学”,一部分归入“材料科学”,而在中国教育部学科分类中被归入到“化学”一级学科。国内外学科分类范畴的交叉和不同,造成ESI所展现出来的学科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学科的实际情况。

数据库的学科粒度不同,如ESI体系学科分类宽泛,WOS(Web of Science)体系学科分类细化,两者学科粒度不同。某一ESI学科的数据集分布在多个WOS学科中,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机构的科研产出随着研究方向的偏移会从某一ESI学科转向交叉范围较

大的另一学科。对潜力学科需要进行更细粒度的学科分析,才能发现自身学科的结构、发展趋势、差距和不足。

2.2.4 评价指标维度单一

目前潜力学科的分析仅停留在引用频次这个指标上,未开展多维度、多指标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如深入到论文层面的单篇文献的学科(主题)定位;施引文献的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分区和所属学科分析;多作者论文的作者贡献度分析,学科的学院贡献度分析等。

2.2.5 不同学科同等对待

在已开展的潜力学科研究成果中,没有针对不同学科入围ESI难度的分析。笔者曾调研过全国师范类高校和天津市属高校ESI学科入围情况,发现入围高校数最多的学科是“化学”,其次是“材料科学”。可见不同学科入围ESI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在分析时不同学科应当区别对待,不能简单一刀切。

3 天津师范大学学科潜力分析的实践

受校领导和学校职能部门的委托,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对学科潜力的分析研究(见图1)。深入数据内部,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影响学科发展的各个因素,开展对潜力学科研究的全面画像。



图1 学科潜力研究总体框架和流程

3.1 前期调研和准备

自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2016年开展学科分析工作以来,笔者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与开展学科分析工作时间长、影响力高的图书馆进行学习交流。并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现状,研究前沿和进展。此外还深度研究了多种平台的操作,如InCites、ESI和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学习

数据清洗及分析软件,如OpenRefine,可视化软件VOSviewer、CiteSpace、Cytoscape以及绘图工具RAW和E-Charts,对比分析一些绩效指标的意义、作用和计算方法。

3.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针对天津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即已入围ESI的学科,如化学学科;国家或天津市重点学科,如心理、政治和历史学科。潜力学科如即将入围ESI的学科,如材料学科;申请博士点的学科,如生物和地理学科。

3.3 学科分类体系的选择和映射

学科潜力的研究既要与国际接轨也要考虑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因此学科分类体系的选择包括国外ESI学科分类体系和国内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以下简称《学科目录》)学科分类体系。如果分析能否入围ESI,就依据ESI学科分类;如果分析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能否升级,能否成为一流学科,能否申请到博士点,就依据《学科目录》学科分类。人文社科类学科在ESI中没有被精细划分,且引用关系不明显,因此分析时采用教育部《学科目录》分类体系。

由于学科分类体系划分标准不同,在进行学科潜力分析和文献收集之前,本馆开展了不同分类体系之间的学科映射工作,尤其是不同数据库学科分类与我国《学科目录》之间的对应关系,确保用于分析的数据全面、准确。

3.4 文献类型的选取

针对ESI评价体系,统计数据仅来自目标学科近10年被SCI和SSCI收录的研究论文和综述论文。教育部学科评估要求,除了中外期刊论文,各级各类项目和获奖情况之外,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需要统计专著,对于自然科学类学科需要统计分析专利及转化,对于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类学科需要统计业内公认的顶级会议论文。

3.5 对标机构的选择

针对不同的学科和需求,对标机构的选择标准不同。通常受学院或职能部门委托的学科分析,都会指定对标机构。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定,就以学校的发展方向 and 所处位置为依据,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对标机构。如分析即将入围ESI的潜力学科,对标机构就是入围ESI但排位相对靠后的高校。如果是为了提

升学科评估地位,对标机构就是处于上一级别的高校。如果是为了申请博士点,对标机构就是已经具有博士点的高校。如材料科学以天津工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已入围高校)为对标机构,心理学科以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学科评估A类高校)为对标机构,化学学科以贵州大学、华侨大学(具有博士点高校)为对标机构。

3.6 基础数据的获取

学科潜力的分析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数据,包括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opus、CNKI、CSSCI、超星等商业数据库,以及专利数据、基金数据、获奖数据、国际知名学科排名数据、自然指数排名数据和教育部学科评估官网数据等网络公开数据。

不同来源的数据会有一些的重复,需要去重。数据库中作者署名存在标注不规范或错误的现象,二级机构的书写形式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检索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确保数据查全查准,对初步检索的结果进行二次校对。数据下载时要考虑到下载格式是否与分析工具兼容,以便于下一步的统计分析工作。

3.7 学科潜力的多维分析

学科潜力的多维分析包括潜力学科的识别、学科结构分布、学科论文绩效指标分析、单篇论文的主题定位、论文的施引文献分析、论文的作者贡献度和学院贡献度、学科动态追踪以及与竞争机构的比较、学科入围难度的分析(见表1)。

表1 学科潜力的分析维度和内容

序号	分析维度	具体内容
1	潜力学科的识别	ESI学科分类和教育部《学科目录》分类下的识别
2	学科结构分布	论文百分位区间分布
3	论文绩效指标	CNCI ^① 、JNCI ^② 、学科百分位、JCR、分区
4	单篇论文主题定位	Incites Citation Topics、CWTS、Dimensions,结合论文题名、摘要、关键词
5	论文施引文献	文献数量、学科属性
6	论文作者贡献度	作者单位、作者排位
7	论文学院贡献度	学科的学院分布、学院的学科分布
8	学科动态追踪	学科排位变化、潜力值变化
9	竞争机构比较	对标机构是师范类高校、博士点高校、天津地区高校
10	学科入围难度	WOS收录的期刊数量,ESI入围机构数量,引文规律分布,相邻机构被引频次差距分析

3.7.1 潜力学科的识别

开展国内外两种分类体系下的潜力学科的识别。对于ESI潜力学科的识别,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方法是计算学科潜力值。学科潜力值是机构某个ESI学科在InCites数据库中的被引频次除以该学科ESI入围阈值(最后一位入围ESI机构的总被引频次),潜力值在0.7以上的学科即为潜力学科^[19]。国内学科分类体系下的潜力学科识别,可通过学科映射将InCites数据库中的论文映射到对应的教育部一级学科。通过计算学科论文总被引频次与该学科中国大陆地区平均基准值^③的比值,比值大于1的学科即为潜力学科。

天津师范大学化学学科已入围ESI,有希望入围的学科是材料科学、工程学(潜力值在0.7以上),国内学科分类体系下的潜力学科包括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环境科学和工程(比值大于1)。限于篇幅,以下仅对ESI材料科学展开分析。

3.7.2 学科结构分布分析

结构分布用来分析学科论文在不同百分位区间的分布情况^[6]。百分位区间包括0%—1%、1%—10%、10%—20%、20%—50%、50%以上,共5个百分位等级。各区间论文的实际百分位应与期望百分位相近,这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学科论文的结构分布是否合理决定今后学科发展的趋势,结构合理学科会获得良性发展,结构不合理(高百分位区间的论文少,低百分位区间的论文多)会使本来很有希望入围ESI的学科失去发展优势。

ESI材料科学顶端论文已达标准(实际百分位1.69%,高于期望百分位1%),其他区间也基本达到要求。从目前看结构还算合理,但论文数量与已入围机构相比较少,发展势头一般。

3.7.3 学科论文绩效指标分析

开展对单篇论文多个绩效指标的综合分析,指标包括论文的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期刊规范化引文影响力(JNCI)、论文所处百分位、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和分区。这些指标可以综合反映机构学科的内部情况。分析学科论文各类绩效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学科发展的潜在问题、优势和不足。

天津师范大学ESI材料科学论文的CNCI值主要集中在0到2.08之间,近10%的论文CNCI值超过2.08,最高值达到23.94,顶端论文已有一定的积累。但CNCI值在1以下的论文占比76%,说明大多数的论

文表现一般。该学科中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的CNCI值为2.61,远小于最高值23.94。说明在对同学科论文进行被引频次比较时要考虑到论文的发表时间和文献类型。ESI材料科学发文期刊的影响因子主要集中在1.08到3.8之间,超过10%的论文期刊影响因子超过3.8,最高的期刊影响因子接近19。由此可见材料科学发文期刊质量较高。其中一篇期刊影响因子高达18.98的论文的CNCI值仅为0.66;而另一篇期刊影响因子为2.69的论文的CNCI值高达7.6,再一次印证了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不能作为评价其发表论文质量的依据。

3.7.4 单篇论文主题定位

ESI数据库中期刊是学科最小划分单位,期刊的学科属性决定其发表论文的学科属性。但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越来越多的期刊具有多学科倾向。如果按照引文关系来划分,几乎不存在单学科期刊。开展单篇论文的主题定位,便于对同质同类论文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发现机构实际的学科研究领域、发展方向和趋势。笔者借助Incites Citation Topics、CWTS和Dimensions等单一出版物主题定位系统,以及论文内容本身(题名、摘要和关键词等),开展基于单篇论文的主题定位分析。

3.7.5 论文施引文献分析

施引文献的数量和学科分布可以反映出学科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分析施引文献的学科属性,可以获知机构科研成果是否在学科方向上发生偏移。分析施引文献的学科分布及各学科期刊分区情况,可以了解机构该ESI学科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如果来自本学科期刊的分区都比较靠前,说明机构该学科的影响力较高。如果施引文献大多数来自其他学科,且分区较高,说明研究已经辐射到了其他学科且影响力较大,学科方向已经发生偏移。

天津师范大学ESI材料科学的施引文献分散在14个ESI学科中,其中48.66%的施引文献属于材料科学,34.29%的施引文献属于化学学科,还包括物理学、工程学和环境/生态学等。材料科学的研究影响力已经辐射到多个学科,研究方向有所偏移。施引文献中发文量位于前三位的材料科学刊物*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和*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在JCR分区中位于一区或二区。施引文献中发文量位于前三位的

化学刊物*Electrochimica ACTA*、*RSC Advances*和*New Journal of Chemistry*在JCR分区中也位于一区或二区。材料科学的研究对本学科以及对化学学科的影响力都比较高。

3.7.6 作者贡献度分析

ESI对于一篇论文中所有作者的贡献都是同等对待的,无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还是参与者。这种统计方法,没有体现出作者(机构)的贡献程度。一些机构虽然从表面上看排位不相上下,但实际的科研实力和水平可能相差甚远。如果盲目地看待排名而不深入挖掘自身机构对论文的贡献,一旦失去合作机会或排名规则发生变化,某些学科可能会出现排位迅速下滑的现象,失去优势地位。因此,在开展学科潜力分析时,应进行作者贡献度分析,对于不同排位的作者给予不同的权重,获知机构在论文中的贡献程度,以及学科的真实水平。

天津师范大学ESI材料科学中第一作者是本校教师的论文占到59%,通讯作者是本校教师的论文占到65%,用来支撑材料科学的论文中仅有一半多的论文是以本校教师为主导的(本校教师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文量排在前10位的本校作者中有一位已经退休,两位已经离职。虽然从表面看ESI材料科学的发展势头较好,但发文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有些重要的教师也不再具有科研产出。

3.7.7 学院贡献度分析

由于院系设置与学科分类并不一一对应,一个学院可以包含多个学科方向,一个学科也可分布在多个学院中,尤其是像ESI这样比较宽泛的学科分类体系,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学院贡献度分析可以发现支撑学科的学院分布和重点贡献学院;可以为校领导在学科资源和资金分配上提供参考依据;可以帮助图书馆从业人员开展对学科的分析,发现学科的发展变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学科之间的亲缘关系。

天津师范大学材料科学论文来自多个学院。论文总被引频次的61%来自“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27%来自“化学科学学院”。除此之外,还包括“水环境与水资源研究所”“生命科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甚至一些人文社科类学院,如“教育科学学院”。

3.7.8 学科动态追踪与竞争机构比较分析

学科动态追踪以及与竞争机构的比较,可以发现学科的变化情况及发展差距。天津师范大学在每一次ESI更新时都会做一期简报,对于已入围的化学学科分析排位的变化,收录机构数的变化以及入围阈值的变动;对于未入围学科如材料科学等,分析其与入围阈值的差距,学科潜力值随时间的变化,并开展对未入围学科的发文数量(专著、中外期刊论文、专利等)、总被引频次、获奖情况和基金获批情况的动态追踪。此外,笔者所在机构还开展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多所师范类高校、具有博士点的高校以及天津地区高校在发文年代、期刊分布、作者贡献、合作情况以及各类绩效指标的横向比较分析。

3.7.9 学科入围难度分析

不同学科入围ESI的难易程度不同,应区别对待,而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一个学科。根据ESI平台提供的数据,分别从收录的期刊数量、入围的机构数量、引文规律和被引频次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①不同学科WOS收录的核心期刊数量不同,如“临床医学”有近2 000个核心期刊,“空间科学”仅有50多个核心期刊。②不同学科入围ESI前1%的机构数不同,“临床医学”有4 000多个机构入围,“多学科”只有100多个机构入围。入围机构中中国大陆地区所占比例在22个学科中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大陆地区入围机构占全部入围机构比例最高的学科是“材料科学”,达到15.9%,其次是“化学”,而“精神病学/心理学”最低,仅占1%。③不同学科的引文规律不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篇均被引频次是23.61,“数学”篇均被引频次仅为4.34。④不同学科

表2 学科入围难度分析

序号	分析指标	位于前三位的ESI学科	位于后三位的ESI学科
1	WOS收录的期刊数量	社会科学总论,临床医学,工程学	微生物学,空间科学,多学科
2	ESI入围机构数	临床医学,社会科学总论,工程学	数学,空间科学,多学科
3	ESI大陆机构入围比例	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	经济与商业,空间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
4	篇均被引频次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空间科学	社会科学总论,计算机科学,数学
5	相邻机构被引频次差距	临床医学,社会科学总论,工程学	空间科学,数学,多学科

入围的相邻机构之间总被引频次分布情况不同,差距较大。“临床医学”入围机构之间的总被引频次分布范围较广,相邻机构之间的总被引频次差距较大,“数学”和“多学科”入围机构之间的总被引频次分布范围较窄,相邻机构之间总被引频次的差距较小(见表2)。

除了ESI学科,人文社科类各学科之间提升难度也是有差异的,如不同学科包含的二级学科数量不同,学科覆盖的广度不同;不同学科被CSSCI、SSCI收录的期刊数不同;在学科评估中不同学科参评的机构数不同。此外,由于国情和政治因素,也会限制一些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注释:

- ①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CNCI)是一篇论文被引频次与同文献类型、同出版年、同学科领域论文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
- ②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ournal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JNCI)是一篇论文被引频次与其发表期刊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论文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
- ③ 一个学科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平均基准值可通过Incites平台获得。

参考文献:

- [1] 万慕晨.“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分析服务探索[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5):55-60.
- [2] 陈信,杨婷,刘盈曦.高校图书馆学科分析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4):1-5.
- [3] 董政娥,陈惠兰.基于ESI和InCites数据库的东华大学学科发展预测[J].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5):689-694.
- [4] 陈仕吉,史丽文,左文革.科研机构潜势学科的认识方法与实证分析: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J].情报杂志,2012,31(2):43-47.
- [5] 韩丽,郭丽然,康冬梅.基于ESI和Incites的潜力学科分析与预测: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J].情报探索,2017(2):27-35.
- [6] 汪莉.基于ESI和InCites的高校潜力学科发展预测[J].情报杂志,2017,36(2):53-58.
- [7] 秦萍,李雪琛,梅秀秀.高校潜力学科发展预测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1):88-91.
- [8] 侯志江.基于InCites预测高校学科入围ESI前1%时间的方法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4):37-45.
- [9] 董政娥,陈惠兰.基于区位商、ESI和InCites数据库的学科结构分析与学科集群判断[J].图书馆杂志,2018,37(2):90-100.
- [10] 管翠中,范爱红,贺维平,等.学术机构入围ESI前1%学科时间的曲线拟合预测方法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J].图书馆情报工作,2016,60(22):88-93.
- [11] 顾东蕾,武莹,邱家学,等.基于WOS的学科发展预测研究[J].现代情报,2014,34(6):32-40.
- [12] 王雪.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高水平学科预测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6):45-49,117.
- [13] 朱文佳,朱莉.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法的ESI前1%学科入围时间预测模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10):137-145.
- [14] 许子媛.“双一流”建设下高校优势学科进入ESI动态监测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4):76,77-81.
- [15] 蒋德凤.ESI学科动态评价与持续追踪分析模式研究:基于Incites学科评价角度[J].现代情报,2018,38(4):149-155.
- [16] 刘玉婷.基于ESI和InCites的首都医科大学潜力学科预测与分析[J].医学教育管理,2018,4(1):61-70.
- [17] 程建萍,刘建辉,叶玫.基于ESI的潜力学科预测模型修正和实证分析[J].情报科学,2018,36(12):22-24,40.
- [18] 杨爱英,鲍玉来.7种ESI学科潜力值计算方法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19,39(7):170-177.
- [19] 衣春波,许鑫.基于ESI数据的高校优势学科实证分析[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1):47-54.

作者简介:于曦,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学科服务、数据分析。

收稿日期:2023-03-15

本文责编:王晓琳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研究*

苏杰初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文章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在分析归纳学科服务现状及其能力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构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其评价体系,并以某高校图书馆为例,实证分析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由4个关键过程域、16个关键实践构成,可以准确衡量学科服务动态过程的能力水平,为学科服务改进升级提供依据及方案,为高校图书馆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成熟度等级;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58.6; G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Model and Evaluation of Disciplinary Service Capability Maturity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s,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ynthes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disciplinary services and the literature 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It aims to construct a mod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maturity of disciplinary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sing a specific university library as a case study, the practic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isciplinary service capability maturity evaluation system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key process domains and sixteen key practices, providing an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he capability levels in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disciplinary services. It serves as a basis and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and upgrading disciplinary services, and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disciplinary servic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maturity level; evaluation system

1 引言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的风险,我国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实困境^[1],充分说明图书馆在学校的中心地位尚难形成^[2]。自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以来,学科服务不断嵌入到高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图书馆作为

高校学术性服务机构的地位也得到不断加强。同时,主动对接高校“双一流”建设需求,创新服务内容,以提供更高层次的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3]。学科服务能力既是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质量的保证,又是学科服务创新的驱动力量,如何准确评价学科服务能力的等级水平,是促进学科服务优化与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前提。

因此,笔者依据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在分析归纳学科服务能力评价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索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中国学者学术论文发表的语言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1XJA87000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的伦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FTQ003)的成果之一。

建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体系,并以某高校图书馆为例,实证分析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在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学科服务要素能力分析、如何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1)从信息服务能力、知识服务能力、数据服务能力等学科服务要素能力的构成及影响因素方面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4-6]。通过对学科服务要素能力的研究,从组织结构层面多角度分析学科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评价指标的覆盖面。(2)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系统因素分析法等方法,结合结构理论、模块化理论、卓越管理理论等构建学科服务能力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可靠性和有效性的论证^[7-8]。这些评价方法和理论的介入创新了评价手段,提高了静态评价合理性,但对学科服务过程能力的针对性不足,也缺乏对学科服务能力的动态评价研究。(3)以组织文化理论、能力理论和SECI(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Internalization)知识创造螺旋理论为基础,从学科服务的结构、需求、内容、模式等方面进行学科服务能力的提升策略研究^[9-11]。国外学者关于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评价研究侧重在评价方法、影响因素、服务评价方面展开。1988年,Parasuraman等人提出用户感受值与期望值为评价指标的SERVQUAL服务质量评价方法^[12];Suresh等人以SERVQUAL法评价分析印度大学图书馆的用户满意度影响要素^[13];Idiegbeyanose等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绩效的激励因素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促进措施^[14]。

此外,国内外学者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在过程能力定位和进阶的评价优势,对图书馆管理与服务能力展开多维度的评价研究,为推动高校图书馆管理优化及服务能力提升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图书馆整体能力评价方面,Hart和Amos从目标、方法和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结果使用四个过程构建图书馆评估能力成熟度模型(Library Assessment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LACMM),进而探索图书馆整体评估效能的优化方法^[15];王杰则从资源和过程维度构建图书馆能力成熟度模型,提出了图书馆整

体服务能力成熟度的评价方法^[16]。在数据管理能力评价方面,Crowston等人发现数据管理能力和水平的评估与改进是提高数据可靠性和价值性的重要途径^[17],同时,叶兰研究表明对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实证评估^[18],是检验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在数据服务能力评价方面,Kouper等人根据高校图书馆数据服务实践分析,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数据服务成熟度构架和建议^[19]。在知识服务能力评价方面,周莹等人从过程能力与基础资源能力维度构建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以实证评价检验了评价模型的可靠性^[20];张旭则从服务过程维度,构建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体系,以期通过智库服务能力持续改进优化,实现高校图书馆的高水平知识服务^[2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就学科服务能力的评价方法侧重于静态的、从绩效方面进行评价,缺乏把学科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评价,而且绩效评价存在评价方法可操作性不强^[22],特别是缺乏过程性的动态评价和比较评价,所以对学科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性较弱。虽然也有运用能力成熟度理论和模型对图书馆管理与服务能力展开多维度的评价研究,但缺乏对学科服务主题和服务过程的能力成熟度研究,也未形成学科服务能力成熟模型及评价体系。因此,笔者试图引入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理论和方法,扎根学科服务能力评价及提升策略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总结提炼学科服务的关键过程域和关键实践,探索建构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体系,实证评价广西某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水平,为高校图书馆提升学科服务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及实践参考。

3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设计

3.1 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

能力成熟度能动态定位能力的发展阶段,并为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最优路径^{[21][41]}。1987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建立了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CMM),并以此为评价软件开发过程、开发能力的工具^[23]。能力成熟度模型是一种过程模型,其理念是以各环节的相互协

作实现持续改进,即通过对关键实践的规范化、流程化控制,从而达到服务过程优化与服务能力提升。CMM的外部结构是能力成熟度等级,一般分为5个成熟度等级;内部结构由关键过程域、关键实践及共同特征等构成。

能力成熟度模型是评价过程能力的模型,适合从过程角度进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能力成熟度模型不仅能准确定位过程能力的水平,而且是通过潜在性过程能力和现实性过程能力的综合评价来实现的^{[21][34]}。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是满足用户学科服务需求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能力的潜在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因此,能力成熟度模型对学科服务能力进行评价具有很高的适切性。

3.2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及内涵特征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包含成熟度等级、关键实践和关键过程域,既是对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进行明确定义、管理、测量、控制理论框架,也是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的基础。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分为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可预测级和优化级5个递进等级。这5个成熟度级别为测量某一过程成熟度以及评价其过程能力定义了一个有序的级别^{[24]9},高级别的等级都必须经过前一等级并以它为基础,随着级别的增高,学科服务效果和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各等级的内涵及特征为:

①初始级属于无序服务,这一等级的高校图书馆有学科服务需求,处于被动管理、过程无范、个人经验、缺乏保障、效果难料的无序化经验化服务;②可重复级属于项目服务过程,处于这一等级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有方法与技术应用,成功经验能够被复制,形成项目管理、过程明确、计划到位、方法应用、成效初现的意识化目标化服务;③已定义级属于过程服务过程,已定义级学科服务已形成系统管理、过程规范、体制健全、保障有力、成效可测的系统化流程化服务;④可预测级属于量化服务过程,可预测级学科服务能够实现服务水平的量化评价,形成精细管理、过程可视、多元协同、全面保障、成效量化的定量化精准化服务;⑤优化级属于动态创新服务过程,优化级学科服务处于高校图书馆行列的领先地位,形成标杆管理、过程优化、自动自发、持续创新、成效卓越的动态化服务。

3.3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设计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内部结构包括关键过程域、关键实践与共同特征。关键过程域是为实现学科服务某一特定目标所需要包含的所有关键实践的集合体;关键实践是有效实现学科服务关键过程目标的决定性活动,关键实践表示“要做什么”,而不是“如何实现目标”;共同特征是表明某个学科服务关键过程域的实施和规范化是否有效、可重复且持久的一组属性,包括统筹规划、组织管理、监督实施和评估改进4个方面,关键过程域所包含的关键实践全部按这4个共同特征加以组织^{[24]186},以保证关键实践的规范施行和目标实现。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由外部结构(五个等级)及内部结构组成,每个关键过程域都有一些特定的目标,通过相应的关键实践组合来实现这些目标,模型各结构成分逐级递进和相辅相成构成了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主体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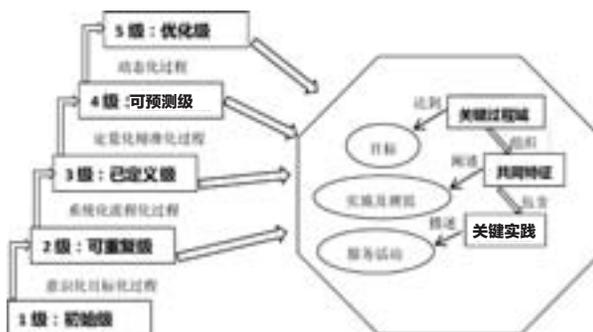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主体框架

4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的评价体系构建

学科服务能力主要表现在服务过程中,一个完整的学科服务过程不仅包括馆员队伍、资源平台、信息技术等基础资源的建设过程,而且包括学科服务需求的满足过程。因此,学科服务能力表现为基础资源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

4.1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关键过程域及关键实践

笔者根据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以学科服务过程及目标、各成熟度等级内涵及特征为提炼逻辑,运用文献综合研究法,提炼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的关键过程域及关键实践,形成扎根于已有文献资料的能力成熟度指标。

通过分析已有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相关文献,归纳文献中涉及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维度、等级水平及服务实践的核心观点,进而精简提炼得到16个关键实践;结合学科服务的馆员队伍、资源平台、信息技术等基础资源的整合过程和学科服务实践的提供过程,分析各个关键实践之间的联系,提炼出包括学科馆员建设、资源平台建设、信息技术协同和学科服务提供的4个关键过程域,如表1所示。

4.2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

基于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成熟度等级、关键实践、关键过程域等要素结构,结合已提炼的学科服务关键实践和关键过程域,综合形成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的一级指标由4个关键过程域组成,二级指标则由16个关键实践组成,具体如表2

所示。

5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的实证分析

5.1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数据收集与评价体系检验

为评价广西某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的成熟度,本文根据表2所示的评价体系设计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问卷,并进一步检验该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1分到5分为16个关键实践根据完成的程度进行计分,将问卷交给评价小组打分。评价小组由熟悉该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人员组成。问卷回收到学科专家(2人)、管理领导(4人)、学科馆员(8人)、其他馆员(6人)共20人的评价数据。

表1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的关键实践与关键过程域提炼

序号	文献核心观点(已精简)	关键实践	关键过程域	过程域目标
1	团队建设 ^[25] 、功能性团队建设 ^[26] 、智慧型学科服务团队 ^[11]	智慧团队建设	学科馆员建设过程	通过不断优化管理和实施引培,逐步提高学科馆员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服务素养,全面增强学科服务主体作用
2	馆员培养是智慧化学科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 ^[27] 、智慧馆员 ^[28]	智慧馆员培育		
3	学科馆员培训 ^[29] 、馆员能力培训 ^[30] 、学科馆员专业素质培养 ^[31] 、学科馆员专业、技术及沟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5]	学科馆员培训		
4	学科馆员为主体 ^[25] 、学科馆员设置 ^[32] 、建立和完善学科馆员制度 ^[33-34]	学科馆员配置		
5	学科服务联盟平台建设 ^[5, 11] 、跨学科协同、“资源+技术”深度融合的智慧型学科服务平台建设 ^[32]	学科联盟平台建设	资源平台建设过程	以资源与平台一体化建设增强学科服务的信息资源、服务通道和存储共享门户的基础保障作用
6	平台是学科服务的桥梁和通道 ^[34] 、服务平台系统 ^[20] 、学科服务平台建设 ^[35-36]	服务平台建设		
7	整合特色学科资源 ^[31, 37] 、综合性的学科资源导航库 ^[34] 、学科资源建设 ^[38]	特色学科资源建设		
8	馆藏资源配置与提供 ^[32] 、馆藏资源与学科资源需求的匹配 ^[35]	馆藏资源获取		
9	智能信息技术实现实体虚拟立体化场景服务 ^[11] 、智能信息技术实现服务手段智能化 ^[5] 、学科领域全景数据情报服务 ^[39] 、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服务 ^[40]	数智技术应用	信息技术协同过程	以网络技术、平台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协同为手段,提高服务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10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41] 、充分运用各种信息技术 ^[5] 、掌握及应用大数据技术 ^[39, 42]	信息技术应用		
11	Lib Guides与Hadoop学科服务平台功能 ^[35] 、完善和优化学科服务平台功能 ^[43]	平台技术应用		
12	网络学科服务 ^[9] 、多媒体网络监控与服务技术 ^[44] 、网络应用能力 ^[45]	网络技术应用		
13	学科评估、专利分析、情报分析 ^[34] 等深度服务 ^[35] 、深层次学科服务 ^[46] 、决策支持服务 ^[11] 、情报决策服务 ^[47] 、科研决策服务 ^[48]	决策服务	学科服务提供过程	根据学科用户需求,进行学科服务内容组织与开发,促进学科用户获取与使用的过程
14	科技查新、数据服务、知识产权等科研服务 ^[49] 、学科服务核心内容 ^[34] 、核心学科服务项目 ^[50] 、嵌入教学科研服务 ^[35]	核心服务		
15	信息检索 ^[51] 、查收查引 ^[52] 、学科专题服务 ^[53] 、定题服务 ^[35] 等个性化服务 ^[54] 、订制教育及专项服务 ^[11] 、由普遍性服务走向个性化服务 ^[34]	个性化服务		
16	预约借阅、参考咨询、教育培训和馆际指南等通用服务 ^[9] 、学科导航和资源指南等初级学科服务 ^[35] 、信息素养教育等基础服务 ^[34] 、普遍服务 ^[35]	基础服务		

本文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1)针对问卷的信度检验,本文采用Cronbach' α系数来测量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从运算结果可知,本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6,说明评价总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一级指标的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0.7以上,高于可接受的边界值,说明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如表3所示。(2)采用KMO值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来确定评价总量表的因子分析可行性。本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总量表的KMO值为0.733,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度高,适合做因子分析。由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公因子方差,并以此确定二级指标关键实践的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5.2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评定

根据表3所示的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的关键实践权重,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原理,各能力成熟度等级分值是其包含关键实践的权重与标准化值的乘积之和。由此,可形成成熟度等级分值计算公式(初始级无相应权重除外)如下:(其中,CUm为成熟度m级的得分值,PU_n为关键实践n的标准化值)

$$\text{可重复级: } CU_1 = PU_1 * 0.759 + PU_5 * 0.749 + PU_9 * 0.806 + PU_{13} * 0.738$$

$$\text{已定义级: } CU_2 = PU_2 * 0.781 + PU_6 * 0.838 + PU_{10} * 0.854 + PU_{14} * 0.790$$

$$\text{可预测级: } CU_3 = PU_3 * 0.849 + PU_7 * 0.839 + PU_{11} * 0.876 + PU_{15} * 0.811$$

$$\text{优化级: } CU_4 = PU_4 * 0.929 + PU_8 * 0.909 + PU_{12} * 0.920 + PU_{16} * 0.943$$

基于评价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考量,笔者通过计算各成熟度等级评价指标的最高权重值,以此来

表2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				成熟度等级
关键过程域 (一级指标)	学科馆员建设过程	资源平台建设过程	信息技术协同过程	学科服务提供过程	一级指标成熟度等级由二级指标确定
关键实践 (二级指标)	智慧团队建设	学科联盟平台建设	数智技术应用	决策服务	优化级
	智慧馆员培育	服务平台建设	信息技术应用	核心服务	可预测级
	学科馆员培训	特色学科资源建设	平台技术应用	个性化服务	已定义级
	学科馆员配置	馆藏资源获取	网络技术应用	基础服务	可重复级

表3 一级、二级指标信效度分析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公因子方差(权重)	阿尔法系数	
学科馆员培养能力	智慧团队建设	0.929	0.806	0.946
	智慧馆员培育	0.849		
	馆员培训	0.781		
	馆员配置	0.759		
资源平台建设能力	学科联盟平台建设	0.909	0.733	
	服务平台建设	0.839		
	特色学科资源建设	0.838		
	馆藏资源获取	0.749		
技术协同能力	数智技术应用	0.920	0.804	
	信息技术应用	0.876		
	平台技术应用	0.854		
	网络技术应用	0.806		
服务提供能力	决策服务	0.943	0.843	
	核心服务	0.811		
	个性化服务	0.790		
	基础服务	0.738		

评估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水平,也就是说,各学科服务成熟度等级的评价标准值为各原始权重加权值。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等级的评价分值为标准值的100%,则可以确定该等级的所有关键实践被良好实现。根据被评高校评价数据的收集情况及评估小组专家建议,该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评价以80%为标准值(表示过程目标被较好地实现),如果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的综合得分没有达到某一等级的80%标准值,可以判定为未处于该能力成熟度等级水平。因此,依据学科服务成熟度评分标准,通过对比某一等级得分占评分标准的百分比,最终确定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水平。具体指标权重及对应标准值如表4所示。

表4 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的指标权重与标准值

成熟度等级	学科馆员建设	资源平台建设	信息技术协同	学科服务提供	标准值
优化级	0.929	0.909	0.920	0.943	3.701
可预测级	0.849	0.839	0.876	0.811	3.375
已定义级	0.781	0.838	0.854	0.790	3.263
可重复级	0.759	0.749	0.806	0.738	3.052

运用成熟度等级分值计算公式计算该高校的实测成熟度等级得分,具体得分为优化级0.08(3.701*2%),可预测级0.69(3.375*20%),已定义级2.70(3.263*83%),可重复级0.90(3.052*29%)。因此,可以确定该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为已定义级(3级),即处于侧重过程服务阶段,已形成系统管理、过程规范、体制健全、保障有力、成效可测的系统化流程化服务。已经具备向可预测级升级的基础,形成精细管理、过程可视、多元协同、全面保障、成效量化的定量化精准化服务为下一步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程焕文,刘佳亲.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39-59.
- [2] 王新才.认清形势、明确目标、集思广益、务实创新——武汉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编制的经验与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1):15-17.
- [3] 李玉海,龚丽华.服务“双新全金”的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1):24-27.
- [4] 陈锦波.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能力再造探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5-9.

6 结语

目前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的评估侧重于静态的、从绩效方面进行评估,对学科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性较弱。笔者以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综合研究法,提炼学科服务能力的关键过程域及关键实践,探索建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体系,并实证分析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以学科馆员建设、资源平台建设、信息技术协同和学科服务提供构成的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的关键过程域,可以实现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等级的动态综合评价;该评价体系较好地解决了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存在的难评价、缺乏过程评价及比较评价的问题,帮助目标高校准确定位学科服务能力的强弱项,形成层级性改进方案,为持续提升学科服务能力提供依据。

笔者探索建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识别与评价学科服务能力提供一个能力成熟度理论框架与方法,以实现学科服务管理优化和能力持续提升。当然,该评价体系仍存在成熟度等级及关键实践间的区分度不足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当前未形成统一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标准体系,不同高校图书馆的相同学科服务内容存在名称差异,文献提炼关键实践的概念也会随图书馆发展和学科服务重心的转移而转变。在具体评价应用中,评价小组须明确同一关键过程域成熟度等级间的数据收集要点和范围,还须根据所评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实际进行关键实践的定义转换。因此,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的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今后需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 [5] 宋姬芳.大学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框架与提升策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2):47-55.
- [6] 刘佳,李贺.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9):74-78.
- [7] 楚存坤,孙思琴,韩丰谈.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评价模式[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6):86-90.
- [8] 陈婷,季叶克,张米娜.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模块划分及服务评价体系[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1):29-37.
- [9] 张立忠.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14):77-85.
- [10] 刘青,李瑾.基于SECI知识创造螺旋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建设研究[J].图书馆,2017(4):58-64.
- [11] 任萍萍.“双一流”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能力体系建设研究[J].情报科学,2019(12):93-97.
- [12] PARASURAMAN A,ZEITHAML V A,BERRY L L.Alternative Scales for Measuring Service Quality: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Based on Psychometric and Diagnostic Criteria[J].Journal of Retailing,1994(3):201-230.
- [13] SURESH M,MOHAN D.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user satisfaction in Indian University Library[C]//2015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Research(ICACIS),December 18,2015,Coimbatore. Newyork:IEEE,2015:1-3.
- [14] IDIEGBEYNOSE J,IDAHOA M.Motiva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Library Staff performance in Benson Idahosa University,Benin City,Edo State,Nigeria[J].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2011(3):14-19.
- [15] HART S,AMOS H.The library assessment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A means of optimizing how libraries measure effectiveness[J].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2018(4):31-49.
- [16] 王杰.基于成熟度模型的图书馆服务能力评价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6(4):78-83.
- [17] CROWSTON K,QIN J.A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1(1):1-9.
- [18] 叶兰.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2(6):3-14.
- [19] KOUPER I,FEAR K,ISHIDA M,et al.Research data services maturity in academic libraries[EB/OL].[2023-02-23].<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2973477>.
- [20] 周莹,刘佳,梁文佳,等.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16(6):63-66,86.
- [21] 张旭.高校图书馆智库型服务体系构建及能力评价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9.
- [22] 唐淑香,付晓梅.多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绩效评价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8):82-87.
- [23] PAULK M,CURTIS B,CHRISISS M,et al.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R].Pittsburgh: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1993.
- [24] 石柱.军用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
- [25] 初景利,孔青青,栾冠楠.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3(22):11-17.
- [26] 陆晓曦,秦东方.联络视角的北美学术图书馆学科服务转型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0(5):151-160.
- [27] 刘妍,王天泥.“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智慧化学科服务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5-10.
- [28] 赵苹.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以39所“985工程”高校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5):42-48.
- [29] 郭晶,兰小媛,宋海艳,等.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能力标准与资质认证规范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11):48-53.
- [30] 杨志萍,吴鸣.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馆员服务发展能力建设[J].图书情报工作,2016(5):12-16.
- [31] 宋玲玲.基于知识图谱和Lib QUAL模型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质量评估指标监测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9):75-83.
- [32] 钟欢,马秀峰.四位一体:“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价值掣肘与消解[J].图书馆学研究,2020(10):87-93,86.
- [33] 柯平,唐承秀.新世纪十年我国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的发展:上[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2):2-10.
- [34] 李志芳.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对比分析:基于国外i School联盟和国内“985”高校图书馆的调查[J].图书情报工作,2017(11):71-79.

- [35] 曹进军.学科服务的困境与三位一体学科服务模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6):12,18-22.
- [36] 郑德俊,王敏,李杨,等.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行为研究:以Lib Guides为例[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2):89-101.
- [37] 孟艳丽.高校图书馆建设热点研究:基于“双一流”背景下相关研究主题文献统计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9):42-47.
- [38] 王媛,范爱红,韩丽凤,等.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20年回顾与未来展望[J].图书情报工作,2018(24):6-11.
- [39] 赵晏强,周伯柱.学科馆员3.0及其服务体系构建[J].图书馆学研究,2021(14):79-86.
- [40] 董同强,马秀峰.融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智慧型学科服务平台构建[J].现代情报,2019(5):97-103.
- [41] 陈婷,季叶克,张米娜.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模块划分及服务评价体系[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1):29-37.
- [42] 李文侠,崔光益,潘占峰.大数据环境下精准嵌入科研过程的学科服务案例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0(S1):173-176.
- [43] 刘青,李瑾.基于SECI知识创造螺旋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建设研究[J].图书馆,2017(4):58-64.
- [44] 陈锦波.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能力再造探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5-9.
- [45] 廉立军,叶素萍,李树民,等.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高校学科馆员服务质量评价[J].情报科学,2007(10):1486-1490.
- [46] 郭顺利,张向先,李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绩效评价研究[J].现代情报,2017(4):95-102,123.
- [47] 董同强,马秀峰.融合与重构:一流学科建设中高校图书馆智慧型学科服务平台的设计[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3):54-62.
- [48] 陆颖,左雨萌,杨志萍,等.学科化服务在科研机构决策中发挥咨询作用的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1):65-72.
- [49] 袁红军.“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调查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8(8):76-81.
- [50] 张毓晗,WALLERL,GALLIMORE V,等.英国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和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7(11):63-70.
- [51] 任树怀,高海峰,季颖斐.基于图书馆2.0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3):58-62.
- [52] 周欣.“双一流”背景下基于用户需求分析的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2):65-68.
- [53] 陆莉.“211工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3(4):59-63.
- [54] 安结.移动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评价的新思考:基于用户视角和网络层次分析法[J].情报资料工作,2018(5):81-88.

作者简介: 苏杰初, 硕士,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学科服务与数据服务。

收稿日期: 2023-03-20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精准服务研究*

白忠睿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在当前泛在信息环境中,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信息迅速膨胀,使人们从知识匮乏时代进入了信息过载时代。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从普适性服务向个性化精准服务转变,而小数据的应用给公共图书馆个性化精准服务带来了新的思路。文章厘清了小数据的来源和概念,梳理了图书馆小数据的定义与内容,探讨了小数据应用于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价值优势。在此基础上,通过“三中心”的架构来构建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精准服务模式,最后提出在模式构建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以期为公共图书馆精准化服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小数据;“三中心”;个性化精准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2.6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Small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ubiquitou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explosion of data and rapid information expansion have transitioned society from an era of knowledge scarcity to on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To align with this trend, public libraries have shifted their service models from universal services to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of small data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sources and concepts of small data, defines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small data in libraries, and explores the value and advantages of applying small data in personalized services.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a framework called the "Three Centers"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model for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small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Finally, key considerations in the model construction process are presented,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precis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small data; "Three Centers"; personalized and precision service

1 引言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是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步入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大

数据成为了当前图书馆研究与应用的热点,而面对利用大数据技术存在的应用成本高、操作难度大、隐私外泄和服务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以微观世界为中心的小数据展现出的优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小数据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应运而生,并成为了近年来图书馆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

* 本文系2021年度甘肃省图书馆馆立科研项目“基于小数据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精准服务研究”(项目编号:GT2021-09)的阶段性成果。

2 小数据与图书馆小数据

2.1 小数据概念的产生

大多数学者将美国的德波哈尔·艾斯汀教授视为第一位认识到“小数据”重要性的研究者,然而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此之前已有学者涉足“小数据”研究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小数据”开始引起学界普遍关注,走进大众视野,的确是归功于艾斯汀教授。2012年,布莱恩·普罗菲特就提出了“小数据”的概念,预言了“小数据运动”的兴起^[1]。马丁·林斯特龙也在2012年就意识到小数据的重要性,并将小数据思维付诸实践,为获得“Small Data”走访77个不同国家的2 000多个家庭进行调查^[2]。另外,有资料显示一个名为“small data group”的知识社区里相继发现数十篇探讨“小数据”的文章,时间主要集中于2012—2013年^[3]。

直至2013年年底,艾斯汀教授在一场国际会议上作了题为“Small Data, Where n= me”的报告,由此掀起了“小数据”研究与应用的热潮。她对小数据的定义是“全部有关于‘我’的数据”^[4](small data where n=me),并指出每一个人在上网时或使用各种移动设备过程中都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面包屑痕迹”(Trail of Data Breadcrumbs),这些数量巨大来源于不同应用的用户个体数据的总体构成了用户小数据,为揭示人类行为模式规律提供了有针对性的依据,这些在线行为数据被称为大数据时代的“小数据”。

2.2 图书馆小数据

简言之,小数据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全方位的数据集合。这里小数据的“小”并不是指数据总量小,而是强调以用户为中心,重点在于对个体的深度挖掘和精确画像。

我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把小数据看作是针对个体用户的全方位、多层次行为模式和情景感知的全部数据集合,进而图书馆小数据就可以定义为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和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以读者为核心的用户相关数据。数据内容包括读者的个体特征、社会关系、阅读情景、阅读行为(现时+历史)、阅读需求、涉猎领域、兴趣变化等相关信息,是图书馆发现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和阅读模式变化趋势,制定、完善读者个性化阅读服务策略的重

要依据。

随着可穿戴设备、个人移动终端设备、传感器网络和视频监控系统等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成熟,公共图书馆可以实时、便捷地完成对读者相关个人数据的监控和采集,为公共图书馆发现读者的阅读需求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小数据为公共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和个性化服务模式的构建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为读者提供“量身定制”的智慧化服务,充分体现公共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完全吻合“书是为了用的”的第一定律,并促进“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的实现,完成资源和用户的双向选择。因此,搭乘小数据的“东风”,为公共图书馆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良好契机。

3 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模式构建

本文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模式定位“三中心”架构,即存储中心、管理中心和服务中心。存储中心是基础,集中采集和存储完整、多维度的读者小数据;管理中心是关键,通过对数据有效整合与管理,提升读者小数据的科学性、价值密度和可用性,进而实现数据的共享与利用;服务中心是成效,挖掘数据价值,驱动个性化读者服务,让读者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体验。

3.1 存储中心

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建立在全面、真实、准确的读者小数据基础之上,因此,存储中心要保证所采集的小数据以读者为中心,通过应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分析读者个性特征、专业背景、兴趣爱好、行为方式等属性,以针对性地服务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

小数据的采集内容主要来自于基本特征、阅读兴趣、阅读情景、阅读行为、社会关系、服务反馈六个方面,采集途径和来源方式多样,需要多渠道协同。其中读者的基本特征,相关小数据为读者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历等特征数据,来源包括图书馆读者管理系统、开展线上和线下服务时采集的用户基本信息。读者的阅读兴趣,相关小数据为读者阅读的内容、方式、时间区间以及阅读兴趣变化的趋势等,来

源包括可穿戴设备、无线传感器、第三方增值服务商等。读者的阅读情景,相关小数据为阅读活动的方式、时间、个体位置、移动路径、内容等阅读的动态情景数据,来源包括图书馆内部服务监控系统、通讯运营商、WiFi、GPS等。读者的阅读行为,相关小数据为读者搜索、阅读、评论等阅读活动相关的行为数据,来源包括图书馆阅读终端、线上用户网络搜索、浏览图书资料信息。读者的社会关系,相关小数据为读者的阅读群体,以及和其他读者的交流与反馈数据,来源包括第三方社交平台如微信、抖音、微博、百度等产生的数据。读者的服务反馈,相关小数据为读者的服务满意度评价、服务需求反馈、开展阅读活动的愉悦感数据,来源包括图书馆进行的主动回访、问卷调查、读者留言反馈。

3.2 管理中心

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在其著作《信号与噪声》中指出:“如果信息的数量以每天250兆字节的速度增长,其中有用的信息肯定接近于零。大部分信息都只是噪声而已,而且噪声的增长速度要比信号快得多。”^[9]在图书馆对读者小数据进行全覆盖、高频率、深层次和不间断的采集时,小数据总量指数级快速增长,导致有效数据隐匿和混杂在噪声中。因此,需要通过对小数据的噪声过滤与整合,提升小数据的科学性与可用性。

当前,读者小数据资源分布广泛,结构复杂(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来源于不同的应用系统和数据库,数据类型和维度呈现多样性,信息分散、数据散落,数据之间相关性较弱,信息不能共享,形成信息孤岛,给基于小数据的决策支持带来了较大挑战。

管理中心是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模式构建的关键步骤,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对数据清洗整理,让数据可用;二是让数据变得更适合为后续工作提供支持。

管理中心将多源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主要应用于数据清洗、数据质量管理两个领域,提供小数据一致性,从而提升用户小数据的价值密度和可用性,最终实现跨机构信息共享、跨系统数据集成、跨库网深度融合。在数据清洗领域,针对不完整数据、无效数据、错误数据、不一致数据、不统一数据、重复数据等,从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适时

性、有效性等方面入手,完成缺失值清洗、格式内容清洗、逻辑错误清洗、非必要数据清洗、关联性验证等步骤。在数据质量管理领域,主要是解决数据质量与集成问题,从数据质量角度出发,对数据正确性进行检查并提高数据质量,采用提取、聚合、过滤、选择、转换等方式,对数据进行修剪、归一化、标准化处理,生成满足数据质量要求的数据。依赖丰富高质量的读者小数据为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提供依据,确保能够精确、高效、快速和经济地应用数据,辅助科学决策。

3.3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主要是通过管理中心对于读者小数据的集成、分析和挖掘,甄别个性化阅读需求,洞悉读者阅读心理,促进个性化服务模式从主观经验引导向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个性化服务的转变,实现一种“信息找人”的服务模式。

服务中心主要思想可概括为八个字:千人千面、投其所好,主要方法包括基于协同过滤、基于内容、混合推荐等,主要思路为个体特征、集体智慧、共现关系和近邻推荐。通过分析相关读者小数据,制定合理的服务模式,明确服务目标群体,在不打扰读者的前提下,以恰当的时间、适合的方式、匹配的内容完成个性化服务推送。如基于借阅和浏览小数据的分析挖掘,判断读者阅读倾向,借助读书会、讲座、书目推荐等多种形式,有效激发读者的阅读需求、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实现图书资源精准推荐。基于读者阅读场景与行为的分析挖掘,实现对馆藏载体、馆藏结构、馆藏数据、馆藏内容的优化调整,以及对数字资源的整合和数字馆藏体系的规划完善。基于阅读兴趣和服务反馈的分析挖掘,明确读者服务需求、服务模式、服务产品、服务满意度和收集反馈意见、建议等。

最后,通过对服务中心有效性的评估,实现服务过程的动态优化与完善。基于小数据的精准服务模式,给读者呈现出智能化、主动化、个性化和持续化的服务,同时通过对“三中心”模式的不断优化,提升图书馆服务总成效,让用户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体验。从“借”到“荐”,从“纸”到“智”,不断适应读者的阅读热情与需求,进一步提高读者的阅读率,让广大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个性化的图书资源,推动数字阅读的快速发展,实现读者忠诚度及图书馆服

务成效的双提升。

4 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个性化服务模式构建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把握适度原则

度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适度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公共图书馆在基于小数据决策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的实践中,也需要遵循适度原则。

公共图书馆利用小数据决策可以准确预测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发现读者阅读的动态发展规律,通过建立与读者之间的即时沟通关系,进行实时推送,完成读者个性化定制服务。然而过于频繁的推送通知容易造成对读者日常生活的打扰,使读者拥有不良的情绪体验,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把握好精确投放服务的度,摆脱公共图书馆传统的被动服务,也不要陷入过度服务的圈囿,找到被动服务和过度服务之间的平衡点,在用户真正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主动的合时宜的信息,即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最恰当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精准的阅读广告推送和个性化导读服务,从而达到提高读者满意度、增强公共图书馆服务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4.2 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措施

小数据的安全管理问题是关系到读者满意度和公共图书馆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图书馆对以读者为中心的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应坚持从小数据结构特点与读者个性化服务模式出发,制定可靠的数据安全管理与应用策略,不断提高小数据资源的安全性^[6]。

首先,公共图书馆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读者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共享和决策过程进行规范,读者也可依据法律规定与图书馆签署相应的小数据安全使用合同或协议。其次,公共图书馆应始终将读者放在小数据资源安全管理的核心地位,将小数据的管理权限交付读者。在读者认为个人隐私受到侵犯或不希望被打扰时,读者有中断小数据采集与共享、限制数据应用范围和删除隐私数据的决定权。再次,针对用户小数据安全防护问题,可以通过数据敏感信息过滤、脱敏技术(失真技术、加密技术、匿名化限制发布技术)等,在不影响小数据决

策科学性和可用性的前提下,删除、隐匿和替换与图书馆读者个性化服务不相关的用户隐私数据^[7]。最后,公共图书馆应构建读者小数据敏感度评估和分级安全保护制度,通过使用前安全评估、使用时安全管理、使用后保密存储与销毁,实现小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8]。

4.3 注重大数据与小数据的互相融合

英国数学家托马斯·克伦普在《数字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数据的本质是人,分析数据就是在分析人类族群自身,数据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其价值也在于服务人类社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9]因此,公共图书馆不管是基于小数据决策,还是利用大数据分析,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只是两者之间的侧重点和处理方式不同而已。小数据和大数据并不是对立的,基于小数据的精准服务不是厚此薄彼,也不是完全与大数据剥离开来。在大数据概念出现之前也并不存在小数据的概念,小数据是大数据的组成、延伸和补充。如果说为宏观服务做支撑是大数据的擅长领域,那么为微观服务做精确的数据支持方面小数据则更有优势,即大数据负责“画龙”,小数据则起到“点睛”的作用。

一方面,大数据虽然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为用户提供服务,但是这个方法还不完善,需要小数据的完善和补充,把大数据和小数据结合起来,结合事物的发展趋势并从个体角度出发,观察和梳理微小的线索,才能更快找出用户的真实需求^[10]。另一方面,小数据的分析很多时候都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就如在基于小数据的图书馆精准化服务模式中优化层级时,就需要嵌入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来向用户反馈数据。所以,小数据和大数据是相互依存、融合共生的,只有两者协同作用,才能实现“1+1>2”的数据增量,才能更好地推进公共图书馆的精准化服务工作。

4.4 运用“二八定律”

“二八定律”指出,图书馆服务收益的80%来自占据读者总数20%的高端用户,而占据读者总数80%的普通读者只为图书馆贡献了20%的服务收益^[6]。因此,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应重点关注高端用户,提升精品服务意识。

公共图书馆通过对读者小数据的跟踪、采样、分析和判断,可根据用户价值对读者进行细分,将其分为高价值读者和低价值读者,并实行差异化管理,按

照价值最优化原则调整服务资源的分配。基于小数据的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在保障全体读者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要特别关注高价值读者的阅读需求,仔细研究高价值读者的阅读模式,为其“私人定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特色服务和产品,确保为高价值读者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在阅读时间、地点、内容、模式和综合收益方面评估最优,最终实现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综合收益率的大幅度提升和最优化表现。

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运用“二八定律”时还有一个问题亟需关注,即高价值读者和低价值读者是动态变化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低价值读者具有发展为高价值读者的潜能,高价值读者也有转为低价值读者的可能。因此,公共图书馆基于小数据的决策对读者群的划分必须注重动态生成,需依据读者的阅读内容、时间、模式、终端设备、移动路径、阅读心理与生理变化、反馈评价等小数据构建全方位的读者画像,并据此动态分配服务系统资源,在获取较高服务收益的同时不断提升读者的价值和忠诚度^[8]。

5 结语

参考文献:

- [1] PROFFITT B.Big data benefits with small data[EB/OL].[2022-12-12].<https://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2729305/big-data-benefits-with-small-data.html>.
- [2] 林德斯龙.痛点:挖掘小数据满足用户需求[M].林亚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78.
- [3] Small data group.The Year of Small Data[EB/OL].[2022-10-09].<https://smalldatagroup.com/2013/12/11/the-year-of-small-data/2013-12-11>.
- [4] DEBORAH E.small data,where n=me[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4,57(4):32-34.
- [5] 西尔弗.信号与噪声[M].胡晓姣,张新,朱辰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42.
- [6] 陈臣.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J].图书与情报,2015(1):82-86.
- [7] 陈臣.基于小数据的读者兴趣发现与动态更新[J].图书馆,2017(3):23-27,80.
- [8] 陈臣.基于小数据决策支持的图书馆读者个性化服务定制与动态推送系统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2):79-84.
- [9] 何希.大数据、小数据与全数据[N/OL].人民日报,2019-04-04(5)[2022-11-20].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4/04/nw.D110000renmrb_20190404_4-05.htm.
- [10] 刘芮,谭必勇.小数据思维驱动下我国综合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精准化服务路径探析[J].档案学研究,2020(3):75-82.
- [11] 王世伟.图书馆智慧体是对图书馆有机体的全面超越[J].图书馆建设,2022(3):4-9.

作者简介:白忠睿,硕士,甘肃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信息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23-04-14

本文责编: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粤读通”赋能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研究*

钱海钢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110)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的不断推进,消解地区间的资源“孤岛”和服务壁垒成为可能。文章讨论了“粤读通”赋能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构想和目标,实践应用的关键点、应用意义及价值等,认为“粤读通”服务开创了省域公共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集中省馆技术优势带动全省走智慧服务和智慧图书馆建设之路,扩大了图书馆服务覆盖面,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便捷性,消解了地区间服务壁垒,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智慧化大联合,为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广东经验。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粤读通;资源共享;省域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Empowering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with 'Yue Du To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into library services, the dissolution of resource "islands" and service barriers between regions has become feasib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objectives of the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empowered by "Yue Du Tong", key poin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t argues that "Yue Du Tong" services have pioneered a smart service system for provincial libraries, leveraging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provincial librar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services and smart libraries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This initiative has expanded the coverage of library services, enhanced their accessibility, dissolved regional service barriers, and facilitated the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t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nationwide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Key words smart library; Yue Du Tong; resource sharing; provincial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与科技融合以及文化大数据建设的日益重视,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问世,为图书馆智慧化转型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财政部、文化和

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改造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实现全链条的升级和优化^[1-2]。“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首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共图书馆省域总分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GD22CTS04);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粤读通’赋能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GDTK22007)的成果之一。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设以人民为中心，体现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是“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3]。因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积极发挥首创精神，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成功地开发了“粤读通”数字证卡。这一创新举措实现了省内读者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认，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在全省范围内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一证通”便利，为跨图书馆间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

2 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研究现状

通过对关键词“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检索及已有论文参考文献获得国内外在“图书馆资源共享”领域的相关文献，经分析得出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利用“区块链”等相关新技术共建共享资源、通过图书馆联盟的机制实现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资源共建共享的版权问题三方面^[4]。

2.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源共建共享

在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实现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构想。王柯文等人^[5]针对“消除资源拥有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壁垒、打破‘信息孤岛’、改善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现状、数字资源所有权垄断”的问题提出了将区块链技术与数字图书馆相结合的解决方法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孙守强^[6]根据智慧图书馆资源建设需要，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了联盟链式网络结构，并对资源协同共享流程进行了详尽分析，同时，对搭建的体系框架进行了逐层分析，旨在为智慧图书馆未来整合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及第三方知识平台或服务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2.2 图书馆联盟是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组织形式

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别迦摩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借标志着图书馆之间合作的开端。随着时间推移，图书馆联盟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真正形成，并在之后几十年得到迅速发展，其中以美国的图书馆联盟数量最多。同时，国内图书馆联盟也蓬勃发展，主要有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全国地市级图书馆联盟、中国数

字图书馆联盟等全国性图书馆联盟及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京津冀地区图书馆联盟、湖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川南渝西七市区公共图书馆联盟等二十多个区域性图书馆联盟。

随着分布式共享模式的开放性和操作性不断提升，它将逐步成为共享的主流模式。如浙江省科技文献中心、安徽省高校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广东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等均使用区域共享模式且已经取得良好的运行效果^[7]。谭亮^[8]、麦旭辉^[9]、潘杏仙^[10]等人都对图书馆联盟的资源共建共享进行了讨论，在“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共享”。

在国外，Pisani A^[11]对图书馆联盟和图书馆在国际大背景下合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回顾了传统环境下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分析了数字环境所带来的机遇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联盟在数字时代应采取的合作方式。Uma Hiremath^[12]明确指出，在数字时代，图书馆电子联盟是图书馆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Gary E.Gorman和Rowena Cullen^[13]也指出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未来合作的一种形式。Reason Baathuli Nfila和Kwasi Darko-Ampem^[14]认为，在图书馆界，成立图书馆联盟的趋势将继续发展。这些图书馆联盟将演变为集成的、系统化的、正式化的资源共享形式，不再是从前边缘性的、有限的资源共享形式。

2.3 资源共建共享的版权问题

邱奉捷等人^[15]调研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项目，这些项目在充分开发公有领域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著作权法中的权利豁免，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出版社以及作者等签订合作授权协议，并争取著作权人的捐赠（无偿授权），以解决著作权问题。邓佩珍^[16]建议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版权制度来更好地协同解决自建数据库与商业数据库之间的版权问题。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通过“合作采购”等方式，实现了联盟数据库资源的采购，在资源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在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此外，虽然区块链技术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方面提供了一些构想，但目前尚未有具体实践的案例。因此，在资源共建共享服务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创新实践。

3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构想与目标

3.1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构想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其中第八点“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要求: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更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17]。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进一步推动资源共建共享,提升服务效能。

3.1.1 用户基础搭建

从广东来看,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各个地区已逐步建立起了体系较为完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无论从技术平台、服务机制都为建立或形成更大范围的服务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开展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协作,打破馆际间的资源孤岛、网络信息孤岛,实现资源与服务的共享,亟需一个“新基建”来实现馆际间用户数据和资源的互联、互通、互认。

文化和旅游部在2021年6月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以下几项重要目标:首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其次,积极布局公共文化领域的“新基建”,努力打造基于“城市大脑”和“城市数据湖”的智慧文化服务。第三,加强公共文化网络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城市民生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共享和统一认证,为群众提供“一体化”集成式平台服务。这些措施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升级和提升提供重要支撑,并助力智慧化和便利化的文化服务普及到更广大的群众^[18]。“粤读通”服务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并与广东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和广东省身份统一认证平台(粤信签)互联,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旨在解决省域读者信息的互认,打造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新基建”,在“新基建”的基础上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资

源共享服务,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体化”集成式平台服务。读者通过“粤读通”便可享受到广东省内任意一家公共图书馆线下或线上的服务,包括纸本文献的借阅以及线上数字资源的阅览和下载等功能,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的“一张网、一个卡”服务。

3.1.2 运行机制:互联互通,开放合作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建立在用户认证的前提下,于是首先是要打通各馆用户数据,实现用户数据互认,解决用户认证的问题;进而在统一认证的基础上根据权限提供各图书馆的线上线下资源服务。因此,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数据如何互联、数据如何推送、数据如何管理、数据有效性和安全性如何保障、各图书馆如何宣传推广等。

“粤读通”数字证卡的重要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和广东省身份统一认证平台。从逻辑上讲,广东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广东省身份统一认证平台成为省馆与各地市公共图书馆系统之间用户数据互联、互认的“桥梁”,将打消各图书馆关于数据的“顾虑”;同时,在具体系统开发实施时,利用这两个政府级的平台,采用“单向多馆推送”的数据交换机制,对新增读者,可以保证读者身份信息真实有效,对存量已有读者,可帮助各图书馆完善和校正原有读者信息数据。另外,广东省“粤省事”微信小程序,作为实名用户超亿级的高频应用入口,嵌入“粤读通”数字证卡服务,实现了“粤读通”服务开通、“粤读通”证卡添加、“粤读通”服务等功能,为加强应用的宣传推广,提升图书馆服务的公众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起到良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粤读通”服务的应用场景包含两个:一是开通/申领数字证卡,二是使用“粤读通”服务(见图1)。通过“粤省事”或“粤读通”小程序均可开通/申领“粤读通”证卡,开通“粤读通”服务,并通过出示“粤读通”码、扫描动态二维码、小程序调用等方式进行用户认证,以使用“粤读通”提供的线上线下服务。

3.2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目标

为解决广东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主要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均衡、横向合作不充分、省级馆作用不明显”三大问题,使公共文化服务布局更加均衡、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以“粤读通”赋能图书馆资源服务,



图1 “粤读通”服务应用场景

促进行业合作,扩大服务供给,创新公共图书馆馆际间、区域间服务合作和工作机制,建设覆盖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粤读通”服务体系,旨在以智慧化转型为抓手,盘活全行业数据要素、资源要素,加强合作创新,扩大服务范围,激活资源配置,拓展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服务,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建设途径多元、场景丰富、功能新颖的广东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3.2.1 智慧化转型

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提高服务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依托广东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和广东省身份统一认证平台,利用便利的读者身份信息比对方式,实现省域各级公共图书馆读者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认,将“粤读通”建成具有统一性、权威性的用户认证支撑平台。依靠该平台,实现读者“零门槛”办证,降低用户身份认证与信用管理的成本。同时,“粤读通”数字证卡将作为一种统一用户认证的方式,使读者不需要办理实

体证便可以使用省域公共图书馆的资源。

3.2.2 数据整合与资源共享

通过整合广东省各地公共图书馆的数据要素和资源要素,实现资源共享与互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更丰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让用户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所需的图书和信息。

充分利用“粤读通”全省统一认证功能,推动省、市、县(区)级公共图书馆开展横向、纵向服务合作,扩大服务群体、拓展服务覆盖面,建设或依托各馆现有特色服务应用、品牌服务,推进文献信息服务资源的融合,实施服务平台互融、互通建设,实现馆际间纸质资源共享借阅、数字资源共享利用等。

(1)在纸质资源借阅方面,共同建设“粤享借”共享借阅平台,开展跨馆际、跨区域的纸质文献快递借还服务,逐步推进省域内馆藏文献的协作共享。通过第三方软件调用,实现线上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家藏图书的快递借还,以此实现省域各级公共图书馆资源的“通借”。

(2)在数字资源服务方面,共同建设“粤读通”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基于“粤读通”统一认证平台,各馆根据自身数字资源情况,整合优质数字资源,构建数字资源“无感知”共享服务模式,消除各馆信息资源孤岛,为读者提供一个统一方便的数字阅读环境。

通过扫码登录认证,读者即可享受到“一站式”浏览或下载数字资源的服务,包括自建资源和商购资源。相较于一般数字资源访问,“粤读通”数字资源访问与获取更加简单高效、范围更广。一般来说,如果一位读者想访问图书馆A的数据库A和图书馆B的数据库D,他必须在图书馆A和图书馆B分别登录认证,而在“粤读通”资源服务平台上,他只需要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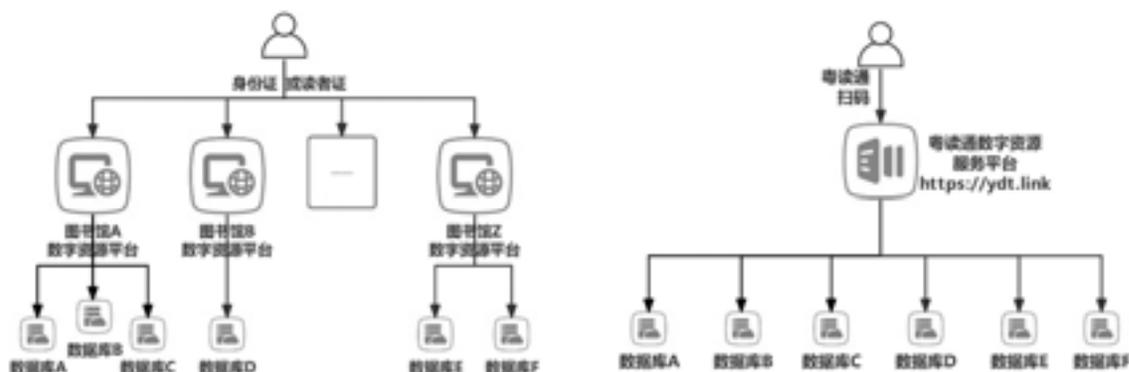


图2 一般数字资源访问和“粤读通”数字资源访问方式对比

录认证一次,就可以无障碍地访问到数据库A和数据库D,如图2所示。

3.2.3 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服务范围

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创新,拓展服务范围,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更加便捷和普惠,让用户能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地获取图书和知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1)实现“粤读通”码在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线下文献借还服务中的应用,即“线下认码”。一是结合“粤读通”数字证卡开通,在各馆官网及新媒体平台加强读者办证、借阅规则、服务内容等信息指引,提升知晓度;二是加强“粤读通”数字证卡利用,推进各级公共图书馆“线下认码”工作,对图书馆人工、自助借还的业务系统和终端等做适应性升级,兼容“粤读通”码识别读取,真正落实“一码通用”。

(2)实现“粤读通”数据在公共图书馆线上服务平台的应用,即“线上认数据”。在实现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读者信息互联、互通、互认的基础上,利用“粤读通”认证工具包或接口程序,加强公共图书馆线上服务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应用,实现读者“扫码登录”“认证授权登录”等,极大提升用户服务的便捷性,解决用户使用各类线上平台的痛点、难点。

3.2.4 建立合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

一是通过加强不同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创新的产生和共享,提高服务质量和多样性。由省馆联合省内所有地级市图书馆成立广东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动省域内公共图书馆业务协调、资源共享和服务一体化,建立完善馆际间合作机制。联盟成员之间可以共同协商、制定和实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和工作组会议等形式,促进各图书馆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解决业务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

二是与其他文化机构、教育机构、社区等合作,通过共同办展、共建项目等方式,共同举办文化活动和项目,拓展服务内容和提升质量,丰富公众的文化体验。

3.2.5 关注均衡发展

关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通过多元途径、丰富场景和特色功能的构建,将“粤读通”服务融入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平台,提供

在线文化资源和服务,让更多人都能方便地获得文化信息和参与文化活动。同时,提供线上预约、远程借阅等便捷服务,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满足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文化需求。

4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的建设

4.1 服务体系平台的总体框架和服务流程

“粤读通”服务体系建立在高效的网络基础设施之上,保障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和数据交互正常运行。“粤读通”服务体系平台的实施总体架构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存储层、服务支撑层、协作管理层、业务服务层和接入层6个部分,以及贯穿整个服务体系平台的系统运维管理和安全监控预警。其中,基础设施层为系统提供基础的软硬件资源支持;数据存储层提供服务数据的安全存储;服务支撑层是整个系统应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和服务的关键支持部分,需重点解决数据安全和数据获取问题;协作管理层作为系统平台的管理后台,主要围绕身份信息授权管理、接口授权管理、资源授权管理、应用分析等方面建立若干子系统,以协调各项工作并有效管理系统的运行;业务服务层是“粤读通”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如亮码进馆、亮码借书、数字资源查阅等;接入层则是服务应用场景所对应的微信小程序、HTML5应用、工作站、自助机等前端。



图3 “粤读通”服务体系平台架构

4.2 关键技术

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基于“粤读通”数字证卡实现,在用户认证的基础上开展服务。因此,做好用户注册和认证是资源共享服务的关键。

“粤读通”的注册、认证功能主要利用人脸识别来验证读者的真实信息。人脸识别可以做到免接触认证,是一项高效准确的身份验证技术,特别适用于一对一的身份验证场景。“粤读通”利用广东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和广东省身份统一认证平台提供的人脸识别身份认证技术来获得用户的实名身份信息,不涉及第三方数据仓库,一是无需为人脸图像提供存储空间,二是个人信息得到了充分保障,用户无需担心使用人脸识别带来隐私问题:人脸信息被收集之后,存储位置是否安全,这些数据接下来又会被运用到哪里,是否会涉及到违法领域等。相较于普通的人脸识别自助借书、签到等图书馆服务,此方式的人脸认证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安全性。

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粤读通”动态二维码是用户的唯一标识,通过图像识别联网解码得到用户的真实信息,以此种方式完成线下场景如亮码借书、亮码进馆的应用。

4.3 难点及解决思路

4.3.1 异构系统的兼容

事实上,省域各级公共图书馆使用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类型不一,有Aleph500、Interlib、iLas等。因为它们属于异构系统,所以在用户信息对接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接口规范和数据格式不统一,需要在第三方系统做充分的兼容性处理。在对接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原自动化系统数据库缺少某些必要字段(如用来标记办证来源的字段)或缺少相关的业务数据交互接口(如免密码获取读者信息)等,完整的数据字段和丰富的交互接口是“粤读通”服务体系的建设关键要素,需要和系统供应商做好充分沟通和协商。

4.3.2 办证服务标准的统一

第一,省域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办证规则不一致,大部分图书馆办证已免押金,但有些图书馆仍收取押金;第二,各个图书馆对接“粤读通”数字证卡的读者证类型权限未统一标准,可借图书数量和使用范围不统一,造成“粤读通”数字证卡推广存在障碍。

“粤读通”数字证卡的目的不是代替各馆原本的读者证,可以将其作为其中的一种读者类型,也可以将其直接与原有的读者类型对接。“粤读通”数字证卡是面向省域的,因此,省域各级公共图书馆应该制定统一的办证规则、可借图书额度和使用范围等,加

强使用指引,提升知晓度,以免让读者产生疑惑。

4.3.3 基层图书馆的经费及技术支持

省域各级基层图书馆在系统平台、设备等方面的改造经费和技术支持有限,在具体的应用场景推进时,对设备和技术调试上有一定的难度。通常,各级图书馆可以通过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相关政策支撑、申请专项经费支持来解决经费困难问题。同时,研发团队可以最大化开发并提供集成工具包,来弥补基层图书馆的技术薄弱。如“粤读通”码(动态)正反向扫码解析工具包,可用于完善图书馆线下服务对“粤读通”码、“粤省事”码(粤居码)的兼容改造,例如人工借还柜台和自助借还终端的证卡识别、门户网站用户扫码登录等。

4.3.4 数据隐私和安全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需要收集和处理用户的个人数据,如借阅记录、阅读偏好等。建立健全的数据隐私政策和安全措施,是“粤读通”服务体系建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能增强用户的信任和满意度。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图书馆可以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如加密数据、访问控制、备份和灾难恢复计划等,以保护用户数据不被未经授权地访问、使用或泄露。此外,图书馆还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数据保护法和隐私条例。

4.3.5 数字鸿沟的弥合

数字鸿沟指的是某些用户由于缺乏数字技能或访问数字设备的能力,无法充分利用数字化服务。在“粤读通”服务体系建立过程中,图书馆需要考虑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来降低数字鸿沟的存在。例如,提供培训和教育课程,帮助用户提升数字技能;在图书馆内设置公共数字设备,让无设备访问能力的用户也能使用数字资源。

4.3.6 版权和许可

“粤读通”服务体系的建立涉及到公共资源的使用,特别是涉及到数字资源的使用和传播。此时,图书馆需要遵守版权法和相关许可协议,确保数字资源的合法使用。“粤读通”服务体系在建设数字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时需要获得合适的许可,确保数字资源的版权归属和使用权限。此外,图书馆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授权管理机制,确保数字资源的合规使用,并与相关权利人进行合作和协商,以维护版权的合法权益。

5 社会价值与思考

5.1 提供了一个快捷安全的电子读者证

“粤读通”数字证卡为省域公共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快捷安全的电子读者证。一是为部分因受信息化支撑限制而未有线上办证的市县(区)公共图书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解决方法,有需要的图书馆可以零成本地直接把“粤读通”数字证卡用于本馆读者的网上注册方式;二是“粤读通”数字证卡的注册及认证均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人脸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是官方权威的数据,真实又安全。

5.2 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會影响力

“粤省事”是广东省政府为全省群众打造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全国首个政务服务小程序,上线公积金、社保、税务、户政(治安)等2 200余项高频民生服务,实现政务民生服务一站式“指尖办理”,是全国服务最全、用户最多、活跃度最高的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读通”数字证卡作为唯一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证照入驻“粤省事”平台,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地享有文化服务的方式,是深化政务数据共享共用,推动行业开放融合的典型应用。与其他证照一样,每一位用户都可以通过“粤省事”小程序“零门槛”获取证照,开通服务。“粤省事”平台作为实名用户超亿级的高频社交应用入口,为有效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推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會影响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5.3 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

“粤读通”数字证卡是仅需要人脸认证便可“零门槛”办理的读者证。“粤读通”服务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手段,提供电子证卡服务,使个人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和管理个人证卡。这种数字化证卡服务有效简化了传统纸质证卡的流程,提高了办理效率和用户体验。

纵观我国公共图书馆读者证办理的发展历程:领取或购买“观书券”——交押金办证——凭介绍信交押金办证——凭身份证交押金办证——凭个人信用办证——凭人脸“零门槛”办证,在凭人脸“零门槛”办证出现之前,办证须有“担保”,金钱的“担保”或信用的“担保”^[9]。随着社会科技和人文的发

展,办证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粤读通”数字证卡的“零门槛”办理降低了服务门槛,激活了用户需求,是图书馆人文关怀的体现。基于“粤读通”的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实现了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维护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5.4 构建了行业协同共享的平台

“粤读通”数字证卡打通了广东省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的用户数据,为行业协同共享、扩大服务供给提供了用户基础。“粤读通”赋能下的“粤读通+”展开了线上和线下多服务场景应用,为省域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各个公共图书馆把本馆的资源通过平台进行分享,广大读者因此得到最大的实惠。“粤读通”赋能的图书馆资源共享服务模式可复制性强,可为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提供广东经验。

5.5 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粤读通”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面向公众推出的首个针对个人应用服务的电子证照。该服务在“2021年(第十六届)中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中,被列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量级产品发布成果之一。同时,在“2021年(第六届)广东省电子政务与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大会”上,它也荣获了“2021年广东省政务服务创新案例”^[20-21]。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粤读通”服务实现了智慧图书馆服务的建设和应用。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用户能够通过“粤读通”服务获取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查询图书馆的信息、参与图书馆的线上活动等,从而丰富了公众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和途径。

“粤读通”服务体系是智慧图书馆服务建设的成功实践,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利用人脸识别即可“零门槛”办理“粤读通”电子证照,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6 结语

“粤读通”服务体系平台开创了省域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突出体现了信息服务与智慧服务、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两个融合的特点,集中省馆技术优势带动全省走智慧服务和智慧图书馆建设之路。“粤

“粤读通”服务体系平台不仅扩大了图书馆服务覆盖面,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便捷性,消解了地区间服务壁垒,促进了文化服务的智慧化大联合,而且使图书馆服务全面有效地对接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远距离共享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粤读通”服务体

系平台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在智慧引领、提质增效上取得的一项重要创新成果,是对公共图书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典范探索,承载着广东图书馆事业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成果,同时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具备着引领和示范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2022-09-23].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7/content_5424912.htm.
- [2] 饶权.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1):4-14.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2-09-23].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4] 祝先运,史叶明.区块链+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共享模式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42(4):23-25,28.
- [5] 王柯文,杨亚梦.基于区块链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模型探析[J].图书馆研究,2021,51(5):1-6.
- [6] 孙守强.基于联盟链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协同共享[J].图书馆学刊,2019,41(5):37-42.
- [7] 刘巧英.省域内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现举措[J].晋图学刊,2011(4):30-33.
- [8] 谭亮,黄娜.区域性图书馆联盟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以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9(10):46-53.
- [9] 麦旭辉.跨系统图书馆联盟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7(4):2-5.
- [10] 潘杏仙.关于区域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联盟的构想[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1):27-30.
- [11] PISANI A.Library Consortia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J].Biblioteca Universitaria,2002,5(2):87-102.DOI:10.2423/i22394303v1n1p159.
- [12] HIREMATH U.Electronic Consortia:Resource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J].Collection Building,2001(2):80-87.
- [13] GORMAN G E,CULLEN R.Mode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n Region[J].Library Management,2000(7):373-384.
- [14] NFILA R B,DARKO-AMPEM K.Developments in Academic Library Consortia from the 1960s through to 2000: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Library Management,2002(4/5):203-212.
- [15] 邱奉捷,韩新月,陈瑜.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中的版权风险防范[J].新世纪图书馆,2018(2):52-56.
- [16] 邓佩珍.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的数字资源版权问题研究[J].情报探索,2017(5):15-21.
- [17]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2022-09-23].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 [18]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划建设规划[EB/OL].[2022-09-23].<https://zwgk.mct.gov.cn/zfxgkml/ggfw/202106/P020210623598673338311.pdf>.
- [19] 程焕文,刘佳亲.三不政策:新时代公共图书馆“零门槛”服务的制度创新方向[J].图书馆建设,2022(1):4-13.
- [20] 技术赋能 砥砺前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智慧化服务回眸[J].图书馆论坛,2023,43(3):1-5.
- [21] 黄宙辉,苗苗.百又十载正青春 岭南文脉再传承[J].图书馆论坛,2022,42(12):1-5.

作者简介:钱海钢,硕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23-04-21

本文责编: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高校图书馆“馆徽+”文化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思考

——以百年云南大学图书馆为例

杨毅¹ 杜宇芳¹ 张健²

(1. 云南大学图书馆 云南昆明 650031)

(2.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 文章以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徽设计创意的实践轨迹和图书馆人的心路历程为背景,探究“馆徽+”的视觉文化场景与图书馆文化再造的有机结合方法,探索馆徽设计创意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文化的守正创新路径。馆徽增强了图书馆文化的氛围效果和受众体验,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对馆徽进行与时俱进的迭代重组,对于高校图书馆文化命脉的传承与文化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馆徽+”文化;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Library Emblem+'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ennial Yunnan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visual cultural scenes and library culture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trajectory and thought process of the design and creation of the Yunnan University Library emblem. By examining the design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blem, it aims to chart a path for maintain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ng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The emblem enhances the library'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audience experience, playing a quiet but essential role. Updating and recombining the emblem in a timely manner is critical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ultural legacy a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library culture.

Key words "emblem+" culture; university lib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高校图书馆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图书馆文化,体现着办学者的教育理念和追求。馆徽作为图书馆文化的视觉化图形表达方式,以瞬间给予人的视觉冲击形式,传播着图书馆的文化价值与时代特征。“馆徽+”反映的是馆徽作为主体面对图书馆文化的表现物所呈现出的关联关系状态。它在承继馆徽原有的文化形象功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具有整合资源、提升文化感染力的功能。在当今,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着文化的传播方式,选择富有内涵而传播便捷的馆徽作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的抓手,赋予其

创新性与美观性,必然会有助于图书馆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1 研究现状与问题思考

馆徽是图书馆的品牌形象,大凡一所高校图书馆,都会有彰显其自身内涵的标志。以往图书馆同仁对之多以“馆徽”“馆标”“标识”“标志”为概念,结合自身的实践探索进行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域认同馆徽是图书馆核心理念和文化内涵的象征,对

其文化功能、设计创意、技术生成等方面都做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1-4]。高校图书馆、纪念馆等行业也有学者具体探讨了不同应用情境下徽标的特质表达以及设计方案,对最终的设计应用结果进行了全面解析^[5-6]。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图书馆馆徽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梳理上述研究成果,总给人以介绍性内容多于探索性思考的遗憾,其研究观点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图书馆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图书馆面临业务工作的转型和角色形象的主动焕新,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发挥馆徽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的生动、直观的彰显功能。有学者从重塑图书馆形象的视角提出完善图书馆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凸显“以人为本”的图书馆管理理念;上海图书馆基于自身实践经验,提出以新的更准确的视觉识别系统形态展现图书馆战略转型的理念和情怀^[7-8]。这样的研究视角启发人们调整研究思路,尝试着以馆徽为核心,在对图书馆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传承与重塑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观“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馆徽设计与使用,它作为一种事物的视觉形象识别方式,既具有简洁、美观、明了、适用等一般性标志符号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图书馆行业特色、母体高校办学理念影响下的文化内涵、传统与时尚契合发展的时代痕迹。它被普遍用于高校图书馆的门面招牌、网站版面、藏书章、宣传手册等场景,成为图书馆文化传播的最佳媒介^[9]。不过,较多的高校图书馆忽视了对馆徽的深度挖掘,存在着重现实馆徽的实用价值、轻馆徽本体的文化解读,重馆徽吸引师生眼球的设计研究、轻馆徽承载知识与智慧的创意构建等问题,在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无疑,这些问题成为笔者进行实践探索的起点。

笔者所在的云南大学图书馆伴随百年云南大学发展,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馆徽作为云南大学图书馆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它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是与学校变迁、图书馆文化提升实践息息相关,它实际上是几代图书馆人遵循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与学校需求及时交互作用、共生发展的时代产物。它自带了图书馆文化自然发展的意义,同时又表达了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为此,本文拟从图

书馆文化建设的视角探究百年云大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徽设计创意的实践轨迹,进而探究其内含的图书馆人从感知到认知的心路历程,充分表明以馆徽的迭代更新为抓手是高校图书馆自我转型变革的一条有效路径。以期引起人们对挖掘和整理图书馆历史遗存的重视,使之成为高校图书馆文化命脉的传承和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2 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徽的设计创意历程

2.1 馆徽设计的开端

云南大学于1922年成立,1923年正式招生。学校在办公主楼会泽院开辟房间成立了图书室,初定名为“私立东陆大学图书部”,不久更名为“私立东陆大学图书室”。随后,图书馆于1934年改称“省立云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称“国立云南大学图书馆”。1958年,云南大学由中央高教部划归云南省管理,同年正式启动四层楼高、总面积为6 603平方米的图书馆建设,图书馆从此有了一座可供师生读书看报查阅资料的单体建筑^①。

回望云南大学图书馆前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在学校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图书馆总会有继往开来的变化,现存图书馆馆藏印章恰好见证了这段历史(见图1)。从留存的印章档案来看,最初图书馆馆藏章命名为“图记”,后来命名为馆章、藏书章。其设计多用图书馆的中文、英文全称或缩写,以圆形或方形式样呈现。这些珍贵的馆藏印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简洁大方中留存下了图书馆人在每一时期对图书的认识、审美和表达技术,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时代氛围,成为图书馆以后发展中得以承前启后、开拓进取的重要历史积淀和精神财富。

2.2 馆徽的第一次视觉呈现

1996年,云南大学被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12年,云南大学成为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实施院校。云南大学图书馆因此进入新一轮强基固体的新发展阶段:1989年,总面积为15 051平方米的新馆逸夫楼落成使用,紧接着总面积37 000平方米的新馆洋浦校区仰止楼(2006年)、总面积为58 918平方米的新馆呈贡校区仰止楼(2014年)



图1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印章

分别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学校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图书馆两校区办公的现实,需要图书馆有一个与“211”大学相称的全方位的文化提升。对此,运用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视觉图形,来达成师生对两校区图书馆实体的关联及其文化形象的认同,成为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于是,馆徽作为“一体两馆”的视觉语言符号应运而生(见图2)。



图2 云南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设计的馆徽

这个馆徽选用的是上字下图+标志性建筑物结合的设计模式。其内部结构主体由学校标志性建筑会泽院及其九十五级台阶外形艺术演变而成,似矗立在一本平面摊开的书页面上,意在表达图书馆诞生地会泽院主楼的神圣,又传达了读书如登、拾级而上的攀登精神,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中间标示的“1923”表达出图书馆的始建时间与建校时间同步^②。在主体建构的周围,以“云南大学”的中英文文字组成一个未封闭的圆环图形,寓意突破固有观念,进一步对外开放。色彩方面选用了白色、绿色和紫色搭配,白色为书、绿色为建筑、紫色为字符,强化图形的个性特征,在整体绚丽中透出低调的典雅。

诚然,对图书馆馆徽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对图书馆文化的不断追寻与弘扬。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枚馆徽的主体以会泽院及其九十五级台阶为形象代表,带有更多的母校主体色彩,加之圆环图形由中英文文字的“云南大学”组成,相对弱化了图书馆的特征,没有真正显现出其作为图书馆“logo”的主体地位,也未能用视觉语言凝炼出两校区实体图书馆所共有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底蕴。第一代馆徽存在的些许遗憾催生了后来图书馆馆徽的更新迭代。

2.3 馆徽的第二次视觉重构

2016年,云南大学成为国家“一省一校”工程实施院校;2017年,云南大学成为国家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之一。伴随学校的蓬勃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不断增厚,图书馆肩负着与时俱进地丰富图书馆文化内涵的使命和责任。于是,在学校环境改造驱动和馆内文化提升需要的合力之下,进一步实现馆徽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的圆融合一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图书馆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整合中反复研磨,最终设计出了第二代馆徽。

第二代馆徽设计的灵感源自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印存在图书上的藏书章(见图3)。该藏书章为圆形,半径为1.9cm,圆周为11.93cm。具体又由三个同心圆圈构成,围绕圆心形成的第一内圈由线条形塑的书型方框内含繁体字“書”的字符构成“囿”,这实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于1924年创建的图书馆三字的缩写;依次向外的三个圆圈分别由中文繁体字符“云南省立东陆大学图书馆”、英文大写字母“YUNNAN TUNG LU UNIVERSITY LIBRARY”、光芒四射的印花纹构成。三个圈层烘托出以书为本的理念。

设计者以这一藏书章为模版,调整了尺寸,赋予



图3 民国时期印存在云南大学图书上的藏书章

了色调和字符,最终设计出两款圆形图书馆标识。一款以蓝白为主色,三个同心圆圈为结构;正中心为蓝底白字符,书有图书馆的缩写“圖”字符;由中心到外再分两层,内一层为白底蓝字,上半部书有隶书字符“云南大学图书馆”,下半部有隶书“中国”字符,暗含虽身在云南却“以书为本、胸怀社稷”的胸怀;内二层为蓝底白字符,上半部书有英文大写字符“YUNNAN UNIVERSITY LIBRARY”,下半部书有英文大写字符“CHINA”(见图4)。另一款以红白为主色,相异于第一款之处在于用篆体书写“云南大学图书馆”“中国”字符;由光芒四射的印花纹组成最外层,表达了走出国门、拥抱世界的寓意(见图5)。经过斟酌,当时决定以蓝白相间的第一款为主,适当选用红白相间的第二款。

可以说,这两款馆徽不是基础模块的简单移植



图4 云南大学图书馆第二次设计的馆徽第一款



图5 云南大学图书馆第二次设计的馆徽第二款

或嫁接,而是在对基础模版的准确理解基础上,糅合了最适配的图书馆要素、凝结了最丰富的文化信息,做到了图书馆特征与时代审美的有机融合。实践证明,图书馆这一时期在对外服务传达组织理念、对内统一营造文化氛围的过程中,将馆徽作为必不可少的活动组织要素,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唤起情感、深化记忆的文化彰显优势。不过,由于大家对两款馆徽难舍其一,运用过程中难免存在着两个馆徽并用的行为,多少弱化了馆徽的唯一性与独到性,以致影响了人们的视觉聚焦效应。

2.4 “馆徽+”文化的知识化建构

2018年,云南大学跻身中西部14所“以部为主、部省合建”高校行列;2022年,云南大学继续入选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023年,云南大学迎来百年华诞。借助学校百年发展的磅礴力量,云南大学图书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全面塑造百年图书馆新形象的发展机遇,馆徽设计作为图书馆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升级焕新的发展要求。于是,设计组在保持原有馆徽视觉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围绕一个主打馆徽(见图5),多路径构建馆徽文化场景,以期从个体符号表达转向对馆徽的多维度展示进而实现特定主题下的图书馆知识重构。其具体的实践路径可概括为关联、聚合、叙事化三个步骤。

2.4.1 策划静态关联

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诸如网站、赠书证等图书馆业务工作所需的实物仅视为业务工作的手段,属于相对孤立的业务领域实体,很难进一步将实物与其所处的图书馆文化的语义环境相联系。如果采用领域本体的结构化组织,则会实现孤立的“工作手段”向关联的“领域文化关系”跃迁。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设计者借助现代抠图技术,人为地把馆徽镶嵌在特定的业务工作实物中,以类为起点建立“馆徽+互联网平台”“馆徽+导视”“馆徽+赠书证”“馆徽+文创产品”等语义关系,以点为面,充分叠加馆徽的文化彰显功能,使馆徽成为图书馆各类实体性文化的来源要素,进而建立各类实体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聚合(见图6)。如此一来,既深化了对命名实体及其文化寓意的表达,同时通过馆徽将各类实体的文化片段串联成一个图书馆文化的整体呈现。

2.4.2 组织动态聚合



图6 云南大学图书馆赠书证

图书馆馆内空间大体由藏书区、阅读区、情报服务区、技术设备区、行政业务区、公共活动区等组成。根据区域功能及现实空间状况,抽取并归类某一维度概念下的集合物,相应建立各功能下的馆徽关联文化。如果说前述静态关联重在挖掘并确定语义关系,那么动态聚合则侧重文化聚合的多维度揭示与个性化凸显。

具体来讲,在保持此前业务手段工具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其内在的图书馆文化价值。就以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图书馆视觉导视系统设计为例:首先,依据现实空间划分出一级导视系统(如楼体标识、出入口导视牌等)、二级导视系统(如门牌导视、楼层索引导视等)、三级导视系统(如请勿喧哗、玻璃防撞贴等);在每一级每一类下都确定有馆徽的位置,仅对不同环境下的同语义、同文本要素需求在载体材料、框架元素、色彩组合等方面做适当设计调整,由此形成具有不同空间展示度的系列性“馆徽+”实体语义标签。

2.4.3 整体性叙事化构建

通常,叙事强调不同维度的文化实体蕴含和不同类型的叙事内容的表征路径,图书馆传统上多采用主题展览、新书推介、学术报告会等形式来完成图书馆文化活动的叙事组织,但多滞于文字、语言、图像的单线使用,仅满足于对活动的表层和零星的表述,缺乏形式统摄和整体提升。为此,可基于前述的静态关联、动态组织的实体文化构建,再次以馆徽标识为牵引,形成一种馆徽文化视域下图书馆文化活动叙事的多态烘托性表达。即基于文化法则的贯通,对同一个主题内容,选择文字组织、图片可视、视频表达三种路径同时展示。

2021年,云南大学图书馆邀请了档案学专业在读的14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历时一个学期,分别梳理、选择出诸如印章、规章、云南大学分类法卡片等14件实物档案,然后遵循传统的图书馆文化知识图谱,在时间、空间与意义方面对这14件实物档案予以图片拍照、文字介绍和学理拓展研究,最后编纂出一部多视角展示图书馆老物件文化的纸本书籍《云南大学图书馆百年风华录》。2022年,云南大学图书馆再次邀请档案学专业在读的6位硕士研究生,借助视频媒介可进行单向、双向乃至多向互动交流的技术优势,从前述14件实物档案研究中凝练出大型文献利用、文献版本演变、阅读推广集锦等主题。首先以微视频叙事的形式拍摄呈现出历史记录表面呈现的“能指”意义,然后以文献编纂叙事的形式揭示出实体文献深层蕴含的“所指”学理,最后制作出《百年之业 昭如日月》视频荟萃,在馆内电子屏幕择时滚轴播放,相应编纂出版一部同名纸本书籍,留存校图书馆和档案馆。目前,设计组正在采用VR虚拟三维空间模型技术,虚拟制作以云南大学图书馆建筑空间变化为背景的馆徽文化发展全景。

上述叙事化的文化构建实践,虽经历了历史调研、文字阐释、视频制作的不同阶段,但始终以馆徽开场、文化搭台为前提,以此不断更新与累积“馆徽+”的文化效应。这样整体化构建文化的方式,不仅浓缩彰显了图书馆文化亮点,而且也大幅提升了图书馆文化水平,收到了多态而互相烘托的文化熏染效果。正如学者所说的:“事物的不同表现方式是互补和不可替代的。”^[10]沿着这一探索理路继续推出多向叙事,坚信日常的图书馆文化就能够自然地渗透、融合到图书馆的各个层面。

3 关于高校图书馆“馆徽+”文化的进一步讨论

3.1 往事无声,馆徽有痕

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徽伴随百年学校发展进程,历经设计开端、初次呈现、视觉重构、知识建构四个发展阶段,在无数次的更新中承载了图书馆文化的时代痕迹,叠加了母体学校办学者的教育理念和追求,涵构在高校历史进程的脉络中。它所展示出的高校发展历史底蕴和图书馆发展的时代风貌,足以视之为图书馆文化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录,一种

视觉型的档案文献。

作为一种历史记录,馆徽在图书馆场域中呈现出的样态是具体的、实体的,易于给人一种静态的、孤立的感觉。但馆徽是静态还是动态、孤立还是整体,主要取决于图书馆人对图书馆文化的建设理念和工作追求。事实上,进入信息化时代,图书馆文化建设不仅要关注馆徽本身,还要关注馆徽产生、存在、使用的过程,关注其背后的宏观信息。循着这一理路,馆徽作为图书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不再是孤立的物化形态,而是图书馆文化建设的积极体现。图书馆人无论从馆徽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来挖掘其载体形式和内容表达,赋予其价值意义和存续机理;还是从馆徽所涉及的形成者、利用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群去穿越时空隧道,寻找其与当下人的互动关系,都会发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行为事实,即图书馆人已经以馆徽为本体,动态性地呈现出围绕其核心地位的一系列过程性行为,由此形成了一个“馆徽+”文化的认识与建构系统。

“馆徽+”作为一个系统,相较于作为历史记录的馆徽本体,它更能生动地呈现文化的细部和具象特征,为图书馆文化建设提供回想的空间和余地。它的价值已不仅是其载体形象本身,而是其所承载的整体文化信息能够促进文化知识元素的融合。这样的融合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此结合前述的三个知识化构建步骤,对“馆徽+”文化的建构理路作进一步阐释。

(1)静态关联中蕴含文化。在馆徽与业务工作实物建立“馆徽+”的语义关系过程中,任何一个节点都会自然产生来自本体的大量信息,同时又有其蕴含的文化因素对其过程产生影响,这些信息和因素在过程中的交互影响会产生有价值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常常比最终的馆徽本体重要得多。如图6,通过馆徽按钮打开赠书证的一瞬间,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得以一一展现。

(2)动态聚合中孕育文化。将馆徽置于图书馆历史发展的长河来构建“馆徽+”的时空语境时,虽可以获得馆徽的样态,但它当初的形成过程、文化氛围却已不能追回,只能借助新的感受和手段,对之重新设计,重新赋意。而这样的赋新就实现了馆徽的有序化呈现和文化因子的系统化聚合,形成了当下存在的一种文化资源。

(3)叙事化构建中积蓄文化。馆徽在图书馆文化发展中是一个流动的存在,不同构建者对“馆徽+”的文化书写,仅靠白纸黑字难以对其做出流动且完整的表述。现代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为多视角、多手段的文化创意提供了可能,多态而互励的设计催生出新文化。

诚然,当代高校图书馆文化的建设路径多元丰富且历久弥新,高校图书馆自我转型变革的重点应首推其服务内容及其实现手段的升级换代。本研究选取的馆徽设计视角仅只是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实践范畴中的微小部分,但实践证明,它因具有直接给人以视觉上的体验和心灵上的冲击特征而更易增强图书馆文化的亲和力,更易获得同学们的赞同。有同学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微信平台留言道:“现在的东陆图书馆文化环境更加优美,学习的时候会更加舒心,心情愉悦,自然效率就高了。”“如果可以,相信小伙伴们真的愿意整日都呆在图书馆里看书。”

3.2 守正创新,文化再造

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人的记忆中,从学校建校时就存在且历经百年变迁的馆徽一定是建构当下图书馆文化的见证,它因在时间上具有始源性、在内容上具有文化元素而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图书馆文化建设的视域下,它不仅是文化实体性的存在而且也是文化观念性的存在。然而,要使客观存在的馆徽成为图书馆文化符号,仅仅关注馆徽实物本身,已无法真正彰显出其个性特征。它需要在图书馆谋求重塑发展理念、优化业务流程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以“馆徽+”的模式扩大馆徽的结构存在范围,形成一种馆徽文化景观,使进入图书馆的每一位用户对馆徽有一种感觉——感知,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审美熏陶和知识增长。如此才能使馆徽成为图书馆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徽创意过程中,每每构建一种“馆徽+”的视觉文化场景就自然拓展出一系列具有相同理念但结构或色彩略有变化的群组化logo,生发出一种新的图书馆文化形态,产生出一种图书馆人与用户共在场的情感共鸣。这无意间展现出一条由馆徽创意的图形表达走向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再到沉浸式读书场景搭建的图书馆文化再造之路。循此理路进一步探究,则会带出一个追问:此时的馆徽到“馆徽+”文化,是图书馆人对馆徽的

一种当下性理解,那么在未来的图书馆文化视域下,“馆徽+”文化又将何去何从?这是图书馆人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当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深度介入人们的生活,文化领域的交流、记录和传承的方式、形态、特征及其社会效应已在悄然改变。在高校图书馆,广大师生作为文化的受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逐渐成为了具有信息技术表达与行为能力的主动的用户。他们越来越喜欢接受并习惯于新的信息技术主导下的文化表达方式。他们的选择与爱好一定程度上促使图书馆探索构建与新技术和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且能迎合用户现实需要的图书馆文化。为此,图书馆人应与与时俱进地打破现有的“馆徽+”文化的惯常思维,密切关注新形势下的文化符号所唤起的视觉、触觉特质,捕捉其所呈

现、扩大、延展出的特定文化意义,运用信息技术迭代重组出可视可感的图书馆文化,使“馆徽+”文化在不断焕新中获得新的生机而持续发展下去。

4 结语

“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过去、现在、未来三者递进、传承而发展。”^[11]高校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图书馆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都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发展与大学文化语境紧密关联,而这些价值和观念又会使图书馆文化具有新的意义。对“馆徽+”文化的探索研究,既是对高校图书馆文化命脉的传承与文化提升发展的探索,也是图书馆人迈向文化自信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注释:

- ① 后人为缅怀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50年代视察学校,将该建筑取名为“怀周楼”。
- ② 云南大学于1922年成立,1923年正式招生,学校法定建校日为1923年4月20日。

参考文献:

- [1] 王松富.论图书馆馆徽设计[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2):18-20.
- [2] 李波.图书馆标志设计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4):55-57.
- [3] 程玲,田宏伟,刘艳磊.图书馆标志设计理论探讨及实例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1,31(2):141-144.
- [4] 侯宁.谈国家图书馆标识导引系统[C]//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4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688-694.
- [5] 胡晨欣,邹欣怡,罗冬致,等.基于“建筑基因”表达的东北大学梁思成纪念馆馆徽设计探索[J].建筑与文化,2022(5):250-252.
- [6] 戴晶晶.高校校庆标志设计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标志设计为例[J].设计,2022,35(16):102-105.
- [7] 王寒凌.从图书馆馆徽看高校图书馆管理理念[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3):60-65.
- [8] 上海图书馆视觉识别系统更新工作组.全媒体时代下公共图书馆形象的重塑:上海图书馆更新视觉识别系统的纪实与思考[J].图书馆杂志,2022,41(6):15-23.
- [9] 赵雷,李瑛,姜宝良,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定位和服务路径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4):79-85.
- [10] 芮必峰,孙爽.理解媒介:从对象到现象[J].新闻大学,2021(12):24-37.
- [11] 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百年文萃——空谷余音[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序页.

作者简介: 杨毅,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文化建设;杜宇芳,云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张健,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视觉导视系统设计与制作。

收稿日期: 2023-01-11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阅读文化 ·

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鸿飞

(珠海市第三中学图书馆 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 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关乎基础教育改革的成效, 同样也关乎全民阅读的整体质量。为探究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推动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以及《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的比较分析, 归纳总结三个版本指南的异同点、亮点及不足, 最终梳理出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 落实建设指标, 建设一流阅读空间; 坚持质量导向, 完善馆藏资源体系; 赋能信息技术, 打造智慧阅读场景; 拓展服务内容, 提升阅读服务质量; 强化保障机制, 建立专业化管理队伍; 树立典型榜样, 以评估促阅读空间发展。

关键词: 阅读空间; 高质量发展; 中小学图书馆; 空间改造;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G258.69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crucial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national reading. To explore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omote their advancement,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angzhou*,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Hainan Province*,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imilarities, highlights, and shortcoming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guidelines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future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is outlined as follows: implementing construction indicators to create top-notch reading spaces, adhering to quality orientation to enhance the collec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empowe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intelligent reading environments, expanding service cont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ading services, strengthening guarantee mechanisms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 and setting exemplary benchmark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paces through evaluation.

Key words reading spa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ibrary; space transformation; New Era

* 本文系2021年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减负’情境下学校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发展机遇”(项目编号: GDTK21022)及珠海市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第二批(2022年度)课题“‘双减’背景下中小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项目编号: 2022ZHGHTG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可利用图书、报刊布置走廊、教室等边角空间,形成学校在‘图书馆’中的良好氛围”^[1]。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以下简称“2018版《规程》”)进一步提出“以学校图书馆为中心,充分利用走廊、教室等空间,创建泛在阅读环境”^[2],为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近年来,随着一些省市先后发布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的标准文件,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进入新阶段。通过对三个版本《指南》的对比分析,有助于对中小学阅读空间相关标准的理解与把握,探究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而推动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1 三个版本《指南》概述

1.1 《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概述

《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广州版《指南》”)起源于广州市教育基建和装备中心委托浙江大学承担研究的课题“构建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环境研究”。2019年11月26日,在该课题的终期评审验收会上,课题组提交的研究成果就包括《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3]。2020年7月,由广州市教育基建和装备中心联合浙江大学编制的《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正式发布,成为全国首个《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4]。该指南包括总则、建设目标、理念原则、建设指引、建设路径与方法、附则六个部分,是国内第一份关于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方面的指引性文件,为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品质建设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技术支撑。

1.2 《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概述

2022年1月发布的《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海南版《指南》”)由海南省电化教育馆联合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浙江大学共同编制。该指南包括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工作目标、理念原则、建设指引、管理指引、保障措施、用词说明与附录八个部分^[5]。2022年9月8日,海南省教育厅又发布了《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评估指标》《海南省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方案》等配套文件^[6],接着开展了2022年海

南省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活动^[7]。

1.3 《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概述

《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以下简称“广东版《指南》”)的研制工作于2021年7月1日正式启动,广东版《指南》建设部分委托浙江大学完成,在广州市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管理部分委托教育部装备中心完成,并争取相关的专业指导和专家支持。2021年7月30日,教育部装备中心与广东省装备中心举行了《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项目启动仪式^[8]。2022年11月4日,由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指导、广东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研究制定的《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正式发布,该指南包括总则、基本原则、发展目标、空间规划与设计、空间设施设备配置、组织机制与队伍建设、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实施保障、附录十个部分^[9]。

2 三个版本《指南》的异同点

本文采用了比较研究法,以《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为研究对象,从适用范围、结构框架、主要内容、保障措施、附录方面对三个版本《指南》进行了比较分析,简单归纳了三个版本《指南》的相同之处,并重点比较分析了三个版本《指南》的不同点,从而得出三个版本《指南》的亮点及不足。

2.1 三个版本《指南》的相同之处

通过对比得知,三个版本《指南》都是聚焦“中小学阅读空间”这个主题,且都是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委托浙江大学牵头编制,故三个版本《指南》的适用范围、结构框架以及主要内容等基本是一致的或者相似的。三个版本《指南》都是为了促进中小学阅读空间的规范化、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在结构框架上基本保持一致。其次,从具体内容上看,广州版《指南》与海南版《指南》在指导思想、功能价值、建设目标、理念原则、建设指引等方面的表述基本相同,内容基本一致。另外,三个版本《指南》附录部分的图书馆使用面积测算标准、图书馆(室)设施设备配置参考指引、泛在(公共)阅读空间设施设备配置参考指引等指标基本相同。

2.2 三个版本《指南》的不同之处

2.2.1 适用范围

广州版《指南》适用于广州市公办与民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的阅读空间建设；海南版《指南》适用于海南各地公办与民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的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其他类型学校参照实施；广东版《指南》适用于广东省全日制中小学校新建、改扩建的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等机构可参照执行。可见，广州版《指南》仅提到“中小学”，适用范围较局限。广东版《指南》的适用范围最为具体，一是明确针对“新建、改扩建的阅读空间”；二是相对于海南版《指南》，广东版《指南》对参照实施的其他类型学校的表述更为具体。另外，广州版《指南》与海南版《指南》适用范围的相关描述放在前言部分，而广东版《指南》适用范围的相关描述放在总则部分。

2.2.2 结构框架

广州版《指南》包括六个部分19条以及2条附表5个附表，海南版《指南》包括八个部分26条以及9个附录，广东版《指南》包括十个部分39条以及8个附录。其中，海南版《指南》沿用了广州版《指南》的结构框架，只是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管理指引、保障措施等内容。而广东版《指南》的结构框架则更为具体，例如：广东版《指南》把建设指引分为“空间规划与设计”与“空间设施设备配置”两个部分，把管理指引分为“组织机制与队伍建设”“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三个部分。

2.2.3 主要内容

(1) 原则及目标的表述不同

广州版《指南》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教育公平、富有教育思想、富有文化风格4个空间理念以及整体有序原则、未来导向原则、功能多元原则、适宜个性原则4条建设原则；海南版《指南》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教育公平、富有教育思想、优质赶超发展、富有文化风格5个基本理念，整体有序原则、未来导向原则、功能多元原则、适宜个性原则4条空间建设原则以及全岛统筹原则、规范品质原则、创新服务原则、以评促建原则4条阅读管理原则；广东版《指南》只包括以人为本、普惠共享，统筹规划、联动建设，多方参与、因校制宜，数智融合、创新发展4条基本原则，且表述用语与前两者几乎完全不同。其次，

三个版本《指南》关于目标的表述也有差异。首先，广州版《指南》的“建设目标”与海南版《指南》的“工作目标”提到的4个目标从标题上看是一致的，但是表述上，海南版《指南》用语更为与时俱进，比如提到“教育新基建”“阅读新场景”“隐性课程”等。另外，广东版《指南》的4个“发展目标”则跟广州版《指南》和海南版《指南》的表述完全不一致。

(2) 阅读空间建设指引的不同

海南版《指南》与广东版《指南》提到的中小学阅读空间主要包括：图书馆、泛在阅读空间、智慧阅读空间、合作型阅读空间等，相比广州版《指南》增加了合作型阅读空间。三个版本《指南》从建设标准、装修指引、设施设备指引等方面对阅读空间建设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对面积指标做了具体的规定，以图书馆为例，分别给出了小学图书馆、初中图书馆、九年一贯制图书馆、高中图书馆、完全中学图书馆等不同学段图书馆（室）使用面积指标。不同的地方在于，广州版《指南》及海南版《指南》把使用面积指标表格放在《指南》正文中，而广东版《指南》先在正文中用文字进行描述，再把不同学段图书馆（室）使用面积指标表格放在附录。另外，广东版《指南》还给出了建筑设计等相关要求，如：合规合理设计、功能灵活设计等。

(3) 阅读空间管理指引的不同

由于广州版《指南》只是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故不涉及阅读空间管理方面的内容。海南版《指南》的管理指引包括文献资源高质量管控与配置、创新文献资源的采购流通管理、提高支持优质阅读服务的技术水平、提升学校阅读服务水平等内容，广东版《指南》的管理指引包括组织机制及队伍建设、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等内容，而且两者内容有一定区别。比如：①在队伍建设方面：广东版《指南》的相关表述基本和2018版《规程》保持一致。当然广东版《指南》也有“建立完善资格准入等制度，不断提高管理队伍中图书馆专业人员比例”这样的新提法。而海南版《指南》提出“各地创造条件增加图书馆员编制，原则上按每500学生配1个专职馆员编制”“鼓励试点共享型专职馆员编制”等新要求，相对比较具体，操作性比较强。②在读者服务方面：海南版《指南》从保障师生阅读时间、加强阅读场所使用管理、加强日常阅读指导等方面做了要求。而广东

版《指南》则提出阅读空间的服务包括新生入馆教育、阅读课程、教师教育教研、家庭阅读指导、无障碍阅读服务等,要求更为具体、更为全面。

2.2.4 保障措施

广州版《指南》没有专设保障措施章节。海南版《指南》与广东版《指南》都对强化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等方面作了阐述。不同的地方在于,海南版《指南》提到推进阅读空间用后评估等。广东版《指南》提出完善多方支持机制,支持阅读空间建设。

2.2.5 附录条款

除了用词说明和术语说明,广州版《指南》与海南版《指南》都有《阅读空间建设图例》,海南版《指南》还包括《阅读空间建设示范案例》。其次,海南版《指南》跟其他版本相比,附录还包括了《中小学清理图书登记表》《中小学剔旧图书登记表》等。此外,广东版《指南》则是增加了智慧阅读空间设施设备配置参考指引。

3 三个版本《指南》的亮点及不足

3.1 三个版本《指南》的亮点

3.1.1 中小学阅读空间的定义得到了明确

三个版本《指南》对中小学阅读空间做出了定义,广东版《指南》认为中小学阅读空间以面向师生提供文献信息资源借阅服务为主,具有阅览、借还、教学、研讨、自学、文创、展陈、休憩及读者其他文化活动和增值服务等功能的公共校园文化空间,承载服务学校教育、教学、科研等重要价值,是学校课内教育与课后服务的重要渠道,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9]。另外,三个版本《指南》都对中小学阅读空间的物理范畴进行了明确,认为中小学阅读空间包括4种类型:以图书馆(室)为主,包含泛在阅读空间、智慧阅读空间和合作型阅读空间^[10]。

3.1.2 阅读空间建设的目标及原则清晰可行

广州版《指南》与海南版《指南》提出“建设一流基础设施、提供品质阅读服务、提升学校文化品位、推动辐射全民阅读”的建设目标。广东版《指南》则提出“到2025年,建设理念更加先进、保障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备、服务更加高效的高质量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体系,推动全省中小学阅读空间

与阅读服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的发展目标。其次,海南版《指南》提出了“整体有序、未来导向、功能多元、适宜个性”空间建设原则以及“全岛统筹、规范品质、创新服务、以评促建”空间管理原则,非常清晰,也具有指导性。

3.1.3 阅读空间建设面积等指标可操作性强

以阅读空间建设面积这个指标为例,广东版《指南》不仅给出了中小学图书馆(室)使用面积测算说明,还给出了不同学段图书馆(室)使用面积指标,特别是对不同学段的图书馆(室)或泛在阅读空间,都给出了I类示范性指标以及II类基础性指标2种面积标准供参考^[10]。此外,海南版《指南》与广东版《指南》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藏书量标准》也给出了不同学段图书馆(室)基准及示范2种指标供参考。这些指标非常具体,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中小学阅读空间可以直接对照指标进行建设。

3.1.4 空间管理涉及资源建设、技术、人员以及服务等非常全面

海南版《指南》提出文献资源要高质量管控与配置,同时要求规范文献资源采购,拓展文献资源补充渠道,并提出中小学文献资源的流通创新的措施,如:建立馆校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县买校用”图书采购制度、建立面向乡村学校的流动图书站以及发挥“阅读大脑”共建共享等。广东版《指南》则提出制定文献信息资源的发展规划,确保文献信息资源质量。另外,在信息技术方面,海南版《指南》要求提升阅读空间信息化条件,建设一流云端的海南中小学“阅读大脑”。在队伍建设方面,两个版本《指南》都对加强人员队伍配备、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建设志愿者队伍等作了具体指引。在保障方面,海南版《指南》提出开展“最美阅读空间”评比,广东版《指南》则提出组织开展“书香校园”建设系列活动。

3.1.5 阅读空间建设图例及示范案例等参考指引有实践价值

三个版本《指南》的附则都有一些比较适用的参考指引,比如广州版《指南》与海南版《指南》的《阅读空间建设图例》罗列了各种各样的阅读空间建设图例,包括不同类型阅读空间的空间选址示例、不同功能空间的功能规划示例、不同阅读空间的方案设计示例、朗读亭等智能设施的示例、阅读家具示例等等。海南版《指南》的《阅读空间建设示范案例》

提供了童趣风格、清新风格、现代明快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等不同风格阅读空间建设示例供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参考。

3.2 三个版本《指南》的不足

三个版本《指南》作为指导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的省市级规范性文件,是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配备、管理、应用、培训与评估而制定的标准^[10]。跟2018版《规程》的宏观指导不同,《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应该偏重于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的具体指引,但《指南》除了使用面积指标、藏书标准等个别指标比较具体,其他指标还相对模糊,例如:广东版《指南》在配备多少个专职馆员编制方面就没有可供参考的具体指标;在阅读空间建设的实践中,也缺乏一些具体的建设指标而影响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的质量。其次,尽管三个版本《指南》篇幅都比较大,但也只是指导性文件。如广东版《指南》提到仅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阅读空间”,而且没有配套的评估要求及方法,故广东版《指南》仍然无法确保各项要求得到绝大多数中小学校的贯彻落实。

4 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通过对三个版本《指南》的解读及比较分析,笔者结合三个版本《指南》有关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的要求及指引,梳理出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为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4.1 落实建设指标,建设一流阅读空间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11],中小学校要抓住机遇,贯彻落实2018版《规程》,特别是要对标《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不同类型、不同学段阅读空间的使用面积指标以及选址、功能设置、装修、设施设备等相关要求,遵循中小学阅读空间的建设目标及建设原则,结合学校文化,打造不同风格的阅读空间,建设符合学校文化特色的一流图书馆、泛在阅读空间、智慧阅读空间、基于馆校合作等模式的合作型阅读空间,为师生阅读、教学教研、课内教育及课后服务提供优质的阅读环境。

4.2 坚持质量导向,完善馆藏资源体系

2018版《规程》要求中小学校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建设发展规划,完善馆藏资源采购及配备办法,开展清理审查,不断提高馆藏资源质量^[12]。广东版《指南》及海南版《指南》进一步强调确立文献资源“质量导向”替代“量化导向”的配置理念,不断优化馆藏结构,提升馆藏质量。在不断规范采购机制的同时积极参考教育部最新修订的《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和《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进行图书配备和更新,特别是严格落实教育部《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经常性地开展图书的清理审查、增新剔旧,加强新采购图书、漂流图书、捐赠图书的入口把关。此外,双减政策背景下,馆校合作开展文献资源共享的探索及实践不断涌现,例如:佛山市图书馆与各中小学校签订合作协议推动馆校共建、苏州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建设分馆等^[13],为进一步摸索公共图书馆与学校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无限可能。其次,中小学阅读空间要注重数字资源建设,丰富数字资源样态,力争完善馆藏资源体系。

4.3 赋能信息技术,打造智慧阅读场景

2018版《规程》提出,“中小学图书馆实行信息化、网络化管理”^[2]。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ion, IFLA,简称“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第4章“学校图书馆的实体和数字资源”提到,“借由技术,学校图书馆可以延伸至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延伸至社群。技术也促成了学校图书馆资源的全天候获取,超越了教学日和校历的限制。”^[14]三个版本《指南》进一步提出构建“人人、时时、处处”可读书的“阅读新场景”,鼓励中小学阅读空间依托先进技术和装备,提供跨媒介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智能化阅读服务的场所,打造“资源可共享、环境可感知、行为可记录、读群可联接”的智慧阅读场景。此外,海南版《指南》还提出规划建设功能多元的中小学“阅读大脑”,借助公众号、视频号、APP等形式的云上阅读管理与交流空间,加强阅读推广及阅读交流。

4.4 拓展服务内容,提升阅读服务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15]。《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中小学校应当鼓励教师开展阅读指导,开设必要的阅读课程,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阅读活动”^[16]。2018版《规程》提出“开设新生入馆教育、阅读指导课等,创新各类资源使用方式,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17]。三个版本《指南》则提出做好基本服务、读者教育、阅读活动、教育教研服务之余,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如:加强阅读课程,保障师生阅读时间;加强阅读评价与个性化指导;加强家庭阅读指导,鼓励设置家长定期开放日;关注特殊学生,鼓励无障碍阅读服务等等。此外,中小学阅读空间要确保阅读空间与智慧型阅读空间的开放时间,加强学科教师对阅读的引领,推进阅读空间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阅读服务质量,真正推动图书馆等阅读空间成为重要的课程教学资源。

4.5 强化保障机制,建立专业化管理队伍

中小学阅读空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统筹协调,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的责任主体,发挥教育主管部门在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各环节的职能作用,落实“政府支持、学校主导”原则以及相关经费保障,同时完善多方支持等保障机制,形成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的合力。其次,《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提到学校图书馆的成功依赖于三个必要条件中,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具备专业资格的图书馆员,且认为学校图书馆应该包括专业图书馆员、辅助人员以及志愿者等^[18]。广东版《指南》及海南版《指南》同样提出要建成由荣誉馆长、馆长、专兼职馆员以及志愿者等组成的中小学阅读服务队伍。另外,广东版《指南》及海南版《指南》还对引进专业人才以及提升现有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做了要求,比如:建立完善资格准入、职称管理、岗位聘用等制度,优化队伍结构,推动中小学阅读空间管理队伍专业化;创造条件增加图书馆员编制,试点流动型专职馆员;定期开展管理人员分层分类的专业培训,提升阅读服务人员的

专业素养等等。

4.6 树立典型榜样,以评估促阅读空间发展

广东版《指南》要求及时总结阅读空间建设的先进经验,推广具有示范效应的建设模式。广东省教育厅近年来坚持开展“书香校园”建设系列活动,并且于2020年及2022年分别举办广东省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评选活动。2020年评选出“最美阅读空间”68个,2022年评选出“最美阅读空间”85个,一批又一批优质的阅读空间得到表彰^[19]。海南版《指南》颁布后,海南省教育厅也开展了2022年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活动,一共21所学校获得“最美阅读空间”称号^[20]。可见,通过评选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总结阅读空间建设及管理的典型案例,有助于促进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认为评估帮助决策或问题解决,可以影响人们对图书馆的看法和发起人们对学校图书馆的支持^[18]。海南版《指南》与广东版《指南》都提出要把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的工作纳入教育部门、教育技术装备机构和学校负责人绩效考核与督导评估体系,加强日常督导检查与指导引领,故在落实三个版本《指南》过程中,制订中小学阅读空间的评估办法,开展有效的评估,以高质量评估促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显得非常重要。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以及《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的比较分析,归纳总结了三个版本《指南》的异同点,从而得出三个版本《指南》的亮点及不足,并梳理新时代中小学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为中小学阅读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该研究还丰富了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小学阅读空间的下一步实践与研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EB/OL].[2023-01-03].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jcys_jyzt/201505/t20150520_189496.html.
- [2]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的通知[EB/OL].[2023-01-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jcys_jyzt/

201806/t20180607_338712.html.

- [3] “构建广州市中小学阅读空间环境研究”课题顺利通过评审验收[EB/OL].[2023-01-10].http://jyj.gz.gov.cn/yw/jyxttdt/content/post_5395970.html.
- [4] 全国首个《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指南》正式发布[EB/OL].[2023-01-08].http://jyj.gz.gov.cn/yw/jyxttdt/content/post_6476036.html.
- [5] 关于印发《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的通知[EB/OL].[2023-01-08].<http://edu.hainan.gov.cn/edu/0400/202201/e47b6e7b6c294db9b7bfb0223605b814.shtml>.
- [6]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征求《海南省中小学阅读空间评估指标（征求意见稿）》《海南省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EB/OL].[2023-01-10].<http://edu.hainan.gov.cn/edu/0400/202209/8d4c2de3be38433dabf517613e14b9a8.shtml>.
- [7]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22年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活动的通知[EB/OL].[2023-01-10].<http://edu.hainan.gov.cn/edu/0400/202210/032a20f5915347fba6fd11cfaac983ac.shtml>.
- [8] 举行《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项目启动仪式[EB/OL].[2023-01-15].http://edu.gd.gov.cn/gkmlpt/content/3/3450/post_3450831.html#1659.
- [9] 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EB/OL].[2023-01-08].http://edu.gd.gov.cn/zwgknew/gsgg/content/post_4040707.html.
- [10] 广东省教育装备中心.建设高质量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广东省中小学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政策解读[J].广东教育(综合版),2022(12):9-10.
- [11]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EB/OL].[2023-02-15].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301/t20230112_1039188.html.
- [12] 王鸿飞.《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十五年后的新使命及愿景[J].图书馆杂志,2020(2):74-79,86.
- [13] 李楠.“双减”政策下公共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创新路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2(13):74-79.
- [14] Newstandard:IFLA 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2nd edition[EB/OL].[2023-02-20].<https://www.ifla.org/node/9744>.
- [15] 王鸿飞.珠海市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发展的思考[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2(24):39-43.
- [16] 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开始施行 中小学应开设阅读课程[EB/OL].[2023-02-25].http://www.gd.gov.cn/zwgk/zdlyxxgkzl/whjg/content/post_2500696.html.
- [17]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31):30-35.
- [18] 王鸿飞.《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对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启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5):52-56.
- [19] 关于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最美图书馆馆长”名单的公示[EB/OL].[2023-02-25].http://edu.gd.gov.cn/zwgknew/gsgg/content/post_3429759.html.
- [20]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22年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遴选活动结果的通知[EB/OL].[2023-02-25].<http://edu.hainan.gov.cn/edu/0400/202211/586a0ec812ba44bb82ced2ae60595070.shtml>.

作者简介:王鸿飞,珠海市第三中学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书香校园、图书馆管理等。

收稿日期:2023-03-23

本文责编:李芳

· 阅读文化 ·

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邹也静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623)

摘要: 文章采用访谈法、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方法对广州市民间读书会的运营情况、公共图书馆支持其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探究公共图书馆推动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发现,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运营人员、活动经费、读者参与情况等因素的制约,公共图书馆可基于读书会需求和图书馆支持的不足之处,从人才培养、资源联动、平台整合及人员激励4方面实施提升策略。

关键词: 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ivilian Reading Clubs in Guang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interview methods, literature researc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operation of civilian reading clubs in Guangzhou and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public libraries for their development. It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ian reading clubs in Guangzhou.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ublic libraries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ian reading clubs by strengthening training,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enhancing integration, and providing incentives.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 poi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ian reading clubs in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civilian reading clu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1 引言

全民阅读是我国大力推动的一项文化战略,作为民间自发组织的阅读组织,民间读书会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大陆地区呈现出蓬勃发展、如火如荼的态势,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困境也随之出现。以读书会发展较为活跃的广州为例,笔者在对广州市50家(民间读书会共58家,有3家读书会联系不上或拒绝调研,5家在疫情前即已停办)民间读书会的调查中发现,该市民间读书会的增长速度在2016年达到高峰,之后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17年始,部分读书会停办;而自2020年始,读书会停办的数量超过

了新成立的数量,出现负增长。截至2023年1月,仅38家读书会(占比69.09%)仍在运营,17家(占比30.91%)已终止运营。其中,28家读书会的负责人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发生使读书会的持续运营有了更多阻碍。由此可见,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较为凸显,而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该问题的严重性。

针对这样的问题,公共图书馆作为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的重要主体,有责任与义务为民间读书会提供支持帮助。在已有的关于我国民间读书会发展策略的研究中,部分研究从图书馆视角进行了策略的讨论,如赵俊玲等人调研了我国民间读书会的发展情况,并对图书馆推动民间读书会发展的策略进行深入探讨^{[1]-298};王宇针对民间读书会的生

存困境,提出了图书馆与其合作的具体对策^[2];吴波则从家长阅读需求的角度探究了图书馆发展民间读书会的策略^[3]。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策略的研究,且经历了疫情等外部因素影响,民间读书会的现状如何、公共图书馆又应该如何推动其持续发展,也没有相关研究提到,值得深入探讨。

因此,本文将以广州市民间读书会为调查对象,具体通过调研其运营情况及市内公共图书馆对其发展的支持情况,探究公共图书馆在促进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中可采取的策略,以期以小见大,窥见我国民间读书会的运营现状,为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如何推动民间读书会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

本文所指“民间读书会”结合了赵俊玲^[11]-14]和谯进华^[4]对其的解释,定义为“在政府财政拨款之外,以阅读交流为核心的民间团体或组织,具有非营利性、自愿性和互动性的特点”。自2017年始,广州图书馆创建“广州公益阅读”项目(原广州阅读联盟),广泛吸纳广州市民间阅读组织参与合作,共同推动全民阅读,截至2023年1月累计有58家民间读书会参与该项目,其中,既包括知名度、影响力较高的读书会,也涵盖新兴小型的读书组织,既有个人创办的读书会,又有公益机构、商业组织发起的读书团体,其活动地点分散在广州市各区域活动空间,基本能够反映广州市民间读书会的情况,可作为研究样本。此外,由于疫情等外部因素对读书会之后的经费筹措、活动举办形式、读者参与情况等方面均造成了影响,为减少变量,笔者在样本选取过程中还去除了在疫情发生前即已停办的读书会。

本文所选取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广州市、区两级12家公共图书馆,分别为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天河区图书馆、越秀区图书馆、荔湾区图书馆、海珠区图书馆、白云区图书馆、番禺区图书馆、黄埔区图书馆、花都区图书馆、增城区图书馆、从化区图书馆。

2.2 研究方法

(1)访谈法:笔者对58家民间读书会的负责人

进行线上访谈,了解各读书会运营情况(包括运营模式、活动情况、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和需求),公共图书馆对其的支持情况以及读书会对图书馆的建议。其中,有3家读书会联系不上或拒绝调研,共回收55家读书会的访谈结果,应答率94.83%,为有效调研;此外,经调查后发现,这55家读书会中有5家在疫情前即已停办,需在样本中去除,因此最终确定50家民间读书会为研究对象。(2)文献研究法:结合50家民间读书会参与“广州公益阅读”项目的申报材料 and 每月活动材料,进一步调研各读书会的运营情况。(3)统计分析法:以数值形式呈现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的影响范围大小。(4)网络调查法:通过广州市、区两级12家公共图书馆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收集资料,从通知公告、关于我们、年报总结、活动预告等栏目中筛选出与民间读书会相关的内容,调查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对市内民间读书会的政策支持、活动支持等,时间范围选取近5年,具体为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

3 广州市民间读书会运营情况

3.1 运营模式

3.1.1 “个人主导”模式

“个人主导”模式的民间读书会(以下简称“个人主导”式读书会)由1人或多人创办并主导运营,未在相关部门正式注册,属于草根组织,部分读书会还有志愿者参与组织管理工作。在笔者调研的50家民间读书会中,有29家(占比58%)以该模式运营。此类读书会的运营概况如表1所示。

3.1.2 “机构主导”模式

“机构主导”模式的民间读书会(以下简称“机构主导”式读书会)由正式注册的机构主导,作为机构的子项目,由机构全职或兼职人员组成项目团队进行运营。在笔者调研的50家民间读书会中,有21家(占比42%)属于该类运营模式。此类读书会的运营概况如表2所示。

3.2 活动形式

广州市民间读书会的活动形式有以下三种:

(1)纯线上形式,即完全通过腾讯会议或者视频号等线上渠道举办活动。这种形式在疫情发生后大量兴起,一般在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或活动场地

表1 “个人主导”式读书会运营概况

模式要素	内容
团队规模	1—10人,包括1名或数名读书会创办人、负责人,部分读书会有志愿者参与运营
经费来源	公共图书馆提供合作经费;社会公益组织资助;创办人资金支持;活动参与者众筹;合作企业赞助;政府部门资助
运营动力	运营人员对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热爱、对实现自我价值及获得认可的追求、对提升自我及亲友文化水平的希望、拓展人脉的需求
生存现状	25家(占比86.21%)仍在运营,4家(占比13.79%)终止运营
典型案例	京京读书会、Miss Ren的书屋等

表2 “机构主导”式读书会运营概况

模式要素	内容
团队规模	1—15人
经费来源	机构资金;公共图书馆提供合作经费;企业赞助;个人捐赠/众筹;社会公益组织资助;机构负责人资金支持;政府补助;企业购买
运营动力	运营人员对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热爱、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主办机构对阅读推广业务发展的需要,为机构引流并拓展人脉、合作方等资源需要
生存现状	13家(占比61.9%)仍在运营,8家(占比38.1%)终止运营
典型案例	羊城读书会、微笑读书会等

难以协调时采用。在2022年底国家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2023年初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后,该形式仍频繁被使用。其优点是能够突破空间限制,不需活动场地,读者没有交通成本,可随时随地参加活动,缺点是由于参与者无法在线直接互动,效果难以保证。

(2)纯线下形式,即参与者在线下活动空间进行面对面的阅读分享交流活动。在这种形式下,参与者能够更为直接、深入地分享交流,活动效果较好,然而会受到如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活动场地的限制。

(3)线上与线下结合形式,即活动在线下场地开展,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进行直播。这种形式既能保证活动效果,又能突破空间限制,让无法到场的读者参与活动,但对于组织者来说,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前期准备。

在笔者调研的50家民间读书会中,有32家(占比64%)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场地协调情况和读者意愿将部分活动转为线上形式或开通线下活动的直播渠道。以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10日为例,

这些读书会共开展656场活动,其中纯线上活动341场(占比51.98%),线上与线下结合活动57场(占比8.69%)。

3.3 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此部分总结广州市民间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仍在运营的读书会,根据目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困难进行归纳,对于已终止运营的读书会,根据导致其停办的因素进行归纳。笔者对50家读书会负责人访谈后发现,不同运营模式的民间读书会,其具体的制约因素也有所不同,下文分别阐述。

3.3.1 “个人主导”式读书会的制约因素

制约“个人主导”式读书会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4方面,按照影响范围大小来排序分别为运营人员、活动经费、读者参与情况及活动场地,表3展示了各制约因素的具体内容、每一项内容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以及它们在29家“个人主导”式读书会中所占的比例。

表3 “个人主导”式读书会制约因素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和所占比例

序号	制约因素	具体内容	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家	所占比例/%
1	运营人员	运营人手不足,且时间、精力投入欠缺	21	72.41
		阅读推广专业人员缺乏	6	20.69
		运营者缺乏组织活动的热情	3	10.34
2	活动经费	活动经费欠缺、来源渠道较少(疫情后经费筹措更为艰难)	15	51.72
3	读者参与情况	疫情发生后线下活动被迫减少,读者生活及习惯发生改变,参加线下活动的机会和意愿降低,缺乏面对面交流,黏性随之降低	6	20.69
		活动吸引力不够,或宣传水平有限,读者招募情况不理想	3	10.34
		读者受限于自身水平和阅读理念,参与活动的稳定性和坚持度不高(听障读者,少儿读者及家长)	2	6.90
4	活动场地	没有免费合适的活动场地	6	20.69

注:同一家读书会可能被同一制约因素中的多项内容所影响,因此每一项具体内容所制约的读书会可能有重合的部分。下同。

3.3.2 “机构主导”式读书会的制约因素

制约“机构主导”式读书会持续发展的因素主

要有5方面,按照影响范围大小来排序分别为活动经费、运营人员、读者参与情况、活动场地及机构变动。表4展示了各制约因素的具体内容、每一项内容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以及它们在21家“机构主导”式读书会中所占的比例。

表4 “机构主导”式读书会制约因素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和所占比例

序号	制约因素	具体内容	所制约的读书会数量/家	所占比例/%
1	活动经费	活动经费欠缺,来源不够持续稳定(疫情后经费筹措更为艰难)	13	61.90
2	运营人员	运营人员事务繁多,能够投入读书会的时间、精力投入欠缺	8	38.10
		运营人员流动性大	5	23.81
		阅读推广专业人员不足	1	4.76
3	读者参与情况	疫情发生后线下活动被迫减少,读者生活及习惯发生改变,参加线下活动的机会和意愿降低,缺乏面对面交流,黏性随之降低	2	9.52
		活动吸引力不够,或宣传水平有限,读者招募情况不理想	3	14.29
		读者阅读理念有待提升,参加活动的坚持度和持续性不高(少儿读者及家长)	1	4.76
4	活动场地	没有免费合适的活动场地	4	19.05
5	机构变动	主办机构转型,不再发展读书会业务,原读书会停办	1	4.76

4 公共图书馆对广州市民间读书会的支持情况

4.1 主要措施

4.1.1 以公益创投形式整合、培育民间读书会

广州图书馆于2017年成立的广州阅读联盟,2019年起更名为广州公益阅读,并实行项目制管理,每年向市内各类民间阅读组织征集广州公益阅读创投项目,评选标准向服务于残障人士、老年人、儿童与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项目倾斜。自2018年至2022年,广州公益阅读共征集项目143个,58家民间读书会及其他组织参与了项目的策划与执行。广州图书馆为入选项目提供相关资源与服务,包括活动场地、宣传支持以及专业的阅读指导咨询等,部分项目可获活动经费。此举将市内民间读书会整合起来,给予

扶持、资助、指导,也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开展读书会活动,培育有潜质的新兴民间读书会。

4.1.2 通过活动合作为民间读书会提供资源与服务

经调查,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以及海珠区图书馆、黄埔区图书馆等9家公共图书馆均与民间读书会合作开展过公益阅读活动,具体由民间读书会人员组织活动、邀请嘉宾领读分享,公共图书馆则提供活动场地,也给部分活动提供嘉宾劳务、宣传物料与平台等资源,推动了读书会的持续发展。图书馆所选择的合作对象多为运作较为成熟、具有一定经验的阅读组织,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服务读者。如成立于2005年的弘毅书舍在服务听障人士、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定期与其合作举办听障人士手语读书活动和经典素读坊活动,这些活动均由弘毅书舍策划、组织,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则为活动提供场地与宣传物料等。

4.2 存在不足

4.2.1 对民间读书会运营人员的培养欠缺

目前,仅广州图书馆曾于2019年面向市内民间读书会的负责人举办过2期“广州公益阅读·阅读推广人培训”活动,但这项工作并未持续开展;而据参与“广州公益阅读”项目的读书会负责人所言,广州图书馆为其提供的阅读推广指导咨询尚未形成固定机制,且多为活动内容和宣传方面的指导,对于读书会运营、活动策划组织、增强读者黏性等方面涉及较少,需要加强。花都读书会、经典原文读书会等14家读书会均表示,希望公共图书馆多开展阅读推广指导和培训活动,提升运营人员的组织管理和活动策划能力。

4.2.2 对民间读书会的资源支持与链接有待加强

虽然广州市已有公共图书馆采取措施为市内民间读书会提供经费、场地等资源,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有3家区级图书馆未对其进行资源支持,需要加强;其次,图书馆的资源有限,难以完全满足读书会的运营需求,尤其在疫情发生后,经费缩减,对民间读书会的经费和场地支持度均降低,有待于帮助其链接其他资源。比如,广州图书馆用于“广州公益阅读”的活动经费在疫情后减少,其场馆内的活动空间原本档期就较饱和,疫情期间更会视情况时常关闭,使得一些需要依靠图书馆资源运营的读书会维

持艰难。其中,某书社在2020至2022年疫情发生后失去广州图书馆的经费支持,而免费合适的活动场地也获取艰难,其负责人表示受活动资源制约,书社不能保证活动质量以及持续性,需要其他部门或机构的支持。

4.2.3 对民间读书会的整合力度不足

据调查,虽然广州图书馆创建的“广州公益阅读”联合了数十家民间读书会推动全民阅读,但其整合力度仍然不够,没有为读书会建立学习交流的机制,也没有采取更多措施促进其保持密切合作,进行资源共享,读书会基本“单打独斗”,关系松散,没有形成合力。Miss Ren的书屋、微笑读书会等15家读书会表示,希望公共图书馆帮助民间读书会建立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取暖”、资源共享。

4.2.4 缺乏对民间读书会运营人员的激励措施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在增强民间读书会人员的运营动力方面较为欠缺,比如对于优秀的读书会及阅读推广人没有进一步的表彰激励;在宣传方面,内容多限于活动宣传,缺少对民间读书会及其运营人员的系统宣传、展示,平台多限于图书馆的单一宣传平台,缺少与更多媒体联动。创读学社等4家读书会在访谈中提到,希望公共图书馆能够对优秀读书会及其创办者进行激励,增强读书会运营者的精神动力和运营热情,维持运营团队的稳定性,促进读书会的持续发展。

5 公共图书馆推动广州市民间读书会持续发展的策略

5.1 加强培养,建设民间读书会专业运营团队

我国阅读推广服务人才供需失衡严重,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5]。公共图书馆应加大力度帮助读书会建设专业的运营团队,即建立阅读推广人培养的长效机制,围绕“专业”和“团队”两个重点,邀请行业专家面向读书会的运营人员、志愿者和对读书会运营感兴趣的读者持续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班、阅读推广指导咨询会等,引导更多志愿者与读者加入运营队伍,为民间读书会培养专业的运营团队、志愿者团队和后备力量,缓解人力资源紧张、人员流动大、专业人才少等问题。在培训内容方

面,应重点聚焦读书会运营方法、活动宣传与策划技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活动举办方法以及与读者关系的维系方法等,帮助读书会提高活动质量、效果,提升读者黏性,推动其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5.2 加强联动,为民间读书会提供资源支持及资源链接服务

目前疫情防控政策已调整为“乙类乙管”,公共图书馆场地开放问题虽可缓解但其空间仍然有限,社会经济恢复也还需过渡期,活动经费相对缺乏,因此图书馆仍需加强与同行及社会力量的联动,助力民间读书会获得更多活动资源以推动其持续发展,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各级图书馆联动,加强对读书会的资源支持,即市级中心馆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市内各图书馆与民间读书会合作互助,同时结合读书会服务特殊群体的需求与困难,引导各图书馆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为特殊群体阅读活动提供活动场地等资源。第二,充当读书会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桥梁,帮助其链接外部资源。公共图书馆具有公共交流平台功能,能发挥连接各方的“社会连接器”作用^[6],吸引民间读书会以及有社会交流需求的政府部门、公益机构、企业、个人等主体前来交流、合作,所以,它们可以利用平台优势,为资质好、有潜力的民间读书会背书、宣传,牵头促成它们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联动、合作,为其链接更多资源。比如,广州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等企业因引流及企业文化需要,与广州图书馆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图书馆可以推荐读书会与这些公司合作举办阅读活动,引导企业为读书会提供活动经费、场地等支持。

5.3 加强整合,搭建民间读书会的学习交流、资源共享平台

公共图书馆应帮助各读书会搭建学习交流、资源共享平台,使其形成行业合力。一是建设民间读书会资源库,图书馆可继续通过公益阅读创投项目征集、民间读书会招募或活动合作等方式,与更多民间读书会建立联系,将其纳入读书会资源库中,形成交流平台;二是建立民间读书会学习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交流分享会,邀请优秀读书会总结相关运营经验,发挥其示范作用,为其他读书会提供借鉴和指导,同时举办交流体验活动,每期选择一家具有一定经验与资质的读书会,组织其他读书会的人员参与其活动,体验式学习阅读推广经验与技能;三

是创造各读书会的合作机会,图书馆可根据主题(如人文社科类、科技创新类等)和服务对象(如面向普通读者、亲子家庭、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对民间读书会进行细分,了解各读书会的优势与不足,为同类型读书会或者能够进行优势互补的读书会“牵线搭桥”,实现资源共享、互惠共赢。

5.4 加强激励,开展对民间读书会及其人员的表彰、宣传等活动

公共图书馆需加强对读书会及其运营人员的表彰、宣传等激励,以增强读书会人员的运营动力,具体可做以下努力:一是开展民间读书会及其运营人员的评选表彰活动,对优秀的主体授予证书、奖杯等奖励,树立榜样典型,满足运营人员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二是利用媒体及自媒体资源对优秀的民间读书会、运营人员进行全方位宣传推广,除活动宣传外,还可邀请媒体对民间读书会创办者做系列专访,为读书会及其人员提供展示平台,在增强其运营热情的同时,也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读者

和合作方参与;三是为从事民间读书会运营和活动领读工作的阅读推广人、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时长证明,并将志愿时长作为评优标准之一,进一步调动读书会运营人员推广阅读的积极性。

6 结语

广州市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运营人员、活动经费、读者参与情况、活动场地以及主办机构业务变动等因素的制约,经笔者分析,它们在运营团队培养、活动资源获取、相互交流合作、精神激励和宣传助力等方面有着相关需求。广州市公共图书馆虽已对民间读书会提供支持,但仍有需要完善及改进的地方,应立足于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图书馆在支持读书会发展方面所做的不足之处,从人才培养、资源联动、平台整合及人员激励4方面实施提升策略,为公共图书馆视角下其他地区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 赵俊玲,白人杰,葛文娴,等.我国民间读书会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
- [2] 王宇.公益性民间读书会及其与图书馆的合作机制[J].图书情报工作,2015(5):25-30.
- [3] 吴波.民间读书会对家长影响及其推广策略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9(12):21-25.
- [4] 谯进华.民间阅读组织的发展、困境与行动策略:以阅读组织与公共部门的关联度为中心[J].公共图书馆,2014(2):24-31.
- [5] 周玉琴,吴建华.我国阅读服务专业人才供需矛盾与破解之策[J].图书馆论坛,2020(5):123-131.
- [6] 方家忠.公共交流平台:公共图书馆服务新模式[J].图书馆论坛,2015(12):19-24.

作者简介: 邹也静, 硕士, 广州图书馆助理馆员, 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与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3-03-10

本文责编: 李芳

· 阅读文化 ·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之困惑与对策研究*

丛全滋 刘 琨 王洪波

(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 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导致阅读推广工作与师生阅读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现象。文章基于大连工业大学师生阅读情况调查与分析,提出高校图书馆在提高阅读推广认识的同时,把解决师生阅读问题作为推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在注重阅读调查与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实施专业推广、倡导全员全过程推广等方面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 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Confusion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Read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struggling with promoting reading due to misconceptions, resulting in a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ir promotional efforts and the reading needs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Based on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reading situation amo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t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promotion. It emphasizes address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and barri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 of promotional work. The study suggests approaches such as conducting reading surveys and research, adopt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implementing professional promotion and promoting reading comprehensively throughout the institu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Library

1 引言

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取得了可喜成就,但面临的困惑也不容忽视:活动单一,没有常态化;大学生参与意愿受活动质量、推广激励和心理因素影响;跨部门“协同不足”和“协同失灵”;群体定位不准,没有充分认识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差别等,阅读推广工作乏力^[1]。特别是推广阅读中“广”的阅读效果并不明

显,大量的潜在读者依然在图书馆外徘徊。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对阅读推广的认识存在偏差,对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推广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推出的阅读活动或项目,对改进高校师生阅读作用不明显,与师生阅读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二者之间契合度不高、师生参与意愿不强。第三,高校图书馆推出的阅读活动基本面向馆内现实读者,而这一人群往往就是阅读意愿强、阅读能力较强的人群^[2],对大量的潜在读者吸引力不大。高校师生与其他社会读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把公共图书馆的宣传性阅

* 本文系2022年度中国图书馆学会科研项目(非资助类)一般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化及其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LSCKYXM-FZZ-YB010)的成果之一。

读活动简单复制到高校图书馆并不合适,缺乏专业性、不具针对性的阅读活动对高校师生而言,不解决实际问题,现实意义不大。为了清晰阐述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存在的问题,笔者在大连工业大学内做了师生阅读调查和分析工作。

2 阅读调查与分析

本次阅读调查通过问卷星网络服务平台进行。涉及师生的基本概况、阅读状态、利用图书馆情况、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情况等多个方面。我们选取其中关联性较强的几个问题,了解师生阅读需求以及对阅读、对图书馆、对阅读推广工作的态度和看法,从数据中分析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师生阅读需求之间存在的问题。从2021年11月1日开放问卷到2022年3月1日止,共回收有效问卷2 559份,占全校师生总数的16%左右。其中,教师占有效问卷的比例为3.91%,研究生占8.13%,大一学生占34.23%,大二学生占19.38%,大三学生占24.5%,大四学生占9.85%;女生占57.13%,男生占42.87%。为了客观反映师生的真实情况,调查问卷采取单选和多选混合方式进行。

2.1 师生对阅读的认识

调研数据显示,51.9%的师生认为阅读非常重要,37.36%的师生认为阅读很重要,二者之和达到89.26%。显然,高校师生对阅读的认识是积极、肯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说明高校师生阅读需求非常强烈,不存在师生阅读需求不足问题。当然,师生阅读渠道是多元的,图书馆只是其中一个,图书馆能否赢得师生关注,能否让师生回流,关键看图书馆推广方式和推广策略是否与师生需求对路,能否有效激发、提升师生的阅读需求。

2.2 师生的阅读方式

网络环境下,师生可供选择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阅读成本更加低廉,阅读效能不断提升。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师生在阅读方式选择上,由高到低依次为手机阅读、纸质文献阅读、利用电脑或平板电脑阅读和听书,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5.38%、56.7%、55.29%和20.24%。当然,这里所说的阅读方式选择并不是单一的,绝大多数师生的阅读方式是复合的,即选择手机阅读,同时,也会选择其他方式阅读。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适应师生阅读特点和方式,

紧扣师生阅读需求,千方百计满足师生多元化、个性化阅读需求。

2.3 师生的阅读倾向

大多数参与问卷的师生喜欢以视频方式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比例高达56.27%。在内容选择方面,67.88%的师生喜欢阅读与个人兴趣相关的文献信息,52.72%的师生喜欢浏览新闻资讯,查阅科技文献的师生占36.3%、浏览生活资讯占35.72%、阅读中外经典文学占33.8%,其他人文社科占32.12%。网络时代,各种媒体信息铺天盖地,师生获取文献信息日益方便快捷,微信、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流行广泛,深受网民欢迎,这是网络时代阅读的重要特征之一。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注重师生的阅读兴趣的同时,要关注推广内容的多元性和多媒体性。

2.4 师生利用图书馆的目的

利用图书馆完成作业占65.42%,丰富兴趣爱好占47.67%,喜欢图书馆环境占41.54%,考研复习占39.9%,科学研究占27.2%,消遣娱乐占20.52%,其他占14.97%。从调研结果看,尽管当前师生每年借阅传统纸质文献的数量不断减少,但师生对图书馆的阅读环境还是比较认可的。利用图书馆完成作业、考研复习都与图书馆阅读环境直接相关。虽然电子资源日见繁盛,深受师生欢迎,但图书馆阅读环境、人文环境建设在推广阅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图书馆的物理空间和环境,发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独特优势。

2.5 师生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

网络时代,师生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日益多元化、便捷化。从师生答卷结果来看,师生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从高到低依次是手机、搜索引擎、图书馆电子资源和图书馆纸制文献,比例分别是77.41%、52.29%、28.84%和27.82%。大部分师生选择移动终端和互联网获取文献信息,选择通过图书馆查阅文献信息(包括纸质和电子)的比例相对偏低。一方面,这可能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相对有限,网络服务受限等有关;另一方面,网络OA(Open Access)资源越来越丰富,花钱买方便也是很多年轻人崇尚的生活准则。

2.6 师生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情况

只有12.58%的师生认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很好,会经常参与;32.83%的师生认为活动不错,也会偶尔参与;35.64%的师生主观上很想参与也愿意参与,但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不够了解或得不到相关信息,错失参与机会。这些数据与图书馆平时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参与情况基本相符,真正参与到活动中来的师生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参与到活动中来的师生是正好路过活动现场,专门奔着活动而来的师生更是寥寥无几。这说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内容和形式上也没有给师生带来眼前一亮的阅读体验,或许是高校师生对各种活动本身不感兴趣,或者认为这样的活动不解决实际问题,参与与否差别不大。

2.7 师生利用图书馆面临的阅读困难及解决方案

师生在利用图书馆过程中会经常遇到阅读问题的比例占15.32%,偶尔会遇到阅读问题的师生占62.84%,基本没有遇到阅读问题的师生占21.84%。数据表明,即使高学历的高校师生同样会在阅读过程中遇到阅读障碍和困难。可以说,不同层次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阅读困难和问题,而且,阅读层次越高,阅读障碍和困难也会越多、越复杂、专业性越强,更需要得到图书馆专业指导和帮助。

在面临的具体问题方面,27.71%的师生认为图书馆资源太少,35.17%的师生认为是找不到想看的文献,28.6%的师生不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书,34.58%的师生对图书馆不了解,31.11%的师生认为自己缺乏专业阅读指导,6.17%的师生认为自己在图书馆有过不愉快的阅读经历,22.7%的师生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到图书馆或利用图书馆资源。从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师生对图书馆并不十分了解,很多时候只是一知半解。师生在选择问题解决方案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向身边师生救助、咨询服务台老师、在线咨询、咨询身边老师等,比例分别是36.11%、27.67%、12.86%和11.45%。解决师生阅读困难和障碍应该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内容。

2.8 师生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期望

55.84%的师生希望图书馆提供个性化阅读指导,54.67%的师生希望图书馆能够深入院系了解师生需求并解决实际问题,50.21%的师生希望经常把图书馆资源推介给师生,32.79%的师生希望建立师生互动平台,28.88%的师生是希望图书馆开展有针对性阅读教育或培训。当然,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受问卷提供选项的限制,可能并没有完全表达出真实想法。尽管如此,师生还是希望图书馆能够走近师生,了解师生现实需求,解决师生实实在在的阅读问题。

3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与师生阅读需求错位的原因

从前文的调研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高校师生的阅读状态是积极的、阅读需求是旺盛的,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期望值也是很高的,师生利用图书馆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困难需要图书馆帮助解决。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把阅读推广工作理解成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而大多数所谓的阅读推广活动只能起到宣传和引导阅读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寥寥无几,造成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与师生阅读需求之间的错位现象,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陷入尴尬境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对图书馆阅读推广认识不到位

对阅读推广认识不到位突出表现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部门化或称局部化。在图书馆行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包括专家学者存在这样的认识,只有阅读推广部从事的工作属于阅读推广,其他部门业务工作则不属于阅读推广。这种认识的直接后果就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与大多数业务岗位无关,换句话说,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与大多数馆员无关。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蒋永福先生认为,阅读推广本来就是图书馆的核心服务^[3]。言外之意,阅读推广并不是什么创新服务,更不应该成为图书馆的局部工作。笔者完全认同蒋先生的观点,图书馆从诞生到现在一直与阅读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阅读孕育了图书馆,反哺阅读、推广阅读理所应当成为图书馆永恒不变的根本宗旨。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全体馆员共同参与的全过程推广,而且这种推广具有明显的图书馆学专业性质。也就是说,图书馆阅读推广是一个完整的阅读推广与保障体系,每个馆员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推广作用。正因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是一个完整体系,图书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推广方式、推广内容等也不尽相同,用单一的“活动”形式来束缚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认识和做法显然是不

妥的。

3.2 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性认识不明确

阅读推广概念最早来自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出版行业等^[4],后来逐渐传到图书馆。与社会其他行业、组织、机构不同,图书馆本身是专业性学术机构,图书馆业务具有明显的专业属性。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作为专业推广主体,拥有一批专业馆员队伍,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利用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师生阅读问题,从而实现推广阅读之目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建立在自身专业人才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和文献资源优势等基础之上,可选用的推广方式也应不拘一格。

3.3 对图书馆传统业务推广认识不足

图书馆从阅读需求中诞生、在推广阅读中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图书馆传统业务是基于读者阅读需求而建立,并根据读者阅读发展不断完善起来。图书馆是从藏书楼演变而来,藏书楼以收藏为主,阅读为辅,不具推广性,它本身不希望更多读者利用藏书楼文献。随着读者阅读需求持续扩大,社会上的文献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阅读需求,藏书楼不得不向社会读者开放,此时的藏书楼就是图书馆的雏形。在此基础上,馆藏规模、业务功能等方面不断完善和提升,尽最大可能满足广大读者阅读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新的阅读需求和阅读问题也会如影随形、层出不穷,只要社会还需要阅读,图书馆的推广职能就不会消失。可见,读者的阅读需求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同时,图书馆在解决读者阅读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了读者、推广了阅读、发展了自己,二者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推广性是不容置疑的。范并思教授曾指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5]。

4 高校图书馆改进阅读推广工作策略

从前文调查与分析不难看出,高校图书馆存在一系列阅读推广认识问题,要提升高校阅读推广工作质量和效果,必须提高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认识,同时,把解决师生阅读问题作为推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4.1 注重阅读调查和研究

阅读推广需要数据支撑,并依数据而开展活动……从而使得阅读推广活动目标定位更加精准,更具科学依据^[6]。只有建立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推广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下属的文化素养与阅读专业组于2011年颁布了第125号专业报告——《在图书馆中运用调查研究进行文化素养与阅读推广:图书馆员指南》。该报告指出,图书馆员在文化素养与阅读推广工作中如果运用一种系统的基于数据资料(Systemic Data-driven)的调查研究方法,则可以在该领域中做出更大的贡献^[7]。循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 EBL)作为图书情报领域的新兴概念,和阅读推广领域有着天然的相关性,馆员将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与用户的需要和取向有机结合以用于提高专业判断的可靠性^[8]。于良芝等人也认为,EBL和图书馆阅读推广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点^[9]。图书馆推广工作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将适当的文献信息推送给有阅读需要的读者,二是将潜在读者培养成适合阅读并愿意阅读的现实读者,提升现实读者的阅读质量和水平。毫不夸张地说,阅读调查和研究是做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4.2 坚持问题导向

调研数据显示,高校师生在利用图书馆过程中会遇到阅读困难的比率高达78.16%,而且,需要图书馆帮助解决的阅读问题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基于师生阅读问题展开,把解决师生阅读问题作为推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图书馆不仅是文献信息中心,更多的是高校的阅读推广中心。图书馆要时刻把握阅读这个核心问题,去研究、去发现并去解决阻隔师生与文献信息之间的各种障碍和问题。馆员要经常走到师生中间去,因为很多阅读问题不完全发生在图书馆内,很多前端阅读问题发生在馆外,在大量的潜在读者中间。

4.3 实施专业推广

图书馆属于专业阅读推广机构^[10],高校图书馆更是如此。高校图书馆不应舍弃自身的专业优势去模仿、附和社会其他阅读推广活动,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刘彩娥也认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陷入了服务对象定位错位的误区^[11],这是高校图书馆近年来阅读推广工作举步维艰的根源所在。图书馆以其完备的推广体系、专业的馆员队伍等先天优势,成为全

民阅读的中坚力量。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主导作用凭借的不是阅读推广活动,而是图书馆传统业务的专业性和推广性。通过阅读实现科技创新,提升教学科研质量和水平。当然,在中、高级阅读阶段,面临的阅读问题也是复杂的、专业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就是利用馆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师生面临的复杂问题,为教学科研活动保驾护航。杨莉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应运用专业的手段开展阅读推广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不断深化,使图书馆人的阅读服务更加专业化,吸引师生走进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走专业阅读推广之路是提升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必然趋势^[12]。随着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化,基于用户需求的阅读推广服务内容越来越个性化和专业化^[13]。常青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应积极探索和实施专业阅读推广,为师生提供更加专业的阅读服务^[14]。专业推广是高校图书馆立世之本,是高校图书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与社会其他阅读推广根本区别所在。

4.4 倡导全员全过程推广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是一个完整的推广体系。图书馆阅读推广具有全员性,即分布在图书馆不同部门、岗位的人员均在从事阅读推广工作,没有例外。馆员队伍基本可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从事文献信息推广的馆员队伍、从事读者推广的馆员队伍和为推广关系、阅读关系提供全程全方位保障的馆员队伍^[15]。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不仅是全员性的,而且是全过程的。一篇文献从入馆到读者阅读,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多个岗位人员齐心协力方能完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的阅读结果和效果。图书馆因阅读而诞生,为推广阅读而发展,其推广阅读能力与生俱来。图书馆自产生以来一直在从事阅读推广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16]。高校图书馆以其推广的专业性、权威性和系统性成为读书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也是倡导全民阅读、终身阅读等阅读基本理念的中

坚^[17]。高校图书馆要充分认识推广工作的全员性和全过程性,让每个馆员都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使每个馆员的小推广集成成图书馆的大推广,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大阅读。

5 结语

与社会其他组织、媒体、机构的阅读推广不同,高校图书馆通常利用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帮助师生提升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阅读意愿,解决师生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阅读困难,提高师生参与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阅读数量、阅读质量和文献信息利用率,进而达到推广阅读之目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不能依赖简单的阅读推广活动,而是依靠图书馆传统业务各个环节构成的阅读推广与保障体系。岳修志认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和资源建设、基本服务、日常管理、教育培训等工作密切相关,管理是基础,阅读推广不是图书馆单独的活动^[18]。孙鹏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开展研究,他认为,阅读推广工作最能体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同时也彰显着图书馆的文化遗产使命和历史责任,因而不应当作为一种主题活动间歇性开展,而是作为常态化的业务工作持续开展^[19]。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性始终是其立馆之本、发展之基、动力之源,无论图书馆发展到何种程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都不能丢掉自身的专业技术优势和专业人才优势。高校图书馆长期致力于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对推广对象之一的师生读者和馆员队伍自身建设研究不深、关注不够、投入不足,在网络环境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读者群体阅读状态、阅读与否、阅读什么属于社会问题,属于图书馆的职责范围。高校图书馆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从更深层次理解把握阅读推广的真正含义,才有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阅读”初心和“推广”使命,推动高校图书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文佩丹,杨新涯,唐孝云,等.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转型与突破:以重庆大学第一课堂“文明经典”课程支持服务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2):44-51.

(下转第96页)

· 文献学研究 ·

俞樾与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出版考实*

杨永政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晚清同光年间,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以振兴文教,刊行了大量御纂、儒学和经史典籍,其中金陵、江苏、浙江、崇文、淮南五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影响极大。在合刻的筹备和进行上,浙江书局总办俞樾贡献尤多。俞樾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首倡合刻之议,又联系各地书局,协调分工、化解分歧,促使书局达成了合作。五月,崇文书局李鸿章将合刻之事奏报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刊刻过程中,俞樾又协助借阅善本、拟定章程、确立版式,并时刻关心刻书进度。在朝廷的认可、俞樾的倡议斡旋、各地高官的支持以及学者的努力之下,《二十四史》终得以在光绪四年(1878年)全部刻成。官员和学者间合作和分歧的诸多细节,展现了晚清官方出版业的运作实态。

关键词:俞樾;《二十四史》;官书局;浙江书局;金陵书局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ve Bureau-Compiled Edition of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 Yu Yue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Tongzhi era, provincial official bureaus were established across China to revitalize education and culture. A vast number of imperial compilation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texts were published, among which the collaborative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by the Jinling, Jiangsu, Zhejiang, Chongwen, and Huainan bureau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prepar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is collaborative edition, Yu Yue,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Zhejiang Bureau,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eigh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Yu Yue initiated the proposal for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ed with bureaus in various regions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nd facilitate cooperation. In May, Li Hongzhang of the Chongwen Bureau reported the collaboration to the imperial court and obtained the Emperor's support. Throughout the printing process, Yu Yue assisted in acquiring rare editions, drafting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formats, and closely monitoring progress. With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Yu Yue's initiative and mediation, the support of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the collaborative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was completed in its entirety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 The collaboration and disagreements among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hed light on the operational realit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Yu Yue;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official bureaus; Zhejiang Bureau; Jinling Bureau

1 引言

晚清同光时期,因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

争等原因,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1],文化事业遭受重大打击。在地方督抚的运作和朝廷的授意下,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以振兴文教,“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

*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明代丛书编刻与社会文化”(项目编号:KYCX22_0041)阶段性成果。

印,以广流传”^[2],以刊行正统的儒学和经史著作为主,成为晚清一支极其重要的官方出版力量。各书局除单独刻书外,还合作刊印卷帙较大的经典文献。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江苏书局、崇文书局、淮南书局五局合作刊刻出版的《二十四史》。该本《二十四史》,被称为“局本《二十四史》”或“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是继武英殿刻本系列之后的又一重要版本,其中多部被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用作底本、工作本或重要校本,学术影响极为深远。在合刻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各个书局既有分歧也有合作,而俞樾作为浙江书局总办,不仅主持完成了本局的刊刻任务,还充当了合刻的倡议人、牵线人的角色,对合刻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特殊贡献。

目前,学界对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历史事实已经有了若干认识^{[3]449-450, [4-8]},然而对合刻的一些历史细节尚不清楚,也未有学者全面梳理俞樾在合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以来,书籍史研究在西方日渐兴起,这一研究思路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不同,不再将书籍视为单纯的文本,而是将书籍作为人类沟通的手段,发掘书籍作为物品、商品、文化和传媒的多重属性。书籍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总结出书籍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型,指出书籍的编撰、出版、流通和阅读等各个环节,使得作者、出版者、书商和读者之间连接成了一个交流循环的网络,这一网络的每个环节都体现着社会文化的影响^[9]。近年来,学者也时常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古籍的实际,对古籍的文本书写、编纂刊印、销售流通和阅读接受等情况进行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研究^[10-12]。不过,与西方书籍史不同,中国古籍的刊印过程通常不会留下太多记录材料,学者每每有“文献不足征”之叹。幸运的是,在局本《二十四史》的合刻过程中,俞樾留下了诸多随笔、日记以及和书局同仁的往复信札。通过这些史料,能够厘清俞樾在合刻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局本《二十四史》刊印出版的诸多细节,并以此窥见晚清官方出版中“交流循环”之一隅。

2 倡议刻史并联系书局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时任浙江

巡抚马新贻等人的筹备下,浙江书局正式设立于杭州小营报恩寺^[13]。次年二月,马新贻延请俞樾“总办书局”^{[14]册27:49}。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三十年间,俞樾一直在浙江书局中担任总办,主持刊印了《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诸多书籍,对学界影响深远。其中,两《唐书》及《宋史》即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之一部分,而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正是缘于俞樾的倡议。

2.1 同治八年正月:倡议刻史

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初一,俞樾致信时任浙江巡抚的李瀚章,首倡与其他书局合作刊刻《二十四史》之事宜:

闻(李鸿章)正月中即赴任武昌,未知果否……前得书局同人书,知《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三国志》,苏局谋开雕《明史》。吾浙《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率尔布及,未知尊意有当否^{[14]册28:147}?

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李鸿章到任湖广总督,此函落款“元旦试笔”,又提到李鸿章正月赴任武昌,可知作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初一。当时浙江书局刚成立一年多时间,即将刻成设局以来的首套书籍《御纂七经》(《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传说汇纂》),于是俞樾向李瀚章提议:或与金陵书局和江苏书局合刊《二十四史》,或自行刊印《十三经注疏》。二者皆为士人必读的经史要籍,正是官书局振兴文教的题中之义。

李瀚章很快就向俞樾回信,对合刻《二十四史》的提议表示支持:

大江南北自经兵燹,典籍散失,多士有志,研稽苦无善本,此间七经刻竣,自宜旁及诸史。闻金陵所刻三史将次蒞事,鄙意拟会合苏、宁两局分刊全史以成大观。唯浙中局面褊小,经费无多,而廿四史中繁简不一,宜如何分派刊刻?应请阁下函商诸君子酌定。此不朽之业,想贤者亦乐为左右也^{[14]册31:22}。

李瀚章认为经书刻成之后,“自宜旁及诸史”,抱着刻“善本”以成“不朽之业”的想法,委托俞樾联系金陵、江苏二书局商讨合作和分工事宜。此时,二人的想法尚为浙江、金陵、江苏三局汇刻,后来随着

分工的明晰,才发展为五局合刻。

2.2 同治八年三月前后:联系书局

得到巡抚李瀚章的肯定后,俞樾马上写信联系江苏书局丁日昌、金陵书局马新贻二人。不过,丁日昌以江苏书局要刻《资治通鉴》系列为由,起初只愿意刻一部《明史》,并不愿意再承担其他史书的刊刻。得知丁日昌的意愿后,李瀚章特地致信俞樾,提出崇文书局亦可参与合刻,同时希望俞樾能继续说服丁氏:

雨生中丞函告,苏局续刻《通鉴目录》并《通鉴外纪》及《明史》。弟致书雨生,商刻全史,合苏、浙、宁、鄂各局为之,未知雨生允否?相晤非遥,容当面议^{[14]册31:22}。

李瀚章似乎对此事很担心,希望能与俞樾面议。俞樾于是再次致函丁日昌,并顺利促成了合作。后来,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记载了此事的经纬:

初,同治八年春,余在苏寓,得浙抚李筱荃中丞书,谋合江宁、苏州、杭州三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属余谋之江南诸当事。余因移书问两江制府马端敏。端敏复书,许刻至《隋书》而止,则宁局所刻凡十五种矣。又以告苏抚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难之,曰:“苏局已刻《资治通鉴》,应敏斋廉访又购得毕氏《续通鉴》版归局中,则自明以前事迹具矣。吾再刻一《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灿然在目,何事《二十四史》为?”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则已耳,既刻《明史》,则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种,以成此美举乎!”中丞首肯,乃以刻《辽》《金》《明》三史自任^{[14]册19:50}。

由于江苏书局已刻有《资治通鉴》,且已购得毕沅《续资治通鉴》之书版,丁日昌只想刻《明史》以补齐明以前之史事,不愿多刻其他史书。俞樾便建议丁日昌在刻《明史》的同时,可附带性地刻两部卷帙较小的《辽史》《金史》。由此,丁日昌才同意参与合刻。

至于金陵书局,马新贻的态度较为积极。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马氏回复俞樾称:

承示宁、苏、浙三局会刻全史,嘉惠士林,尊意与筱泉中丞总合,并承询及刍蕘,盛德谦光,可胜钦佩。此间见刻《史》《汉》,将次竣事。已续刻《三国志》,并拟带刻晋、宋及南北朝各书。苏、浙两局如欲汇刊,请从新旧《唐书》入手,得有数年之功,总可告成。惟此间校勘,俱照汲古阁本,苏、浙局中亦能仿照,则将来全史一律,庶成巨观。高明以为何如?^{[14]册31:23}

金陵书局此时正在刊刻前四史,马新贻自然十分支持借助他局力量将《二十四史》全部刊刻。马新贻盛赞李瀚章及俞樾的“盛德谦光”,并主动请求承担从《史记》到《隋书》诸史,同时提出了一条关键性的建议,希望三局统一底本与格式,这条建议在后来也成为各局的共识和纲领并付诸实践。此外,马新贻还提出三局负责人面议此事,足见马氏对此事的重视与关切。

3 协调分工

3.1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协调金陵、崇文书局之分工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在俞樾的联系和说服之下,金陵、江苏二书局已经加入了合刻。先前李瀚章虽云“合苏、浙、宁、鄂各局为之”,意即四局合刻,但崇文书局的具体分工似乎并未确定。与此同时,金陵书局需承担《晋书》及“八书二史”之刊刻,任务过于繁重。因此,约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马新贻致信俞樾,希望将金陵书局的一两种史书分给他局刊刻。因此,俞樾致信李瀚章,询问崇文书局的意向:

越中之行,于月初返棹……昨得马谷翁书,言自《晋》至《隋》,尚有八百余卷,不拘何局,剞劂先成,请分刻一二种,以冀早日毕工。此意闻已函达台端,将来自可通融,此时亦无庸预计也。少荃前辈有来信否?刻史之举,以为如何?前所求一节,有无回音?敬求示悉册^{[14]册28:148-149}。

所谓“越中之行”,据《春在堂随笔》卷二、卷七及《春在堂诗编》卷七,俞樾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至上虞、绍兴。“月初返棹”,可知此函作于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以后。俞樾“前所求一节”,说明俞樾和李瀚章向崇文书局的李鸿章表达了合作意向。但李鸿章的意向似乎尚不明确,俞樾也只是客套地称“将来自可通融,此时亦无庸预计也”,并未多加催促。

结果,崇文书局拟承担两《五代史》和《元史》的任务,但并未分担金陵书局的份额。俞樾写给其兄俞林的一封信札称:

今春李筱泉中丞谋合各省会书局刻《二十四史》,属弟商之江南督抚。因先与丁禹翁商量,许刻

《辽》《金》《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马谷翁(马新贻)回书,金陵书局从《史》《汉》起直任至《隋书》而止。遂携书与筱翁面议,浙江刻新、旧《唐书》及《宋史》,而以两《五代》及《元史》请少荃伯相于湖北刻之。三、四年后,全史告成,一巨观也。弟忝书局总办,实则总而不办,深愧素餐,惟此事稍有参赞之功^{[14]册29:691}。

这封信札颇具总结性,可以看到,此时共有浙江、江苏、金陵、崇文四局参与合刻,且四局之分工已经基本确定,预计“三四年后”即可刻成《二十四史》。俞樾尽管自谦“总而不办”“稍有参赞”,但正是俞樾在书局间的关键斡旋,才促成了这一合作。

崇文书局的参与至关重要,这使得合刻《二十四史》之事正式步入了正轨。崇文书局由湖广总督李鸿章管辖,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上《设局刊书折》,将合刻《二十四史》奏报朝廷:

现在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四省公议,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阁《十七史》板式、行数、字数,较各家所刻者为精密。拟即分认校刊,选派朴学员绅,悉心核对,添募工匠,陆续付梓。一切经费,酌提本省闲款动用,勿使稍有糜费。俟各书刻成之日,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流传。庶几礼让同敦,器陵默化,以仰副圣主一道同文之至意。再,前此设局之始,各书尚未购齐,是以稍迟出奏,合并声明^[15]。

这一“合并声明”,点明了《二十四史》刊刻的书局数量、行款版式、经费来源、用途等信息,并于次月初二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由此,合刻《二十四史》之工程正式启动了。

此外,最终分担金陵书局任务的是后来加入的淮南书局。经过多方协调,迟至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淮南书局才作为金陵书局的附翼加入合刻,承担了原本金陵书局的《隋书》的刊刻。淮南书局由盐政统管,两淮盐运使庞际云在同治九年(1870年)上奏称:

署司前次晋省面奉宪谕,以金陵认刊史书卷数较多,令扬州书局加工分刻,以期速而且精,当与提调洪守面商,认刻《隋书》。署司回扬后已赶觅汲古阁善本以为式样,并觅南北监、殿板各本以备校对,二月初间,即可开工^[16]。

总管淮南书局事务的庞际云在赴南京后便接手

了《隋书》的刊刻任务,在刊刻底本的选择上,《隋书》也随其他各史统一采用了汲古阁本作为底本,这显然是庞际云在南京期间与马新贻有过商讨和统筹。

3.2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协调《元史》《明史》之分工

就在分工基本确定之时,崇文书局的李鸿章却不愿刻《元史》而要与江苏书局争刻《明史》。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俞樾向江苏书局荐刻《明纪》,巧妙地协调了两书局关于刻《明史》的分工之争。此事在《春在堂日记》《春在堂随笔》及《春在堂尺牘》中均有记载:

(同治八年六月乙巳)平斋言有陈稽亭《明纪》六十卷,起自洪武,讫于桂王,如《资治通鉴》之例,叙述详明,拟以告丁中丞刻之书局^{[14]册27:107}。

吾浙刻两《唐书》及《宋史》,而以两《五代》及《元史》请李少荃伯相刻之于湖北。伯相不愿刻《元史》,复移书丁中丞,请以《元史》归苏局而刻《明史》,其意谓元明一也,可以交易。而不知适与丁中丞初意相左矣。于是,平斋观察乃出《明纪》示余曰:“子盍与中丞言之,与其两局争刻一《明史》,何如刻此书哉!”余因与丁中丞书曰:“公欲刻《明史》,以补毕氏《通鉴》所未及,使学者不必读《二十四史》,而数千年事犁然大备,此意甚盛。但《明史》与《通鉴》体非一律,若刻陈氏此书,则与《通鉴》体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于《二十四史》外,别张一帜矣。”中丞然之,遂以书付苏局开雕^{[14]册19:50-51}。

昨在吴平斋观察处见陈稽亭先生《明纪》一书,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讫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温公《通鉴》之例,首尾完全,详略有法,颇擅史才。尊议欲刻《明史》补毕氏《通鉴》所未及,使学者不必读《二十四史》而数千年事犁然大备,此意甚盛。但《明史》与《通鉴》体非一律,若刻陈氏此书,则与《通鉴》体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于《二十四史》外别张一帜。且向来并无刻本,为海内所未见之书。若及此时付之梨枣,会见不胫而走,传播艺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此书尚是草稿,订作十四本,卷帙颇厚,刻成装订,与毕氏《通鉴》多寡不甚悬殊。书中虽有涂乙处,而字迹分明,稍加整理,即可上版,颇不费手^{[14]册28:53}。

《明史》本来应由江苏书局刊刻,但李鸿章亦欲刻《明史》。这时,俞樾从收藏家吴云(1811—1883年)处得见清人陈鹤的编年体史书《明纪》,因此向江苏

书局的丁日昌建议刻《明纪》以代替《明史》。在信札中,俞樾称《明纪》颇具价值但尚无刻本,又与记载宋辽金元史事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体例相近、记事相接,正能在《二十四史》之外组成一个编年体史书的“全璧”。最终,丁日昌同意将《明史》让给崇文书局,而以刻《明纪》《元史》为己任。在俞樾的不断努力下,刊刻工作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4 后续工作

在俞樾等官员的积极推动下,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始有合刻之议,到五月李鸿章奏报朝廷,再到次年二月淮南书局创刊《隋书》,五局合刻的分工已经完全确定。金陵书局承担从《史记》到《南史》《北史》的十四史,皆以汲古阁本为底本;淮南书局承担《隋书》,以汲古阁本为底本;浙江书局承担两《唐书》《宋史》,分别以慎盈斋本、汲古阁本、殿本为底本;崇文书局承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分别以殿本、汲古阁本、殿本为底本;江苏书局刻《辽》《金》《元》三史,皆以殿本为底本。

俞樾在合刻中的贡献不仅在于联系书局和确定分工,在刊刻的前前后后,俞樾亦付出了很多心血。

4.1 借阅善本

在合刻之议尚未完全确定的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十五日,俞樾就致信藏书家陆心源,请求借阅善本以供校勘:

筱泉中丞纠合宁、苏、鄂三书局刻《廿四史》,属弟与江南诸公商量,顷已定议,浙局分刻新、旧《唐书》及《宋史》,数年之后,全史告成,亦一大观也。局中诸友以刻史必得书籍校雠,开单请借。想尊处藏书极多,兹将书目钞览,如能借付数种,精校唐、宋三史,嘉惠士林,阁下之赐也。^{[14]册28:198}

陆心源是江南大名鼎鼎的归安亩宋楼主人,其藏书中就有宋版和元版《新唐书》等各类善本。俞樾和书局同仁开列借书单,特地请求陆氏借阅善本,可见书局校勘史书之用心。

目前尚不能确定陆心源是否向浙江书局出借了他的藏书,但本年五月,在浙江书局校书的李慈铭仍希望能“开单购书”:

因告蓝洲,属其与俞荫甫编修等合词请之大吏,开单购书,罗列诸本,各作校勘记附于后,则不朽盛

事也。但聚书既难,审断尤非易易,时俗因陋就简,斯事繁重,恐终不能行耳^[17]。

李慈铭担忧“聚书”和“审断”之难,甚至认为合刻一事“恐终不能行”,说明陆心源至少没有提供足够多的藏书,以至于书局仍要委托俞樾“请之大吏”另行借书。

4.2 拟定章程

在合刻之初,俞樾在诂经精舍以“会刻全史章程”命题,令学生建言献策:

同治己巳,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四书局有会刻《二十四史》之举。余与闻其事,在诂经精舍曾以会刻全史章程命题。肄业生潘鸿,字仪父,拟章程八条以进。今录其四条:一曰,《二十四史》总计三千二百九十四卷,四局分刻,当各得八百二十余卷……二曰,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阁十七史本,明南北监版二十一史本。……其间异同不一,应作校勘记附末。三曰,各校各书,……凡足资考订者,皆宜购备。四曰,天文、律历等志,非平时所专习者不能订其讹夺,每局应延请精于历算星学者一二人,专校天文各志。^{[14]册19:44-45}

此段文字谓“四局合刻”,当在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淮南书局加入之前,当属合刻的初期。俞樾选择性地录下学生潘鸿的四条建议,以表赞同。而这四条“章程”,在实际刊刻的过程中也基本实现。如《莫友芝日记》中就记载有撰写《隋书》校勘记的原则:“介伯、又苏谐商校《隋书》法,局刻诸史,并依毛本为式,毛本外仅有殿本,南监万历本,适又携北监本来,拟备此四本异同于每卷尾,各附一二纸,其毛误今改者记云依某本改,其两通者但记异同而已。”^{[18]276}

4.3 统一版式

金陵书局是诸局中最先开工,且承担数量最多者。至迟在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前,金陵书局就已刻竣两《汉书》,《史记》和《三国志》也正在刻印中,这种热情令俞樾与李瀚章深感叹服。俞樾在给马新贻的信中说:

刻史之举,金陵书局直任至《隋书》而止,不特见嘉惠来学之盛心,抑且征举重若轻之大力。即携尊函与筱泉中丞共读之,同深叹服。计自《旧唐书》以下,尚余九种,雨生中丞允刻《辽》《金》《明》史,则又去其三矣。见在与筱翁议定,浙江刻新旧《唐书》

及《宋史》，而以薛、欧两《五代史》及《元史》请合肥相国于湖北刻之。三四年间，全史可以毕工，伟大观矣。樾去年承招致浙局，乐观厥成，实喜且幸。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请将金陵刻前后《汉书》样本寄一二本来，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14]册28:207-208}。

俞樾将江苏、浙江、崇文三书局的分工情况告知了马新贻，并向其索要金陵书局刊两《汉书》的样本，分发给各合作书局作为参考以求“格式一律”。金陵书局本两《汉书》也因此成为整个局本《二十四史》格式的样板书。

金陵书局本两《汉书》的字体，是曾国藩特别要求的易于刷印和阅读的仿汲古阁体。莫友芝称：“曾相公示新刊《汉书》样本，以‘方粗清匀’四字为致工法式，校诸刻为醒目。”^{[18]256}俞樾在收到金陵书局寄来的两《汉书》后，特地撰词《玉京谣》一篇，其自注云：“中兴来，东南大吏各开书局，刊刻书籍，余参预其间。书成后，颇有可得之望。而年来精力就衰，著述都懒。从前欲读无书，今得书又苦不能读。适谷山制府寄到两汉书，率题其后。”^{[14]册18:35}颇有感慨。其向马新贻回信称：

略一展玩，其字体工整，格式大方，洵为海内善本。即函告浙局诸同人，新旧《唐书》，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艺苑之巨观也。^{[14]册28:208}

俞樾亦对金陵书局所刻两《汉书》十分赞赏，并要求浙江书局依照其版式刊刻两《唐书》。

4.4 关心进度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此时合刻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因刊刻任务繁多，俞樾曾向李瀚章表达了他的担心：

樾于五月十九日还吴下寓庐，廿二日即患大病，卧床月余，至今尚未能出房，每日在房中扶杖而行……浙局见刻《通鉴辑览》，杨石翁云俟毕工后再刻《唐书》《宋史》。苏局见刻《明纪》，所派各史，亦俟毕工再刻。而丁雨翁又有津门之行，未知如何。伏思会刻全史之议发自台端，未知何日观成，以副嘉惠后学之盛心耳。^{[14]册28:154}

此时，俞樾尚在病中，仍不忘关心《二十四史》的刊刻进度。浙江书局、江苏书局均将分派的《二十四史》任务推后，且江苏书局的丁日昌又不在江苏亲自主持。作为浙江书局总办，看到本局的倡议似乎离实现遥遥无期，俞樾不得不有所忧虑。

虽然没能实现“三、四年后，全史告成”的预期目标，但在各书局同人的努力下，约同治十二（1873年）、十三年（1874年），《二十四史》已刻竣泰半，俞樾此时向李瀚章表达了进一步的期待：

昨由杭州寄到惠书，知前肃寸箴已登台览，并以先兄见背，慰问拳拳，又承寄赐薛、欧《五代史》各一部。拜登之下，感荷良深。伏念汇刻全史之议，发自台端。浙局两《唐书》业已刊成，从事《宋史》，明岁可望卒業。苏局《辽》《金》将告竣。金陵所未刻者，《宋》《齐》《梁》《陈》《北齐》《周书》及《南》《北》两史，卷帙不多，次第开雕，两三年间亦可蒇事。鄂局已精刻两《五代史》，请再饬筹经费，踵刻《明史》，以成巨观。想公必以为然也。世兄学养愈深，造就益大，正不必争一二年之迟速。^{[14]册28:158}

浙局《唐书》已成，《宋史》则明年三四月可毕。鄂局《明史》何时毕工？将来刻成后，仍求见惠一部为感。^{[14]册28:159}

五局的刊刻均稳中有进，俞樾一方面为收到新刊史书样本而欣慰，期待全史在数年内即可完工，另一方面又希望李瀚章能够耐心等待，保证质量，“不必争一二年之迟速”。

4.5 光绪四年（1878年）：最终竣工

依据诸本牌记和各类史料，局本《二十四史》大多数刊成于同治十一至十三年（1872—1874年）之间，其最迟刊成者，当为崇文书局刻成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明史》，以及金陵书局据汲古阁本翻刻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史记集解》^①。合刻《二十四史》之事，由俞樾首倡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诸多同仁的努力下，历时九年后，终得玉成。

《二十四史》全部刊印完成后，俞樾仍时常提起此事，颇有将其作为标杆之意。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以前，在讨论刊刻《续三通》之事时，俞樾提到：“至《二十四史》，业已刊行，浙局新刊李氏《长编》，一时为之纸贵。”^{[14]册28:187}将刊刻《二十四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视为浙江书局的重要历史功绩，并以此来勉励书局同人。俞樾晚年撰《惠耆录》，将自己的生平业绩回顾总结为“事实清册”六条，其中刻《二十四史》等出版事业就占据其中一条：“于兵燹后，总办浙江书局，会商江苏、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及一切有用之书。又精刻子书二十四种，海内称为善本。”^{[14]册31:6}可见刻《二十四史》之事在俞

樾心目中地位之重要。

5 小结

俞樾对局本《二十四史》刊刻出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作为浙江书局总办，首倡合刻《二十四史》之议，在浙江巡抚李瀚章等官员的支持下，积极联络江苏、金陵等书局商讨合刻事宜和具体分工。在金陵、江苏、崇文等书局在分工上产生分歧时，还从中斡旋、调和，促成了书局间的顺利合作。在刊印出版的前前后后，俞樾也付出了大量心血，不仅开列书单向陆心源借阅善本以供校勘，还与诂经精舍学生一起商讨拟定“会刻全史章程”，又以金陵书局本两《汉书》为标准统一了刊刻版式，时刻关心刻史进度，最终完成了这一嘉惠士林之盛举，俞樾亦将此事视为生平最重要的业绩之一。

同时，分析俞樾等人的工作，可以揭示《二十四史》合刻中的诸多细节：刻史计划最先始于金陵书局和江苏书局，且金陵书局当时已经实际开始了两《汉书》的刊刻工作。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俞樾提议诸书局合刊《二十四史》，并得到了李瀚章的肯定。大约三个月后，经俞樾、李瀚章的联系和游说，浙江书局与金陵书局、江苏书局达成了分工刊刻《二十四史》的计划。李瀚章、俞樾还联系了李鸿章，使崇文书局也加入了合刻工程，李鸿章于五月二十日将四局合刻《二十四史》之事奏报朝廷并获批准。同时，在俞樾的巧妙斡旋下，原由江苏书局承担的《明史》刊刻任务移交给了崇文书局，而江苏书局转而刊刻陈鹤《明纪》。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金陵书局因承担任务过重，将刻《隋书》的任务移交给了淮南书局，至此形成了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局面。历时

九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史记集解》刻竣，代表着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终于正式完成。

局本《二十四史》的刊刻虽不免曲折，但最终顺利完成，这也是晚清官方出版业的一个缩影。晚清官书局是由朝廷批准成立的官方出版机构，作为书籍“交流循环”中“出版方”的角色，其出版后的流向是“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流传”（前揭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语），目标读者主要是生员、寒儒等读书人。但它与“读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目的是教化“读者”、传承文化和维护官方权威。《二十四史》的合刻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代表着官方的文化意志。因此，其在经费筹措、宣传销售等方面的压力天生就小于营利性的民间书坊。

然而，《二十四史》毕竟卷帙浩繁，并不能因为其官方性质而一帆风顺，最终的工期也比预想的三、四年时间长了许多。前揭李慈铭已从收集善本和校勘审断两方面指出合刻之困难。金陵书局负责校书的学者张文虎在合刻之初（同治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也称“此举经费浩繁，遽难报命，姑当缓商”^[9]，认为所需金钱和时间太多，难以成行。再加上如李鸿章、丁日昌等高官个人的刻书偏好和文化理想，导致书局间的分工也与俞樾最初的设想存在一定分歧^②。面对种种困难，在朝廷推动的前提下，正是有了俞樾的倡议和牵线，诸多高官的支持，以及大量学者的努力，才共同促成了这一盛举。正如柳诒徵评价局本《二十四史》的刊刻所云：“当时督抚和衷共济，又多学者参预其间。综其颠末，不独为书林之佳话，亦可见治体之休明。”^[349]官员学者在磨合协调、化解分歧的基础上，合作刊刻正大典籍，以达成振兴文教的目标，正显示出晚清官书局作为官方出版业的运作实态。

注释：

- ① 金陵书局刊有两种《史记》，一为刊成于同治九年（1870年）的《史记》三家注本，一为刊成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史记》单集解本，后者系由汲古阁本翻刻，收入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
- ② 王晓霞指出晚清官书局是由地方督抚创办的，“地方督抚掌控着重建意识形态的实际权力，这冲击和改变着清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使得中央与地方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王晓霞：《知识重建与权势转移：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出版科学》2019年第5期）。

（下转第92页）

· 文献学研究 ·

行走的阅读——陈训慈《胶海消暑日记》述略

周余姣¹ 殷雅琪²

(1.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天津 300387)

(2.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日记是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有特殊的史料价值。陈训慈所撰写的《胶海消暑日记》虽篇幅不长,但内容涉及其参加1936年图书馆界的一场盛会——在青岛举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以及其筹备浙江文献展览会等重大图书馆界史事,还记录了其在山东一地的考察经历以及个人阅读书目。在日记中,陈训慈对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多直言评价,颇能见出其个性,亦保留了最为珍贵的史料。我国图书馆学人所撰日记并不多见,陈训慈以其生动之笔,为我们记录了当时图书馆界的多个面向,展现了一幅鲜活的民国图书馆史画卷。

关键词:《胶海消暑日记》;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史;图书馆学人;陈训慈

中图分类号: G255.9;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Chen Xunci's *Jiao Hai Holiday Diary*

Abstract Diaries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for studying the lives and thoughts of individuals, holding special historical value. Chen Xunci's *Jiao Hai Holiday Diary* may be short in length, but it cover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library field in 1936—the Library and Museum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held in Qingdao, as well as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Zhejiang Literature Exhibition and other major library historical events. The diary also records Chen's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Shandong and his personal reading list. In the diary, Chen Xunci provides candid evalu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events involved, revealing his personality and preserving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Diaries written by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Chen Xunci's vivid writing captur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ibrary field at that time, presenting a vivid picture of library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Key words *Jiao Hai Holiday Diary*; China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 history; Library scholar; Chen Xunci

1 他时之追怀——陈训慈的日记

陈训慈(1901—1991年),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1924年陈训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先后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大学、浙江大学。1932年陈训慈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主持创办《文澜学报》《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刊物。1936年10月举办著名的浙江文献展览会。抗日战争时期,陈训慈组织抢运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避至富阳、龙泉、贵阳等地,护书有

功。1949年后,陈训慈历任第一至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1990年,在其九十大寿之际,陈训慈捐献其《丁丑日记》手稿及其保藏的148封各界名人信札给浙江图书馆。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五卅惨史》《世界大战史》《晚近浙江文献述概》等。

《运书日记》(附《胶海消暑日记》)^[1]为周振鹤、周暘谷所整理的陈训慈日记,时间跨度是1936年7月16日至8月16日、1937年9月8日至12月24日、

1938年1月1日至2月28日。《运书日记》涉及抗日战争初期其主持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的心路历程,是我国古籍保护史的重要研究资料。《胶海道暑假日记》篇幅虽不长,但内容涉及其参加1936年图书馆界的盛会——在青岛举办的图书馆暨博物馆联合年会,并筹备浙江文献展览会等重大图书馆界史事,还记录了其在山东一地的考察经历以及个人阅读书目。在日记中,陈训慈对其身边的人和事多直言评价,颇能见出其个性,亦保留了最为珍贵的史料。

《胶海道暑假日记》封面由陈训慈题:“民国二十五年八九月之交于青岛,卅六年夏再客杭州重订并题耑。”^{[1]166}可见该日记虽记于1936年,但陈训慈于1947年曾加以重订。日记前还有陈训慈所作题记:“余自二十二年八月作故都之游,归途游曲阜,瞻孔林,登泰山迎朝日,而人事匆匆,济南过而未游,更未遑胶海寻胜。二十五年夏,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开会,遂得游青岛崂山诸胜,自以身心欠健,终岁于役,公私丛脞,此心常无清明气象,爰以馆务委诸同仁,小住休憩。复得袁道冲先生之介绍,得住湛山精舍青岛佛学会所在地。倏虚法师颇相优礼,而同住有宏伞法师,则杭州招贤寺住持也。相见导示修持之道,尤为殷渥。此半月余中,始则参与协会会议,尤多尘务,继乃静居山海,读经看书,海景潮声,荡涤胸襟。排日有记,存之以留他时之追怀云。”^{[1]168}笔者拟以《胶海道暑假日记》为中心,就相关的史实作一考察。

2 全面的记录——陈训慈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

2.1 不减北平年会——全程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

1936年举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有重要意义。笔者曾撰写专文介绍了该会议的筹备人员、参会者概况、会议议程、会议提案、会议出版物、会议特点,并通过钱存训、沈宝环、邓衍林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的追忆,再现了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2]。陈训慈《胶海道暑假日记》记载了其参加本次年会的全部过程,留下了非常鲜活的会议史料。

鉴于中华图书馆协会所办年会参与图书馆之多,陈训慈有意借机继续调查全国省立图书馆之概况(1936年,其调查之产物《中国之省立图书馆述概(附表)》^[3]发表),遂以个人会员身份参会,并带领浙江省立图书馆阅览部主任陈豪楚一同参加。在1933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举办第二次年会时,陈训慈曾撰有《祝中华图书馆协会二届年会》^[4]一文,表达其对第二次年会的期望。第三次年会,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亦曾嘱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的陈训慈撰写宣言,但因陈训慈车祸受伤未愈未能及时撰写。1936年7月19日到会后,陈训慈先以监委的名义参与了在中山公园举办的图书馆协会、博物馆协会执监会。又受袁同礼之托,为本次年会《对于两协会之希望》一文进行润色(后以《对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的希望》为题发表于7月21日《青岛日报》上),还负责审查图书馆行政组提案。在7月21日的讲演会上,陈训慈发表了《天一阁之过去与现在》的演讲,借此唤起图书馆管理者对这座历史悠久的藏书楼的注意。在晚间图书馆教育及民众图书馆的讨论会上,陈训慈亦发表了看法。7月30日其又在日记中追记:“又在协会开会期间,时有人问以对图书馆教育之意见,因其论文华专校之得失,余戇直谓‘只随西人逐逐于技术之末,不务中国学术基础之培养,未见其是’,又谓:‘文华毕业者大多能处理大学之西文编目,而于饶有本国图籍之公共图书馆则未宜。’”^{[1]215-216}可见其看到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人才培养的短板,长于学习西方的编目技术,却短于修习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其后,陈训慈亦与参会者一道参观游览二日,考察了海泊河苗圃、沧口小学、李村办事处、李村农场、崂山石公司,并参观本次会议举办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此次年会,参与人数较多,在陈训慈看来,“会员出席如合博协会在内,似不减廿二年之北平年会也”^{[1]180}。

2.2 意态远胜——记录了对参会人员的印象

在参会过程中,陈训慈记录了多位参会者的情况。如在途中记录其业师柳诒徵:“柳师体健,精神充沛,谈话朗朗有神韵。余与对谈几全日,自愧精力不如太多。师今年五十八,自其始执教,殆已四十年……主国学图书馆已九年(十七年起),月俸良薄(月二百元),更不兼职,而苏当道尤疾之。于该馆经费薪而不加,师谈次坎坷甚矣。”^{[1]171}当时柳诒徵主持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已九年,陈训慈对柳诒徵治下的图书馆经营困境有所揭示。二人还曾谈及章太炎逝世以及南京建都等问题。柳诒徵、陈训慈有师生之谊,又同时执掌江苏、浙江两大图书馆,二人往来频密,在陈训慈主持下,浙江省立图书馆编有《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后陈训慈亦曾撰写《劬堂师从游踪记》专门纪念柳诒徵先生。

此次会议,陈训慈第一次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谓:“马叔平先生(衡)近长故宫博物院,前日自平南下,为参与中国博物馆协会,亦以今日早车由济登车。马先生虽甬籍,余未尝前识,今日以聿茂介而识之,遂邀午餐于车中,下午往其室一叙,以子弟辈相视,坦率如素相识,于中央研究院之无理,与傅孟真、罗志希之狭隘,慨乎言之。”^[1175]经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的介绍,陈训慈与同为浙江宁波籍的马衡结识。二人交谈中,马衡对中央研究院中之人多有议论,且显露不平之气,亦讨论故宫文物、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南迁的问题。在陈训慈的笔下,马衡之性情跃然纸上。

本次年会,亦吸引了众多青年参加,陈训慈见到了不少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钱存训当时为交通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陈训慈记录:“钱存训在上海,于图书馆参考书问题颇有攻研,其态度亦沉着有守,与杜定友同事,而意态远胜之矣。”^[1185]其对钱存训评价颇高,钱存训后果然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似可见出陈训慈识人之明。陈训慈亦与同龄人多有交流,如与袁涌进探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问题,陈训慈谓:“余与钱存训、曹钟瑜、袁湧(涌)进同席。曹君川人,甚谦和,袁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目,亦自谓该馆于国际联络较注意,对国内大图书馆之联络太忽略也。”^[1186]通过袁涌进之口,说明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较为重视与海外的交流,却较为忽略与国内图书馆界之联络的问题。

陈训慈对青年才俊和同龄人虽颇能优容,但对当时在图书馆界活跃的领军人物要求颇严。沈祖荣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1936年亦带自己的子女沈培凤、沈宝环参加本次年会,并在此次年会上做了多个报告,如《公立图书馆在行政上及事业上应有之联络》《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报告》,陈训慈对此多有评价^[1186-187]。会务会时,袁同礼报告颇多,陈训慈亦在日记中有所评

论^[1187]。其率真之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陈训慈还记录:陈仲蕃甚健谈;李石曾讲词题名太大,实质不足副;雷法章颇擅口才,然所言多华而不实;袁道冲神态谦冲,蔼然可敬;赵与之谦冲可亲;宏伞师甚和善,开示甚周;李达最健谈;赵孝陆颇磊落不拘谨,等等。在日记中,陈训慈直书不讳,读来令人莞尔。

2.3 公谊可感——借机筹备浙江文献展览会

借着本次开会的机会,陈训慈在年会闭幕后约集“浙江文献展览会谈话会”。参加的有:叶恭绰、马衡、袁同礼、柳诒徵,故宫博物院沈兼士、庄当严(即庄严)、傅振纶(即傅振伦)、单士元、方苏生,清华大学金大本,武汉大学吴其昌,河南博物馆馆长王幼侨,上海博物馆馆长胡肇椿,天津美术馆馆长严智开,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张知道,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黄济等^[1188]。陈训慈报告了浙江文献展览会筹备的经过,设计会干事、组织、各组主任之人选,征品分会的办法。与会人员共同商讨参与之办法,均表示要积极支持。叶恭绰更是极力赞成,后还曾为浙江文献展览会送展了其收藏的手稿本《经义考》一册。故宫博物院承诺将浙人书画或名档、摄影寄送。国立北平图书馆慨允出借珍本,后果然送展了稿本《闹事纪闻》六卷等29种珍贵善本。袁道冲表示可借展其父袁昶的《袁忠节公日记》《袁忠节公笈札》等。这次谈话会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浙江文献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返程中,陈训慈为浙江文献展览会事,仍在南京奔走不停。陈训慈记:“过中央研究院访王毅侯,至中央图书馆晤蒋馆长,多为借展品事。朱寓仍未见,主人亦太慢客,非为文献展览公事,余岂仆仆傍门者耶!孟海忠于某公,亟慰之,允南京征品事。朱君主持,名无问题,渠必效奔走,公私谊可感。晚为文展南京征集事,宴客于同乡会,柳师来,又朱遏先先生等十人,推柳师为南京征品分会副主任,朱居主任名,孟海为代表焉。”^[11252]可见其在促成浙江文献展览会过程中多方奔走,先后拜访中央研究院总务主任王毅侯、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等人,受到“慢客”冷遇时亦曾觉委屈,然为公事只能尽力。经其不懈的努力,各机构和个人均为浙江文献展览会提供了展品,蒋复璁提供了

《蒋生沐先生遗像》一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提供了《东莱书说》九卷等善本9种，朱希祖则提供了《鲁之春秋》二十四卷等善本4种^[5]。1936年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展品极为丰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6]。其后苏州也开始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均是受到了浙江文献展览会的影响。

3 行走的阅读——陈训慈在青岛的“静居”生活

3.1 孜孜考订——考察山东一地之藏书家和图书馆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结束后，陈训慈在青岛休养，继续拜访山东当地的藏书家。1936年8月2日和3日，陈训慈拜望了张镜夫（1890—1955年，名鉴祥，字镜夫，以字行），其在日记中云：“张君亦藏书，于公私书目搜罗尤备，得入室观其书，深佩其用功之勤，搜罗之广，旋复偕赴胶州路，访鲁藏书家赵先生。”^{[1]229}另记张镜夫：“惟孜孜于考订校编之间，其襟度亦不可及也。”^{[1]233}陈训慈在日记中对张镜夫着笔甚多。其在张镜夫处见到了刘喜海钞稿本《天一阁现存书目》，后张镜夫为浙江文献展览会提供这部书目参展，并允许浙江省立图书馆录副一份。张镜夫的藏书斋“千目庐”收藏书目极为丰富，今人李艳秋对张镜夫藏书及目录学成就亦多肯定^[7]。

通过张镜夫，陈训慈对山东藏书家做了更多了解。如李璋煜（1784—1857年）酷好金石，为著名的文物鉴赏家，亦是藏书家。陈训慈记录其藏书散佚的情况：“山东旧藏书家而今已散佚者，有‘爱吾鼎斋李氏’。李名方赤，字璋煜，诸城人，其子肇锡为张镜夫外祖。璋煜公与陈簠斋为亲家，常相互交换古物，此外致力搜书，亦富抄本稿本，多至四十箱。辛亥革命以前，肇锡子已有一部分让售，一部分张母乃运回保存。比民国五年革命（即居正之鲁），日本军乘机侵诸城，携书而去，李氏所藏凡百〇五种皆不见（张君处存者有元刊明印之《韩诗外传》五本，谓系仅存之纪念物矣）。李后人式微，张君今略聚书，皆十余年来所自购云。”^{[1]230}

山东海源阁的藏书散佚情况，陈训慈也有所记录：“聊城杨氏海源阁主杨益之先生以增无子，以从子为继，甚悖妄，欲售书为庶母阻，其后遂运津，押借欲三十万。以此，大批书皆分散，其一部分尚押在

三银行，闻在济一部分，曾以五千元议价与鲁馆而未能收，亦太可惜。闻杨戚某君尚有一箱，凡宋元本三十种左右，惟系窃取，不敢露面云。”^{[1]230}陈训慈所记海源阁藏书流散之命运，让人叹息。

在这二日期间，陈训慈见到了藏书家赵录绩（1875—1939年）：“赵孝陆先生（名录绩），年六十余矣，甚康强（尝官翰林院，有‘清流党十怪之一’之号），而豪迈不拘，一见即问来多日矣？旋问嘉业楼、天一阁及《四库全书》现状，论及八千卷楼书。渠谓‘非端午桥，此书亦早散归东瀛矣！’余告以来意，慕名来谒，且图观书。”^{[1]230-231}赵录绩为王献唐之岳丈，有藏书楼“模邕阁”。通过赵录绩，陈训慈了解了很多隐秘史事，还在赵录绩处目验了宋开庆元年刻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等珍罕古籍10种，并一一为之记录。

这一次青岛之行，只有10个省立图书馆参加，陈训慈因之感慨各馆联络之不易。但陈训慈的一个重要收获是见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王献唐师友书札》有陈训慈致王献唐书札四通，其中一通为陈训慈托属下代致，文云：“此次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三次年会于青岛，慈决出席参与，藉雅聆诸公教益。济南与青岛相距不远，而先生主持省馆又为协会会员之一，谅当如期出席，果尔则晤教当在不远矣。闻先生自主馆政以来，对于馆务多所兴革，仰慕之私，与日俱深，南下之便当过济来贵馆聆教并冀获他山之助，用先奉闻。”^[8]陈训慈7月20日记王献唐：“曩曾通信，未见其人，今始后识，年三十余，温文沉默。”^{[1]182}8月3日复记：“山东省立图书馆辑印《齐鲁先哲遗书》，而不就商于人，仅出篇帙甚轻者二种。王献唐君好古物，于佳书不多购，凡购得捐得者（如《柳堂遗书》）亦不好事整理云。”^{[1]234}此处记载了王献唐更偏重收文物的倾向，后王献唐果然亦执掌山东省博物馆馆务。陈训慈自青岛返程过济南时，又拜访王献唐，再记：“鲁馆系王献唐先生任馆长，在北方各省立图书馆中为较胜，时有通讯，声应气求，相见良欢。亟出馆藏珍本，与近年收致之古字画相视。余于字画殊外行，然传闻王君所收不少贗品也！旋偕出同游趵突泉。晚献唐先生款宴余于酒家，孔令灿（教厅主任秘书，曾来杭参观得识）同席，孔君圣裔别支也。”^{[1]250}二人相见甚欢，一同观书、游览。后山东省立图书馆为浙江文献展览会提供了宋刻本《慈

表1 陈训慈 1936年青岛度假期间阅读活动一览表^{[1]203-249}

时间	阅读活动
7月26日	请教倭虚法师《十戒略解》。
7月27日	在宏伞法师指导下购《净土十要》《净土辑要》，录苦行居士《净土辑要》上篇之“警语”及“常识语”。阅《崇俭主义》《劝戒录节本》《素食主义》。
7月28日	读《净土辑要》龙舒净土文，兼阅陈熙愿《净土切要》第一篇，别阅吴情节辑《八福田》一小册。宏伞法师持示《袁了凡先生四训》，录龙舒《净土起信论》警语数则（《净土辑要》中篇）。
7月29日	读完陈熙愿《净土切要》，读《袁了凡四训》，续阅《净土辑要》，晚阅李泰棻《方志学》和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之绪言，录《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之后半段。
7月30日	读《净土辑要》飞锡、永明、宗赅、有严、虎谿、天如诸师法语，并莲池大师法语，阅讷堂老人撰《果鉴释十界略解》，阅李泰棻《方志学》，向宏伞法师请教净土佛法之疑念及不解处。
7月31日	续读《净土辑要》莲池大师法语并录。
8月1日	看净土五经之一节，读《净土辑要》慈山大师、紫柏大师法语，又阅净土五经中之《普贤行愿品》，阅江易图《佛法讲演录》，阅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论艺术、论社会、论自由主义各节。
8月2日	阅《净土辑要》藕池大师法语。
8月3日	读唐诗律诗，阅《净土辑要》满益大师、省庵大师法语，阅王搏今《海外杂笔》，阅王季同著论佛法者，阅《大公报》。
8月4日	阅《净土辑要》截流大师净土警语八页，阅李泰棻《方志学》方志之体例资料各章，读《不可录》，阅《大公报》，录《健身要旨》。
8月5日	阅《青年修养》等小册二种，读《净土辑要》《西方公据》说袁列星、陆士铨、彭二林居士法语、读净土五经《普贤行愿品》，草《青岛短简》一文，读唐人律绝句。
8月6日	读《净土辑要》澈悟禅师语录十二页，读其下篇《佛说阿弥陀经》，读完《净土辑要》。撰草《青岛短简》第二节“街头风光”。
8月7日	阅《东南日报》，阅《护法论》《大公报》，写《青岛短简》“海水浴场”一节。
8月8日	读净土五经《普贤行愿品》。
8月9日	读净土五经《华严净行品》四言偈，阅王搏今《海外杂笔》及报纸。

溪黄氏日抄分类》九十七卷（残存一册）等珍稀善本4种参展。

陈训慈在青岛期间还考察了山东大学图书馆（时在青岛）、青岛公共图书馆两馆，对二馆的情况亦有所记录。

3.2 读经看书——陈训慈的个人阅读记录

在湛山精舍避暑休假期间，陈训慈结识了天台宗第44代传人倭虚法师（1875—1963年）、杭州招贤寺主持宏伞法师（一般写为“弘伞法师”），在他们的指导下，先后阅读了很多佛学相关书籍，如表1所示。

可见，自7月26日至8月9日这15天内，虽名为休假，却是陈训慈集中阅读的时间。在两位佛学大师的指导下，其在净土五经，即《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上花费时间较多，亦同时阅读了其他书籍。在阅读佛经之时，陈训慈亦在饮食上进行了约束，适度戒荤。今可见陈训慈题杭州灵隐寺药师殿之对联“十二药叉荷负有情渐修梵行光辉一心

一世界，七千眷属盛陈大愿护念神力证得三藐三菩提”，其与佛教亦算颇有渊源。以现代阅读理念观之，其在休养身体之时，亦采用了“阅读疗法”进行自我疗愈。

4 结语

张剑曾提出：从文体学角度看，日记是应用文的最为常用的文体之一；从史料学角度看，因其亲历者身份，常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从文化学角度看，因其内容包罗万象，又具有百科全书性质^[9]。一般而言，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被视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可补史之缺，详史之略，证史之误。我国图书馆学人的日记并不多见，更显可贵。陈训慈《胶海道暑假日记》以其生动之笔，记会议，品人物，为我们记录了当时图书馆界的多个面向，展现了一幅鲜活的民国图书馆史画卷。其《运书日记》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训慈.运书日记(附《胶海道暑假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周余姣.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纪念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80周年[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11):45-52.
- [3] 陈训慈.中国之省立图书馆述概(附表)[J].浙江教育,1936(10):2-13.
- [4] 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54-259.
- [5] 陈训慈.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M].杭州:凤凰出版社,2020:5-484.
- [6] 江山.民国时期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及其影响[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6(2):84-88.
- [7] 李艳秋.张镜夫及其千目庐藏书[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8(2):63-64.
- [8] 杜泽逊.王献唐师友书札[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1646-1647.
- [9] 张剑.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J].国学学刊,2018(4):121-131,143.

作者简介: 周余姣,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籍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历史文献学、中国图书馆学史;殷雅琪,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22级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图书馆学史。

收稿日期: 2023-05-08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86页)

参考文献:

- [1] 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M]//陈澧.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北京:文海出版社,1967:373.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册17:同治六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3.
- [3] 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M]//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4] 王绍曾.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M]//目录本校勘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81-562.
- [5] 吴家驹.局本《二十四史》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5):128-129.
- [6] 邓文锋.五书局合刻《二十四史》[J].出版史料,2010(2):75-77.
- [7] 朱炜.俞樾与浙江官书局[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5(1):70-71.
- [8] 刘甲良,马学良.同光朝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考述[J].历史档案,2018(2):102-108.
- [9]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0.
- [10] 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J].刘宗灵,鞠北平,译.史林,2008(4):1-19.
- [11] 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50(3):110-121.
- [12] 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献,2020(4):4-15.
- [13] 马新贻.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M]//马端公奏议: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109.
- [14] 俞樾.俞樾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15] 李鸿章.设局刊书折[M]//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奏议:同治八年五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50.
- [16] 庞际云.抄呈书局章程请示禀[M]//淮南盐法纪略:卷10.刻本.淮南书局,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
- [1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六册:同治八年五月十九日[M].扬州:广陵书社,2004:4409-4410.
- [18] 莫友芝.莫友芝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19]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正月至十二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70.

作者简介: 杨永政,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书籍史。

收稿日期: 2023-03-10

本文责编: 李芳

· 会议综述 ·

一次具有前瞻性的高校图书馆发展研讨

——“治理·变革·转型·赋能 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学术会议”综述

刘柏嵩¹ 刘翔² 高兆云³

(1. 宁波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211)

(2. 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18)

(3. 宁波工程学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2023年6月16—17日,“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学术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高校图书馆的300多名专家和代表与会,共商应对之策。此次会议是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界在国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下,积极响应与配合国家重大决策,并努力使之落地而进行的深入交流与探讨。会议的重点是围绕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未来学习中心建设进行动员,归纳和总结以往各自图书馆的具体做法,争取形成较为一致且可推广的具体措施。会议不仅体现了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界的学术敏锐性和执行力,更有助于高校图书馆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和价值的彰显,同时对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长三角地区;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未来学习中心

中图分类号: G258.6;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A Forward-Looking Seminar on University Library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of the "Governance,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Empowerment on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bstract In June 2023,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as held in Ningbo, Zhejiang. More than 300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universities in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municip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onvened to discuss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This conference was an initiative taken by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tively aligning with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major decisions. The focus of the conference was to mobilize efforts arou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learning centers, summariz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practices of individual libraries in the past, striving to formulate consistent and scalable measures. The conference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academic acumen and execution capabilit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enhancing their status and showcasing their value. It also holds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types of librar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n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future learning center

1 会议概要

为应对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给高校图书馆带来的挑战,2023年6月16—17日,由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办公室指导,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及其数据管理与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宁波大学图书馆、宁波工程学院图书馆承办的“治理·变革·转型·赋能 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学术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高校图书馆的300多名专家和代表与会,共商应对之策。

6月16日上午,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柏嵩主持了开幕式,宁波大学副校长李伟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新碗、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分别代表宁波大学、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致辞。李伟平副校长首先代表承办方宁波大学向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代表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继而向代表介绍了宁波大学和宁波大学图书馆近年来的工作成绩。李新碗馆长在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之后,指出高校图书馆需要抓住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和价值的彰显,同时,充分利用长三角的人才、技术、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优势,在推动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寻求合作,共同推动我国高校数字化图书馆转型进程。吴晨副馆长在祝贺会议召开之后,就会议的主题“治理·变革·转型·赋能”进行了阐释。

开幕式后的主旨报告,由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翔主持。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陈凌研究馆员以“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未来学习中心建设——高校图书馆发展漫谈”为题,详细介绍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由来、特征以及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明确指出实现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手段就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目标是使图书馆成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未来学习中心。目前是开展试点建设,最终是建立起国家、省、校三级的未来学习中心体系,这是使图书馆重回大学“中心圈”的重大契机,图书馆要紧紧抓住这个契机。最后陈凌研究馆员呼吁高校图书馆要更加关注新时代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需求,服务于新时代育人的需要,真正进入并融入高校人才培养、未来教育生态的各个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李新碗馆长作了“去课堂化专业教育变革下未来图书馆发展新机遇”的主旨报告,介绍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情之后,围绕变革型教育对当今的教育环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得出当今教育变革的条件日渐成熟的结论,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如何围绕这些变革从资源支撑、多元化学习空间、多元化活动、管理服务创新等领域所作的努力,最终实现回到学校人才培养C位的目标。

主题报告环节,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在“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平台、服务与评估”的报告中首先回顾了21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颠覆性技术对图书馆行业的冲击过程,接着从平台、服务、评估等角度对智慧图书馆建设进行了详细讲解,着重从图书馆角度对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提出的“未来学习中心”进行了解读。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储节旺作了“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与馆员数字能力培养”的报告,首先介绍了数字化时代的特征,并强调了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和馆员数字能力的培养与生成,最后明确指出未来图书馆的最好走向是学习中心。江苏汇文公司副总经理兼产品总监崔新江、重庆维普智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魏铭分别作了“数据赋能下的资源建设与读者服务——汇文下一代图书馆平台”和“图书馆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服务升级”的技术报告。

下午专家报告与技术报告相结合,第一时段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主持,报告专家分别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和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柏嵩。杨新涯的报告“智慧图书馆大厦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强与读者需求、馆员能力、图书馆特色相适应的持续投入,要进行数据规划,要有统一的数据基础平台,以智慧图书馆建设为目标进行数字化转型,构建高质量服务体系,重庆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正在路上。刘柏嵩的报告“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发展:一种外部视角”,从背景、方法、实践三个角度阐述了他对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思考,借鉴国内外和行业内的先进经验,塑造变革能力,培养数字化思维、认知、方法,构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组织。

第二时段由国防科技大学电院图书馆副馆长陈蕾蕾主持,专家分别是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樊亚芳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经理金更达。樊亚芳的报告“数智赋能的高校图书馆空间管理与服务创新”回顾了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早在2016年即自发开展的“未来学习中心”的空间建设,然后从空间管理和服务创新的角度逐一介绍了具体做法。金更达的报告“平台思维:构建中文图书资源建设新生态”从反思传统出版业面临的冲击入手,指出构建名为书递的中文电子图书出版平台是构建馆社融合的新生态,可以更好地提高馆藏建设质量。

江苏感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同同作了“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智慧书库建设”、北京汇云博图公司白旭升作了“内容+科技,构建全场景数字阅读生态”、北京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孙欢作了“超微新一代服务平台助力图书馆智慧化建设”、上海盛卡恩智能系统有限公司钱青作了“图书馆空间智能管理体系建设”、宁波八益公司汪航舰作了“建设空间感知的智慧图书馆——空间即服务”、远望谷公司徐超洋作了“图书馆里改变世界的力量”等技术报告。

17日的会议按主题分为两个分会场。第一分会场为圆桌会议,主题是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由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翔主持,分为专家报告和交流报告两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窦天芳的“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思考”报告,首先提出要理解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继而介绍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并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了其在能力平台化、资产数据化、服务敏捷化等方面的具体探索。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黄晨“未来图书馆:起点还是终点”的报告从身处大时代入手,分析了当今图书馆的竞争力,提出了是困守愁城还是涅槃重生之问。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徐建华教授“电子书新书馆配平台建设与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优化”的报告,首先指出图书销售的发展趋势是纸质书主要提供给公共图书馆,电子书主要提供给高校图书馆,当今纸质书馆配在高校图书馆的时效性较差等原因使得相关各方均陷入困境,会出现知识增长中的大学生群体长期见不到新书的现象。要想改变这个状况,图书馆只能寄希望于新电子书的馆配

平台的建立。徐建华教授还分析了当今存在的6种类型电子书馆配平台的优劣,最终强调高校图书馆要在新的电子书馆配平台建设和游戏规则建立中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作用。交流报告由湖州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沈宏良和复旦大学图书馆数据管理与技术部主任薛崧分别以“知识视域下数字资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思考”和“高校图书馆的数据工作:架构、底座和服务”为题,介绍本馆在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

第二分会场为青年学术论坛,由宁波工程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高兆云主持,形式更加多样,由专家报告、交流报告和技术报告组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编辑部主任徐亚男作了“学术期刊编辑眼中的优秀论文”的专家报告,从学术期刊的选稿标准与用稿规范入手,逐步推出学术期刊编辑眼中优秀的学术论文的标准是问题导向、前沿意识、国际视野、创新结论,最后论证了学术热点与论文选题的关系,鼓励年轻人多研究真问题,多出精品。接着,浙江大学图书馆金佳丽、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孙翌、南京大学图书馆孟勇、东南大学图书馆罗涛、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黄勇、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利华等人结合本馆的工作实践,分别作了“面向未来学习中心的高校图书馆转型与升级”“数字人文视域下名人特色展阅空间的可视化服务研究与实践”“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实践与展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图书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数字化转型下的高职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升级”“基于新馆建设的智慧图书馆实践探索”的交流报告。最后,戴尔科技集团李涛作了“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报告。

2 会议特点

首先,显现了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界较高的学术敏锐度。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3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要求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图书馆,能够迅速地意识到这将会给高校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使得高校图书馆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及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中有可能发挥枢纽作用,重回学校的学术中心。

其次,凸显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人的执行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未来学习中心的实施,是近年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之举。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人能够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与配合国家重大决策,并努力使之落地,较为系统地总结各自图书馆从自发到自觉的努力与过程,体现了高度的政策执行力。

第三,会议内容前沿而丰富。本次会议的重点是围绕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未来学习中心建设进行动员,归纳、总结以往各自图书馆的具体做法,争取

形成较为一致且可推广的具体措施,如电子书新书馆配平台建设与资源建设优化的关系,青年馆员的培养与提升,论文写作,等等,会议内容全面而系统。

第四,会议层次感清晰,节奏好。大会的主旨报告、专家报告与技术报告各有侧重,不同时间单元交织在一起,相互调节,层次清晰,控制听众的兴奋点,节奏感好。同时,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未来学习中心的实现需要技术支持。因此,会议围绕高校图书馆新工作开展为不同类型的系统商、设备商参与讨论搭建平台,共商解决之道,就成了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特色。

作者简介:刘柏嵩,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智慧图书馆;刘翔,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术数据分析;高兆云,宁波工程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2023-07-31

本文责编:李芳

(上接第79页)

- [2] 范并思.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合理性审视[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23):34-39.
- [3] 蒋永福.阅读与图书馆: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思考[J].图书馆建设,2022(1):127-134.
- [4] 谢蓉,刘炜,赵珊珊.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219):87-98.
- [5]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 [6] 吴汉华,史佳,卫劭杰.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共识: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及阅读与心理健康研讨会综述[J].图书馆建设,2019(1):147-154.
- [7] FARMER L,STRICEVIC I.Using research to promote literacy and reading in libraries :guidelines for librarians[R].The Hague: IFLA Headquarters,2011.
- [8] 蒙媛.EBL视角的阅读推广效果评估研究:以美国实践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4):86-89.
- [9] 于良芝,于斌斌.图书馆阅读推广——循证图书馆学(EBL)的典型领域[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4,23(6):9-16.
- [10] 丛全滋,李春利,王师爽.图书馆阅读推广构成要素及其主要作用关系研究[J].图书馆,2022(4):21-27.
- [11] 刘彩娥.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几个误区[J].图书馆,2014(3):111-112,123.
- [12] 杨莉,陈幼华,谢蓉.高校图书馆开展专业阅读推广的实践探析[J].图书馆杂志,2015,34(12):29-37.
- [13] 赵发珍,杨新涯,张洁,等.智慧图书馆系统支撑下的阅读推广模式与实践[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1):75-81.
- [14] 常青,李慧.专业阅读推广驱动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J].图书馆界,2019(1):57-60,74.
- [15] 丛全滋.图书馆阅读推广浅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6):57-62.
- [16] 丛全滋.再论图书馆本质[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5):7-10.
- [17] 李东来.书香社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0-25.
- [18] 岳修志.当代大学生阅读问卷调查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4):81-85.
- [19] 孙鹏.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设计与实践: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16,29(6):72-75.

作者简介:丛全滋,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刘琨,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与推广;王洪波,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及信息汇总、编辑与发布。

收稿日期:2023-03-03

本文责编:孙晓清